讷 河 文 史 资 料

第 四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讷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 九 九 一 年 十 月

编　　审：孟庆江
责任编辑：徐　翔

封面设计：刘庆富
封面题字：薛万惠

（内部发行）

目　录

清布特哈八旗始末

王咏曦

布特哈是清代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属黑龙江将军之辖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政府在嫩江西岸的后宜卧齐屯(由于达斡尔族没有文字，在历史文献中又被写作伊倭齐、依倭奇。今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北十五华里处)设立布特哈总管衙门(孟定恭《布特哈志略》3页)。“布特哈”，满语意为“渔猎”，又有“打牲部落”、“打牲处”之称，因居住在这里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从事渔猎而得名。布特哈辖地辽阔，“与各城本无一定之界”，“牲丁所至之地，皆布特哈总管应巡之地”(郭克兴《黑水郭氏家乘、黑龙江乡土录》)。其疆界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旗、阿荣旗、扎兰屯市和黑龙江省的讷河、克山、克东、德都、甘南(部分)嫩江靠讷河边境部分、五大连池等市县的广大地区。总管衙门下设镶黄、正黄、正白(以上为上三旗)、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以上为下五旗)八旗。初时由达斡尔、鄂温克族各1人担任总管，8人担任副总管，谓之

打牲头目和副头目。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后，增设满洲总管1人，副总管仍为8人，负责管理整个布特哈地区的一切军政和司法事务。

雍正十年（1732年），清政府将布特哈3000名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和巴尔虎官兵（其中含家眷796人）移往呼伦贝尔的南屯和西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又有布特哈1000名官兵被移往伊犁（今新疆）地方。这是规模最大、移驻最远的两次分迁。现在居住在内蒙古鄂温克自治旗和新疆塔城县的鄂温克和达斡尔人，就是这两次分迁官兵留下来的后裔。

清同治以后（在此以前的清代历朝档案，因在1900年庚子俄乱时全部被焚，历任长官记录荡然无存），历任满洲总管为诺门德勒、和尔巴彦、蒙库良忠、富尔增布，以上四人均为齐齐哈尔人氏。历任达斡尔总管为萨尼布，郭博勒氏，东布特哈他奔沁（今龙河镇龙河屯）人；胡格精额，郭博勒氏，东布特哈霍奇（今龙河镇保安村火旗屯）人；业普春，德都勒氏，东布特哈德都拉（今德都县德都镇）人；历任鄂温克总管为富勒兴阿，东布特哈开阔沁（今清和乡开花浅）人；文成，杜拉尔氏，东布特哈托木沁（今德都县辖）人；恩特恒额，涂克敦氏，东布特哈嘎布喀（今兴旺乡嘎布卡屯）人；凌丰阿，涂克敦氏，西布特哈阿尔拉（今莫力达瓦旗辖）人。

总管衙门下设户司（又称左司），负责掌理户籍、婚姻、地亩农事等事务；堂司（又称文案处），负责起草文牍，管理档案等事务；兵司（又称右司），负责管理捕盗、

升迁、调转、刑事等事务。以上三司各设正、副堂一人，扎领、帮办、笔贴式、书记若干人。三司官员由于民族不同，所享受的薪俸也不同，“满洲全俸，索伦、达斡尔半之”（西清《黑龙江外记》卷四）。

清政府为加强对布特哈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管理，按照他们的居住地域进行了统一编制，将达斡尔人编为讷莫日、莫尔登、都博浅三个扎兰；将鄂温克人（包括部分鄂伦春人）编为阿尔拉、涂克敦、雅鲁、济沁、托信五个阿巴。由理藩院统一管辖。

“扎兰”，汉语意为“连”或“队”，是布特哈地区达斡尔人的行政组织。讷莫日扎兰又称讷莫尔扎兰，其范围是今讷谟尔河流域，由这条河流而得名，历史上称之为讷莫日达斡尔。包括以郭博勒莫昆（氏族）为主，杂以少数德都勒、索多尔、吴力斯等莫昆的达斡尔人及涂克敦、杜拉尔、精奇里莫昆的鄂温克人。后来，讷莫日扎兰被编为正白旗。

莫尔登扎兰又称莫尔丁、孟尔丁扎兰，位于讷谟尔河与嫩江汇合处的嫩江中游南部，在梅斯勒（小梅斯，今齐齐哈尔市辖）至都尔奔沁（今清河乡都尔本浅）、阿彦沁（南阳浅，莫力达瓦旗辖）之间，历史上称其为纳文达斡尔。今位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山头的“纳文慕仁”公园即得名于此。莫尔登扎兰包括以敖拉莫昆和莫尔丁莫昆为主，杂有沃热、鄂嫩、托莫、讷迪、苏都尔等莫昆的达斡尔人，被编为正黄旗。

都博浅扎兰由都尔奔沁而得名，达斡尔语意为“四家子”、“四个人们”。位于嫩江中游北部，即都尔奔沁至巴

彦之间地段，包括以鄂嫩莫昆为主，杂有敖拉、托莫莫昆的达斡尔人以及部分鄂温克和鄂伦春人。都博浅扎兰被编为镶黄旗。

各扎兰多选背山面水的地方建造屯舍，“各旗屯每屯大者百余家……小者七八户或十户、二十户不等，其屯所之距三五里……或百余里不等”（孟定恭《布特哈志略》）。周围土地肥沃，流水清清，林木丛生。达斡尔人利用这些有利的自然资源，从事农业、牧业和狩猎生产。尽管清政府按每个人不同等级分配土地（佐领90垧，骁骑校67垧，领催45垧，披甲23.5垧，壮丁10垧），但由于分配的数量多，多数人都种不了，所以撂荒地很多。当时的人们对土地的私有观念极为淡薄，甚至有的因为害怕上土地税而不愿意领取地照。同时，由于地广人稀，生产技术落后，只有粗放耕作，广种薄收。农作物以燕麦（铃铛麦）、荞麦、大麦、稷子、豌豆、黑豆、苏子和烟叶为主。收获除用于口粮之外，其余全作为牲畜饲料。牲畜的多少是衡量达斡尔人（包括从事农业的鄂温克人）贫富的标志。

“阿巴”，汉语意为“围猎场”，是清政府在布特哈地区按照地域划分包括若干个民族的鄂温克人（其中包括部分鄂伦春人）部落，即地方行政单位。

清政府在原三扎兰、五阿巴的基础上编制了布特哈八旗，既是军事组织，也是行政组织。旗设旗长（协领正三品），下设佐领（正四品）、骁骑校（正六品）。按规定300人编为一佐领（牛录章京），五佐领编为一参领，五参领编为一都统，兵员7,500人。每扎兰、阿巴自编一旗。诺敏河流

域的阿尔拉阿巴为正红旗；阿伦河、格尼河流域的涂克敦阿巴为镶白旗；雅鲁、音河流域的雅鲁阿巴为镶红旗；济沁河流域的济沁阿巴为正蓝旗；绰尔河流域的托信阿巴为镶蓝旗。八旗中的各族男子，按照清制每五年要集中进行一次测丁检查。凡年龄15岁，身高5尺者一律编为西丹，“西丹者，清语谓余丁也”（杜文澜《平定奥寇纪略》）。是朝廷正规军的后备力量，类似现在的民兵预备役。凡被编为西丹的男丁，就被视为年龄已经成熟，从此开始承担每年要向朝廷交纳一张貂皮的义务。每年五月布特哈总管衙门要选派官兵，负责将貂皮送到齐齐哈尔因沁屯，接受黑龙江将军、副都统等官员检查验收，合格者备贡，不合格者参加市场交易，这种互市活动当时被称作楚勒罕。为了利用这一机会搜刮民财，选貂官极为挑剔，将“入格者故为扔还，阴以贱价逼卖，无问大小概银九钱。”（何秋涛《小方壶舆地丛抄》）引起布特哈官兵极为不满，为此，曾有副总管奇三（达斡尔族，今龙河镇倭都台屯人）潜去木兰（今河北省围场县）向正在那里避暑围猎的皇帝告赢了御状，此事至今尚为人们所传颂。

布特哈总管衙门的兵员，向例由“旗丁中挑补”，入伍后，“除犯有事故者及年逾五旬后告退外，概无退伍时期”（《达古尔嫩流志》）。西丹到了18岁以后，便全部转为披甲，从此享受朝廷银饷，前锋领催（拨什库）每年36两，马甲和站领催每年24两，如遇闰年，前者加3两，后者加2两。为了提高军事知识，“自康熙以来，编旗给饷，训以纪律，平时自应其役，军兴皆听调拨”。（何秋涛《朔方备乘》卷

2）。每年春秋两季，各旗佐的披甲、西丹，在佐领或骁骑校的带领下，有组织地到布特哈总管衙门集中进行训练，事后回自己住地“各营谋食之路”（《黑龙江志稿》）。为了保证披甲随时出战从征，平时不准许他们擅自离开住地百里和迁移它处居住。俾一旦发生战事，便马上集结从戎出征。据历史记载，布特哈官兵先后参加过平定噶尔丹、准噶尔、大小金川和抗击英法入侵等67次较大战役，足迹遍及22个省区，为维护祖国统一，保卫领土完整，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连年不断的战争，也给布特哈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每场战争，男人一去杳无音信，繁重的生产、生活担子便全压在妇女身上。而当战争结束，“其庆生还者十不一、二也，不死于战争的刀枪，即死于瘴烟之地”。“兵丁内有一家三人阵亡及三人内二人阵亡”（《黑龙江纪略》）。官府送给她们的是儿子、丈夫或兄弟死亡的消息，致使一时间全屯哭声一片，不忍卒睹。为了笼络这些‘涉血沪，冲白刃”效命疆场立下汗马功劳的布特哈官兵，统治者对他们当中有功人员采取了加功晋爵的政策，其中仅达斡尔族郭博勒氏家族，就有24人先后被皇封为将军、都统。

光绪八年（1882年），原隶属布特哈的鄂伦春入民，由于不堪忍受官府欺凌压榨和残酷剥削，以库玛尔路的骁骑校烈钦泰为首联合毕拉尔等路鄂伦春入民，坚决要求脱离布特哈的管制。清政府为了加强北部边防，羁縻鄂伦春人以应付俄搔扰，经光绪皇帝批准，在黑龙江城（今黑河）与墨尔根（今嫩江）之间的太平湾（今嫩江县塔溪乡光明村六屯附近）建立兴安城总管衙门，专门负责对各路鄂伦春人的管

理。从此，鄂伦春各路人民脱离了布特哈总管衙门的管制。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布特哈总管衙门升格为副都统（正二品）衙门，并迁址于博尔多站（今讷河镇长青、建华村，又称老站）。第一任副都统由原总管业普春升任，其后任为额尔精额，达斡尔族，郭博勒氏，东布特哈伯尔科（今进化乡辖）人，双福，齐齐哈尔满洲人。副都统衙门内设机构仍同前总管衙门，只是各司官的笔帖式名额较之以前有所增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侵略者乘清朝为应付其他七国入侵京畿无暇北顾之机，偷偷越过黑龙江，占瑷珲，夺大岭，侵墨尔根，长驱直入，直逼博尔多城下（今讷河镇长青村），火烧副都统衙门，致使布特哈人民历尽浩劫，不得不背井离乡，远避他方。直至省城沦陷，寿山将军被迫自杀，在李鸿章为首的卖国者与侵略军签定和约后，才得以返回伤痕累累的家园。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十一日，清政府裁撤副都统衙门，以嫩江为界将布特哈一分为二，置东、西两路布特哈总管衙门。东布特哈总管衙门仍设博尔多站原址，首任总管由齐齐哈尔满洲人陈福龄充任，继任为呼兰旗人纯德。西布特哈总管衙门迁回后宜卧奇屯。两路总管各自重新组建八旗，各旗按规定下设佐领、骁骑校各一人，掌管本旗事务。总管衙门所设三司除人员数量有所减少外，其他无变。东布特哈共有聚落62屯，分别置于嫩江东岸、讷谟尔河两岸、老莱河西岸和乌裕尔河北岸，由八佐的佐领管辖。

由于连年战争，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致使各地都出现了兵源不足的现象。为使此事得以解决，清政府采取了延长

服役时间的办法，这就导致士兵的老龄化，严重的破坏了布特哈人民的生产、生活。各旗兵饷不足，更使其坐吃山空，因此，各地逃兵屡见不鲜。到了清末，有的佐领只拥有10几名披甲，个别的甚至只有编制而无一兵一卒，使各佐成了有名无实的空架子。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清政府裁撤东布特哈总管衙门，改建讷河理事通判厅(为直隶厅)，并成立了过渡性的临时机构——八旗筹办处，办公地点也由博尔多站迁移新城址（今讷河镇东北街县直机关幼儿园东院）。筹办处设总办、文牍、翻译各一人，负责办理总管衙门的遗留问题和筹划八旗生计事务。如利用北学田（今学田乡、清和乡一带）的田亩收入和房产收入发展教育等。第一任总办德宏，达斡尔族鄂嫩氏，今清和乡开花浅屯人。继任总办额勒春，达斡尔族德都勒氏，今德都县温察尔屯人（其侄德古来，曾任内蒙伪德王政府财政部长,现居美国,为台湾立法委员），在其任内为振兴达斡尔族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包括现在的老一代达斡尔族学者，多数人都是经额勒春培养起来的。自讷河理事通判厅成立后，旗佐这一行政体制自然形存实亡，一切行政、军事、司法等均由新的政权去管理和实施了。

日伪统治讷河十四年罪行录

徐　翔

从1931年"九一八"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踏入我东北，抬出清末代皇帝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伪残暴统治讷河人民整整十四年。事过60年的今天，人们一提到过去日伪统治十四年的暴行，就回想起当时流传的四句话："伪满十四年，日寇统治严，人民受压迫，苦处说不完。"兹将日伪统治讷河人民十四年的罪行略述于后。

建立血腥的军政警宪统治机构

1932年7月，日军侵占讷河县城。为了维护其殖民主义统治，不断强化统治机构，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1、层层建立日伪政权。在全县从上到下设立统治机构。1933年6月1日又按伪满洲国体制将县政府改为县公署，日本人派来正、副参事官二人。中国人任县长。第一任县长崔福坤、第二任县长日本人田崎库三代理，以下各任为傅豫廷、张亨馨、李相廷、崔培基，最后一任县长郑尚荣。

中国人当的是傀儡县长，实权由日本人副县长掌握。县公署下设总务科（内设庶务、文书、会计三个股）、内务科（内设行政、实业、财务三个股）、警务科（内设警务、司法、保安三个股）和教育局（内设学务、社教两个股）。另有铁路、国道、税捐、邮政、催运五个局归省直属。各级政权机关和重要部门及学校都由日本人任副职，中国人当正职也得向日本副职请示报告工作。县以下设讷河、拉哈、讷南、大和（学田）、龙河、通南六个警察署，署下又设21个警察分驻所。1933年12月22日伪满洲国公布《暂行保甲法》实行保甲连坐。讷河共设25个街村、22保、205甲。街村设街村长，保有保长、副保长，甲有甲长、副甲长。并规定10户为一牌，设牌长一人。实行十户连坐法，即一牌出现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等事，轻者罚十户"连坐金"50元，重则被视为犯罪嫌疑，刑讯逼供，关进监狱。同心乡茂盛村乔老四、乔老五哥俩因留住路过的抗日联军，被视为私通红军罪，抓进讷河警务科，施用吊打、过电等刑法，老四死在监狱，老五被逼瞎双眼，其余九户也受到株连。这些机构同时又是基层征国兵、派劳工、抓浮浪、催出荷粮、要捐税等欺压百姓的办事机构。

1938年1月1日，日伪进行机构改制，将县公署三科一局改为庶务（设庶务、文书、经理、弘报四个股）、行政（设地政、土木、教育、保健、劳务、国兵、民籍七个股）、财务（设理财、征收二个股）、警务（设警务、特务、司法、保安、经济保安五个股）四个科，另设有满洲中央银行讷河支行、日本独立守备队、伪骑兵、步兵团等军事机构。1939年7月1日县公署增设开拓科（内设开拓、农林、畜牧

三个股)。1940年5月增设经济科（内设商工、统制二个股）和地方职员训练所。伪县公署直属企事业单位有县商公工会、讷河驿（火车站）、讷河交易市场、汽车事务所等。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的协和会讷河县本部、兴农合作社，掌握讷河政治、经济大权，实行所谓县公署、协和会、兴农合作社"三位一体制"。以此强化对全县人民的政治统治、经济控制和资源掠夺。

日伪时期设立的司法机构，行使统治压迫人民的司法权。1938年伪满司法部撤销讷河、嫩江"两县之兼理司法"，成立讷河区检察厅和齐齐哈尔地方检察厅讷河分处，设检察官、书记官办公室及搜查室、留置场等。凡是讷河、嫩江两县的刑事案件都由该厅处理，重要案件由齐齐哈尔地方检察厅讷河分处受理。执行和维护"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的法律和法令，保护日本侵略者、伪官吏和汉奸、地主的利益。1942年讷河区检察厅设庶务、会计、保存、执行、事件5课，设检察官、书记官和庭吏、雇员、佣员各一人。

1935年设立讷河法院，在县长之下设主任承审员、书记员、登记主任书记官、检验吏、承发吏长各一员、承发吏6员，协助县长审理各种案件。1938年设讷河区法院和齐齐哈尔地方法院讷河分庭，内设审判官室、法庭、调停室、當事人控室、事务室等，受理讷河、嫩江两县的司法事务。1940年增设涉外庭。1940年讷河区法院设民事、刑事、庶务、会计、登记5课，审理民、刑、诉讼等案件，设审判官一人、兼务审判官二人、监督书记官一人、书记官6人，另在嫩江县设分所一处。那对的法律维护的是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

利益，贫民百姓打官司，“有理无钱莫进来”。当时法院刑法有几十种之多，犯法者轻的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重者上大挂、手指钉竹签、过电等惨无人道的刑法。1943年伪县公署设司法科，掌管全县的司法大权。

2、长期驻扎日本军队。1932年日本在讷河派驻关东军和警备队、宪兵队，实行法西斯统治。1935年讷河驻有日本宪兵分遣队、日本守备队、守备分遣队及满洲骑兵第五旅、满洲陆军21团1连、3连。1932年6月10日，日本侵略军与马占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徐宝珍旅开战，派日军14师团平松旅团小泉联队驻博尔多站（今长青村），向驻守讷河县城的徐旅发射迫击炮，炸死炸伤居民40多人，炸毁房屋100多间，使不少居民无家可归。徐旅为保城镇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决定暂时撤出讷河城，驻防讷谟尔河南岸。小泉联队乘机渡河攻击徐旅，被徐旅打死打伤数十人。后日军派来增援部队，徐旅给养不足撤出讷河（以后徐宝珍叛变投降日军）。从此日伪军长期驻扎北大营。

1932年日军小泉联队撤走，讷河日伪军改为工兵队（上校队长张玉田），主监是日本人，辖三个连队共300多人，曾多次参加镇压抗日联军、抗日青年先锋队、抗日救国会等罪恶活动。1939年7月开始，日伪军石兰部队和一个宪兵队及孙强团共500多人，先后三次袭击龙河“三马架”（现友好乡富裕村一、七屯），围剿耿殿君、王钧领导的抗日联军，但都遭到抗联的沉重打击，死伤100多人，被打坏四辆汽车。敌人恼羞成怒，把全屯100多男女群众集中在一个大场院里，架起机关枪，要进行血洗。幸被一个有良心的中国

人孔翻译设计解救。但这个屯被并到其他屯，所有的房子被放火烧光。日伪军在县城也是横行霸道，掠夺民财，无恶不作。北大营孙承义团长指使官兵夜间化装出去抢商号，敲诈勒索银钱。

3、凶狠的日本宪兵队。宪兵队是统治镇压人民的指挥机关。1933年成立讷河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关屋武雄准尉。1936年改为宪兵分驻所，隶属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统辖，共有宪兵10多人。内设特务、警务、庶务三个系。特务系，以防苏反共，搜集抗联活动和爱国群众"反满抗日"的言行为主要任务；警务系，主要监察军人行为；庶务系，负责武器供应及后勤工作。他们在县城雁永木铺、东亚洋行、金星旅馆和西烧锅等建立特务据点，还在银行、税务、邮电等重要部门和客栈、车站、饭馆等服务行业以及家理教会中发展密侦，形成据点成网，遍布城乡。这些特务和密侦，刺探抗联情报，监听人民言行。1939年日本宪兵队分驻所，对有爱国思想的人都视为政治嫌疑犯，肆意逮捕镇压。仅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和1944年2月，日本宪兵队特务铃木介寿、小林芳郎和密侦，对龙河、九井、讷南进行三次大逮捕，共逮捕讷河地下县委领导、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会员和爱国群众310人，将其中23人在县城北门外杀害，其余押送齐齐哈尔和北安高等法院"审判"。宪兵队采用灌凉水、上大挂、过电、火烧、筷子挪手指等严酷刑法，审讯受害者。抗联干部韩殿清过堂时，被警察用木板把眼珠子挪出来。王增福过一堂就被活活打死。抗联指导员王恩荣等四人被刑讯致死，中共讷河地下县委书记尹子奎等二人被日伪杀害，县委宣传部

长方冰玉变节后也被敌人秘密处死，活着的少数人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才出狱回乡。

1934年12月3日日伪颁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实行归屯并村，建集团部落。并将五区（龙河）划为匪区，进行严格管制。将原来的村屯一律烧光、抢光。五区（龙河）三马架、三合屯、火烧于三个屯子，因抗日联军在这里曾重创敌人，日伪军警将三个屯子一火焚之，其景象惨不忍睹。

4、建立反动的地方武装。1932年成立公安大队，有队员160人。是年7月成立县治安维持会，县公安大队改为警察队，下设两个中队，计205人（一中队101人，二中队104人）。1939年，抗日联军攻克讷河县城后，日伪为了加强城防，翌年11月新编县警察队150人。1941年8月由警察队选拔70人编为黑龙江省警察游击队第一中队仍住县城，1942年改为县警备队。此外还成立自卫团，共有团丁440人。后改为城防队200人、扎枪队240人，配合县警察中队防卫县城。1934年按保甲制配备自卫团，每甲辖五至七屯，配团丁10—30人，全县共205甲，配备团丁3874人，枪5557支。各地自卫团多由地主或大户编练，每屯按牌抽丁，白天劳动，夜间巡逻值班。

5、不断扩大警察机构和人员。警察机构不断强化，警察组织遍布城乡。1937年设警务科，内设警务、保安、经济保安、特务、司法五个股和督察室及一个警备队，全县共有警察300多人，加上警备队60人，共计360多人。警衔分为警士、警长、警尉补、警尉、警佐（委任官）、警正（荐任官）六级。伪满末期警尉补改为事务警尉和监督警尉。为了控制

和指导这个重要的统治机构，日本人任警察署副、警务科副和重要股的股长，他们忠实地执行《时局特别法》、《保安矫正法》、《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等镇压讷河人民。县城四门都有警察把守，长青村有个姓张的赶四轮马车进西门时，因衣服不整齐，对警察不恭敬，被警察毒打一顿。那时老百姓走路、办事，对日伪官吏稍不恭敬，即被视为“反满抗日”的思想犯；凡在街头巷尾结伙或在饭旅店、茶馆谈论国事，就抓你为“国事犯”；各处都贴着“莫谈国事，守口如瓶”的标语。群众走路东瞧西望，或交头接耳，就抓你私通红军的“嫌疑犯”；老百姓吃大米、白面，被视为违反统制条例，抓你“经济犯”。警察还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浮浪、抓劳工，威逼群众交“出荷粮”，到处勒索民财。当时流传着警察到处“打粳米，骂白面，打老太太要鸡蛋。”县城西门外（今建华村）有户农民被警察发现家有大米、白面，日本人伊藤泰江指挥强行搜查居民50户，搜出白面10袋，将牌长20余人抓进警务科审讯罚款。1944年6月，巨和村向善屯张木匠给邻居盖房子，晚间吃饭喝醉了，吐出了大米饭，被警察发现，视为“经济犯”，全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得一场大病不到半年就死了。博尔多西区区长杜广福，看不惯日伪对人民的统治镇压，群众对他都有好感，被视为“反满抗日”的嫌疑犯。县警务科日本人副科长请他赴宴，在酒里下慢性毒药，将他治死。有些警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讷南警察署关警尉外号叫关大巴掌，随便打人，强占民女。通南警察署长于宪亮，看中通南街王剃头的老婆年轻漂亮，霸占过来做他的小老婆。

6、恐怖的特务活动。1935年讷河警务科改为警察局，下设有特务股，股长和打字员都是日本人。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特务组织不断强化，特务股内设特务主任和特务搜查班，全县六个警察署也配备专兼职特工人员，并大量发展密侦，建立特务据点，大搞特务活动。他们活动诡密，手段毒辣，到处侦察中共地下县委、抗日联军和抗日救国会情况，每到一地便是一片阴森恐怖景象。1943年8月，讷河青年抗日救国军队长孙长山，有一次摆渡抗联过讷谟尔河，被特务腿子王林发现，报告讷河警察局和龙河警察署而被捕，押送齐齐哈尔伪警务厅监狱，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直到1945年解放才出狱。1943年冬龙河抗日救国会员周明录（共产党员）进行抗日活动，被县警务科特务股和龙河警察署怀疑，但始终抓不住把柄。后从沈阳调来一名高级特务，假扮贫苦农民秘密潜到龙河侦察出周明录的抗日活动。1943年初冬的一天，他突然闯进周明录家被周和老伴识破，冷不防将其打死，尸体塞到讷谟尔河冰窟窿里。后来敌人出动宪兵，将周明录逮捕入狱，使用各种酷刑，吊打八个多月，判处十年徒刑。直到日本投降，才被释放。1939年8月，讷南村爱国群众李白人（因身上长白毛而得名），平素爱讲抗联的事，一天夜里抗联住在他家，被讷南警察署特务发现，惨遭毒打，不久死去。日伪时期以各种罪名逮捕和拘审与抗联有关人员，在全县制造了很多案件。

7、建立伪协和会。1935年8月27日，满洲帝国协和会黑龙江事务所派员来讷河建立协和会办事处。1936年7月，改为满洲帝国协和会县本部，日本参事官（副县长）田崎

库三为本部长。在各街村相继建立协和分会，全县共有会员5425人。县协和会下设宣抚班、特搜班、庶务班、指导班等机构，成为与县公署并立的“两位一体组织”。群众称“警察署、宪兵队、特务股、协和会”为四大硬。伪满后期，县协和会已经渗透到各级政权、各个领域，并成立很多分支机构，如军人后援会、国防妇人会、协和青年团、协合少年团以及勤劳奉仕队等。协和会有五项任务：①建国精神的宣扬；②民族协和的实现；③国民生活向上；④宣德达情彻底；⑤国民动员的完成。并称协和会精神是“政府精神的母体”。

县协和会的宣抚班从事策反工作，多次向龙河所谓匪区、九井等地派遣特务，收买汉奸，侦察抗联行踪，开列抗联和爱国群众黑名单，搜捕爱国群众。1939年秋，九井村祥云屯特务情报员刘成信经常刺探抗联和爱国群众组织活动。有一次抗联派人下山筹粮被他发现，立即报告了伪警察署。还有一次他密报使30多名爱国群众遭到逮捕。地下党员刘纯根据抗联要求，带领救国会员夜间将刘成信抓住处死，为九井一带除了大害。

县协和会的特搜班，经常同县公署有关部门到农村强行“搜荷”(抢粮谷)、抓劳工、抓浮浪，“大搞增产完遂”、开展“增产出荷运动”。为榨取民财，支援“大东亚圣战”，还搞什么“国民储蓄”、“必胜储蓄”、“硬币纳献”运动；组织学生挖大眼贼、打麻雀、抓老鼠等用于研究细菌战。

协和会为了实现其方针任务，每年召开一次所谓“评议会”，由官吏、豪绅、汉奸、富商等协和会员代表参加。宣

传对大日本帝国的感恩戴德，举国力支援皇军之战……，讨论如何完成粮谷出荷、劳工供出、治安确保等任务，以实践其宣德达情之彻底。

在县协和会本部的直接领导下，从1939年开始成立由日本人负责的讷河青年训练所，抽16到19岁的农村农民和城镇工商学徒进行军事训练，每年训练二至三期，学习二至三个月，每期60到70人，向青年灌输“建国精神，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等，重点进行军事训练，并组织参加勤劳奉仕和值勤活动，妄图使我国青年忠实地为其效力。

大肆进行经济统制和资源掠夺

日伪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血腥统治镇压人民，而且在经济上实行全面统制，疯狂地掠夺本地资源和财富，致使人民生活极为贫困，过着衣不遮体食不糊口的日子。

1、严酷的经济统制。1932年7月，日寇实行经济侵略政策。日商不仅大量倾销日货，还直接投资在县城办黑龙商号、东亚友林洋行、昭和隆和千田旅馆等，掌握全县经济命脉，使民族商业受到严重排挤和打击，许多商行、旅馆倒闭，商品奇缺，黑市猖獗，物价飞涨，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市井萧条，民不聊生。

1937年伪满洲国公布《重要的产业统制法》、《经济专卖法》、《专管法》等等，从人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到生活用品进行严格统制，逐步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同时，不断完善统治机构，将县公署实业股升格为财政科，负责制定和下达计划，分配物资指标，收缴地方财力，审批和检查从业单位等。县警务科增设经济股，设有经济警察，负责经济统

制法令执行情况，并大肆搜刮民财，大抓所谓“经济犯”。县兴农合作社增设购买部、贩卖部，配合有关单位制定粮谷出荷计划，催收农产品等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适应战争的补给需要，强化对经济部门的统制，将全县861户工商行业分别合并为32个统制组合，由日本汉奸担任组合长，监视工商业的经营和购销情况。还成立了物资配给所，城镇居民每户发给一本配给通帐，农村发给居民牌。县公署下令按规定日期配给商品，到指定配给所去购买，到期不买一律作废。每配给一次商品都层层克扣，而且质次价高，有时还买不到，人民得不到够用的布匹和棉花等日用品，只好穿“更生布”，甚至穿麻袋片。对粮食、布匹等日常生活用品实行配售；对面粉、洋油（煤油）、酒精、火柴、食盐等商品实行专卖。那时的兴农合作社配给农民的漂白布叫“冒烟白”，一抖搂直冒灰，薄的像纸一样，穿上几天汗水一浸就坏了。配给农民的豆油兑饭米汤，发放的洋油兑水，配给的粮食掺沙子，老百姓管兴农合作社叫“坑农活作孽”。

2、逼迫缴纳“出荷粮”。1940年以来，日本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对农付产品实行出荷制和粮食配给政策，粮食和麻类进行全面统制。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出荷量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狠毒，并实行所谓“奖金制”、“先钱后货的契约制”等各种欺骗手法，出荷量由县分配到村，由村下达到屯，由屯再到种田户，通过和农民签定《出荷契约书》，在契约书上注明粮食品种、数量、出卖日期和场所，并由契约人、保证人和屯长盖印，实际是到时完不成任务接受惩处的“誓约书”。

1943年日伪感到末日来临，实行所谓“决战搜荷方策”，要求农民必须完成决战下绝对需要“粮食数量”。打场送粮时间一到，县公署各科、协和会各班和兴农合作社等伪官吏、职员在警备队和神工队的配合下，组成庞大的粮谷出荷督催班，按照“契约书”逐屯逐户的催出荷粮。对完不成出荷任务的，采用各种高压手段、强行搜查，搜出的粮食一律出荷，到期完不成任务的去劳工抵偿；抗拒不交者严刑拷打，打死勿论。1943年冬，神工队20多人气势汹汹到巨和村陈子龙屯（现巨和乡革新五屯）催出荷粮，挨门逐户翻箱倒柜，挖地找粮，搞得人心慌慌，鸡犬不宁。农民李盛田因受灾交不上出荷粮，被神工队打得死去活来。其弟李有田说：“别打了，我家有一面袋小米给你们”。神工队反而打得更凶。李有田忍无可忍拿起身旁铡刀将一神工队员砍掉半拉膀子。李有田被带到县警务科受尽酷刑，在狱中得了精神病，不久死去。1942年10月，日本侵略战争，急需粮食供给，便不顾老百姓死活，粮谷出荷不断加码，从县公署到街、村、屯，所有伪官吏、警察和职员全部出动，到农村翻粮食、挖粮食，提出：“烟筒冒烟就得交出荷粮”，把农民搞得叫苦连天。一些农民奋起反抗，同心乡文光村有户农民已交完出荷粮还逼他交，没粮交就灌辣椒水，灌的从头发茬子里渗出血来，他随手拿起木棒打死一个神工队员，被关进县警务科，死于监狱。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紧张，日伪实行严格的粮食配给制度。县城粮食配给所分两等配给粮食：一等的伪官吏，每月配给15.5—24公斤，朝鲜人比伪官吏少一点，日本人配给的更

多；二等的指一般居民，每月配给7—12公斤。居民拿配给通帐到配给所去买，粮食质次价高、数量不足。居民不够吃就到黑市上高价去买。还得偷偷地去买，被经济警察抓住就成了“经济犯”，轻者罚款500元，重者治罪坐牢。

3、移民入殖建立开拓团。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侵略扩张的需要，从1937年至1944年先后由本国的冈山、长崎、长野、广岛、熊本、鹿儿岛、宫城、岐阜、福岛、清森等县、市抽派农渔居民和失业者入殖讷河，霸占土地，强设开拓团。在全县境内共设15处开拓团，分三种形式：一种是铁路自警村，有一处，位于讷河火车站北，旧称日本屯；二种是集团开拓团，有北学田、下学田、上学田、三头山、南会津等五处；三种是义勇军开拓团，有巨和、南英、宽沟、南学田、龙河、连桂、大雅、紫苑、东三头山等九处。共1,013户，1074人，占耕地面积6万多亩。开拓团隶属县公署开拓科管理，县满拓总部给开拓团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开拓团驻地设有学校、医院、粉坊、酱菜厂、兽医站等福利设施，为开拓团服务。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和防止抗日联军的袭击，义勇军开拓团除了搞农业生产外，每天进行军事训练，各团部戒备森严，周围高筑墙，深挖壕，设炮台，备足枪支弹药。规定中国老百姓不准进入，如进入禁区被抓住或惨遭毒打，或送入狼狗圈喂狼狗。1940年秋，巨和村有一姓于的群众到巨和义勇军开拓团地边打柴禾，因口渴到团部找水喝，被开拓团人员视为侦探情报，被关进马号，每日进行刑讯，被打断三根肋骨没逼出口供，最后送进狼狗圈活活咬死。1945年日本关东

军在战场上连续败北，日军为了补充兵源，将义勇军开拓团全员送到前线与我军作战，其中多数人死在战场上，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后，讷河的日本开拓团全部撤走。大多数人按照民主政府的命令被集中遣送回国，少数逃跑失散，还有极少数不愿回国，现在成为我国侨民。

疯狂地推行劳务统制

日伪时期，推行劳务统制，采取种种手段抓国兵、抓劳工、抓浮浪，搞勤劳奉仕，逼的老百姓没有活路。

1942年伪满洲国公布《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凡是年满25至56岁的男性成年人均属紧急就劳对象。每次摊派的劳工都是贫民百姓，富人可以出钱雇人去，或者通过贿赂转嫁给别人。1943年后日伪要劳工不断增加，老百姓到处跑躲劳工，伪政府派出大批警察和街村官吏，在农村和城镇的旅店、饭馆，火车站、妓院、集市等地，抓浮浪去劳工。贫民百姓为此整天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讷河县从1942年起共摊派劳工近30余次一万多人。抓的劳工被强迫去黑河、密山、五岔沟、黄蒿沟、孙吴、查哈阳等地挖山洞修筑军事工程，修建国防公路，开发矿山等，每日进行繁重的劳动。1944年由于战争需要，加紧修筑军事工程，讷河一年内抓了三次劳工共2000多人，被用闷罐车送往黑河。他们睡在席棚里，吃的是橡子面，穿的是更生布，盖的是麻袋片，有病得不到治疗，劳工被折磨死很多。仅在黑河一地就累、饿、病死掉36人，逃跑被打死20人，1945年在查哈阳修筑灌区工程时，仅冻死就达40多人。讷南镇平坊村一名姓张的劳工忍

受不了这种非人的劳役，夜里乘人们熟睡时逃跑，正赶上劳工小队长出去小便发现抓回，第二天召集劳工开会，当场被打得半死。劳工中队长训话说：“今后有逃跑者就象他这样下场”！这名劳工被毒打后活了二十多天死去了。九井乡安仁村有名姓李的劳工，在五岔沟修陆军医院，由于过度劳累吃不饱饭，睡不好觉，得了急病，奄奄一息一个多月，最后没等咽气就被扔到死人坑了。日本人对劳工更心狠手毒，修完工程还不让你活着回去。讷河亲仁村劳工夏学柱亲闻，修建五岔沟秘密军事工程将要结束时，日军为防泄密，把800名劳工都赶进山洞里活活憋死。在五岔沟修建陆军医院时，讷河一个劳工棚突然失火，烧死12人，重伤1人。有个23岁的青年结婚三天被抓劳工，也遭活活烧死。日伪时期抓劳工，造成千家万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日伪时期除强迫服劳役外，还“抓浮浪”。1943年初至1944年七月，在县城以检查身份证为名，对没有身份证和无职业的一律视为“浮浪”，共抓捕160多人，强行送往黑河当劳工。同时在铁路沿线，以企图破坏铁路嫌疑罪逮捕居民460人，除判刑者外，其余一律送往外地服苦役。

1942年伪满洲国又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是年龄在20至24岁的男性青年未被征国兵的，都得义务参加勤劳奉仕队（当时群众称为“国兵漏”），每年义务劳役4至6个月，每人共三年18个月。全县每年有八九百青年参加修公路、挖排水渠等劳役，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饭，过着奴隶式的生活。有人不满或干活不出力，就要受到惩罚，有的逃跑，不但向家长要人，逃跑者只得在外边避难。

1939年诺门汗事件后，日伪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于1941年4月1日颁布实施《国兵法》，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凡年满19岁的适令男子，经体检合格，必须到军队服役三年。检查不合格者编入“勤劳奉仕队”。伪满后期，为补充前线兵力，县公署、警务科、协和会到处抓“国兵”，抓勤劳奉仕。被抓当国兵的青年训练三个月，就开到战场当炮灰。有的青年为了逃避国兵自伤其身，有的逃跑在外躲避。警察三天两头逼家长要人，百姓不得安生。

极力推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霸占我国河山，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实行殖民主义统治，而且在思想文化上采取各种手段，摧残我民族文化，实施愚民政策，进行奴化教育，妄图使我国人民成为日本的驯服工具。

1、采取法西斯手段，进行奴化训练。日伪时期给我国人民制定了许多行动规范：机关、学校每日都得上“朝会”或“早礼”，如“国旗揭扬”（向日本天皇）、“皇宫遥拜”、唱“国歌”、背“国民训”等等。从1942年开始，机关、学校、事业单位职员、学生必须按期到当地“建国神社”拜祭日本天照大神，祝愿“大东亚圣战完遂”。后来发展到部队、训练所等集体伙食单位，每顿吃饭时，都先“默想”“感谢天照大神的恩赐”，然后用日语齐声说“依他达刻麻斯”（即领受之意）。

为了使上述奴化教育变为被压迫者的自觉行动，日伪除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外，还采取法西斯高压手段，强迫人民屈服于侵略者的意志。首先要求人民要有严格的等级观念，要

绝对的“阶级服从”，下级对上级必恭必敬，官吏对百姓须得出口是令，学生对教师要象子女对父母一样遵从，甚至中等学校上班生对下班生都得说嗜是嗜，违者体罚，体罚不从者加重（打嘴巴、用脚踢）。讷南警察署关警尉平时横行霸道，警士李某对其不满。一次李到他办公室没敲门，进屋又没垂手立正，被关先骂了一顿，后又打了两个嘴巴。拉哈国民优级学校有一名姓王的学生，因课外遇到个警察到学校办事没敬礼，被罚自己打自己嘴巴子，罚站三个小时。伪满时这样的事很多，名曰“训练服从性”。

日伪统治时期严格限制人民自由，从1935年起就到处张贴用铁锁锁着的人嘴的彩色宣传画，在剧院、影院、旅馆、饭店、浴池等都贴着“莫谈国事”的戒标。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日伪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统治思想的法律、法令。1941年颁布了《治安维持法》，1943年颁布了《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设有“反对帝室罪”（反对日本天皇，伪满皇帝）、“内乱罪”,对建国神庙及振庙之不敬罪等等。特别是1944年公布《时局特别法》后，时常以“思想不良”、“违抗圣意”等所谓罪名，逮捕、关押人民群众。龙河区孔国村有个张姓农民，平时走东家串西家好说闲话，被警察视为“思想不良”，送到讷河矫正院进行思想改造一年。日伪使用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奴化、治服人心，反而更加激起人民的愤怒和反抗。

2、大搞奴化教育，妄图摧毁民族意识。日伪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推行愚民政策，强令讷河县的机关、企业等单位不准挂“中国地图”，称中国为“支那”。大肆宣扬“日满

亲善”、“王道乐土”、“一德一心”。并以《执政宣言》中的“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来麻痹人民，甘为他们效力。

1934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溥仪由“执政”变为“登极”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后，便借助“皇帝”之名，让人民遵从和效忠。溥仪从“登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先后颁发了七份“诏书”（皇帝下的圣旨），不断加深对人民政治、思想上的毒害。溥仪在《即位诏书》中写着“所有建国之图，经邦之长策，当与日本帝国协力同心以期巩固……。”1935年溥仪第一次访问日本之后颁发的《回銮训民诏书》中说：“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后颁发的《国本奠定诏书》写道：伪满洲国建立以来“邦基益固，帮运益兴……，仰厥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保佑，天皇陛下之保佑……，建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意欲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顺从尊敬，极尽傀儡皇帝之能事。同年10月又颁布《国民训》，第一条要求“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於唯神之道，致崇于天照大神，尽忠于皇帝陛下。”

这些“诏书”和规定，在机关、学校企业单位成为灌输殖民主义文化教育必备内容。每日念“诏书”、唱“国歌”，成了一切仪式中必须履行的公式。尤其是学校，念“诏书”、背“诏书”、讲“诏书”、考“诏书”成了必须进行的教育内容。妄图在中国人民的心灵里抹掉自己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忘掉可爱的祖国，甘心情愿的当日本侵略者的奴

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伪满皇帝颁发了第二个"时局诏书"，要求举国人皆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同时大抓劳工、征国兵、要"出荷粮"，连"献铜币"、"交储蓄"、"做献纳"、参加"勤劳奉仕"等都成了"尽皆奉公之诚"、"援盟邦之战"等遵奉圣意的行动，强迫人民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

日伪在加强思想毒害和精神摧残的同时，1938年又规定将日语作为"国语"。全县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学日语。1941年颁发《官吏语学必修义务纲要》，全县伪官吏、职员必须学日语，每年进行一次语学鉴定。机关行文开始以日文为副本变为正本。由于日汉文学混杂，当时在汉语、汉文中出现了不少"协和语"、"协和文"，使汉语、汉文受到玷污。之后发展到一切体育、军训等活动，下达口令必须用日语，日常待人接物也要用日语。日本侵略者要使中国人变成其永久统治下的忠良顺民。

日伪时期利用鸦片毒害人民也是一种统治手段。于1933年颁布《鸦片专卖法》，同时在讷河、拉哈成立鸦片专卖所。1935年下令禁烟却又让边远山区种大烟，让人们抽大烟。一时卖大烟、抽大烟者遍布城乡。全县共有大烟馆100多处，讷河、拉哈两镇就有禁烟局管的合记、轩记、永记、和记、新记五处大烟零卖所，每天接待买大烟及抽大烟的700余人。仅1942年全县在禁烟局登记的吸毒人数达2,700余人。后来不仅卖大烟，还卖大烟土、大烟膏和大烟灰。卖烟所发给成瘾者吸烟票，每月凭烟票到卖烟所买大烟。抽大烟中毒者感

到不过瘾，由抽大烟改为扎大烟（静脉注射），有的人把全身血管都扎烂了，直至中毒而死。伪县公署在讷河、拉哈设立两处“康生院”（忌大烟的场所），收容抽大烟成瘾者实施戒烟，仅1941年收容260多人，但收效甚微。原五区满昌刘姓两口子，开始男人抽大烟，女人给拨大烟灯，后来女人也跟着抽。严重时每天抽三次还觉不过瘾，又开始扎大烟，以至把家里的财产全部卖光，又将18岁的亲生女儿换50份大烟也扎光了。最后两口子因扎大烟而死，儿子没钱给买棺材，用秫秸打连子卷上埋葬了。许多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用枪炮征服不了的牺牲品。

日伪时期利用妓女院糜乱人民又是一种统治手段。1932年日军侵占县城后，妓院迅速发展，有翠兰堂，度兰堂等十余家，还有两家日本妓馆，共有妓女100多人。妓院起着腐蚀和麻痹人民的作用。当妓女的大多数是贫家女子，人格受到侮辱，精神上受折磨，身心遭到摧残。

日伪统治讷河人民十四年，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激起全县人民奋起反抗。讷河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和支援抗日联军，成立抗日青年先锋队、抗日救国会、抗日妇救会等爱国群众组织，反抗敌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不断的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斗争的伟大胜利。建国后，全县人民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

（根据历史档案资料和群众口碑材料整理）

抗联十二团三合屯战斗纪实

白 宗 林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六军十二团在中共讷河地下县委的配合与支援下，先后在讷河、克山、德都一带同日伪军周旋，进行了大小百余次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拖住了日本侵略者扩大侵略战争的后腿。三合屯全歼伪警察讨伐队就是一次比较有名的战斗。

三合屯当时为伪满讷河县五区龙河警察署所辖（今红五月农场），距天字二十号（今友好乡国庆村）只隔一道山。地处嫩江县东南，德都县西北，讷河县东北，是三县交界的结合部，所以人们给这个屯子起名三合屯。1940年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切断抗日联军与群众的联系，大搞移民并村，将三合屯强行划并到邻近的其他屯子。这个屯原住二十几户人家，靠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有6家，其余都是靠给地主扛大活或做短工，冬天进山倒套子、烧炭维持生活。庄稼一上场，地主收地租子，警察催出荷粮、要捐税，借机敲诈勒索。

老百姓忙乎一年，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只得靠吃土豆，挖野菜填饱肚子。人们天天想着、夜夜盼着祖国光复过上安稳日子。

1939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六军十二团由参谋长冯治纲、团政治处主任王钧率领，来到龙河一带山区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中共讷河地下县委负责人方冰玉、老成等同志受北满省委负责人李兆麟的派遣，也随军来到这里。因三合屯紧靠山脚下，是进出山的必经之地，抗日联军和讷河地下县委负责人方冰玉也经常进出这个屯，黑天来，白天走。一来就和老百姓唠家常，给老百姓挑水、劈柴、扫院子、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亲密如一家。每当抗联队伍进屯子，人民群众就争着抢着给做饭。屯里人进山也经常碰到抗日联军，战士们象亲人一样留他们吃饭，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使大家明白抗日救国的道理，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有些群众主动给抗联送信、送粮、领路，同抗联战士结成了亲密关系。扛大活出身、受过日本鬼子和伪警察毒打的王有、张宝林等群众，很快加入了抗日救国会，成了抗日积极分子。

抗日联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消息，很快传到讷河县公署日本人副县长田崎库三的耳朵里。这个讷河县的实际统治者大为震惊，连连说："大大的不得了！"急忙调兵遣将，拼凑60余名伪警察组成讨伐队。由伪警佐袁中立率领，在龙河天字二十号一带各主要屯落驻守，妄图击溃抗日联军，破坏抗日军民的抗日救国活动。三合屯是天字二十号警察分驻所的辖区，因其处在进山要路口，伪警佐袁中立经过精心策划，调派25名伪警察和当地的20来名伪自卫团编成

一个中队，下设警察和自卫团两个小队，派兵痞出身的伪警尉赵海山任中队长率队驻守，并由警尉补吴春元充其副手，以执行其日本主子交给的所谓“防堵‘共产匪团，’”的使命。

5月的一天，这帮伪警察和自卫团丁共40余人，歪戴帽子，斜背着大枪，一窝蜂似的来到了三合屯。一进屯就呼哈喊叫，连打带骂，强占了几家佃户住的房子安顿下来。中队部设在屯子中间一座较为坚固的房子里。伪警察大部分住在这里。伪自卫团住在屯子西头。还有几名警察和自卫团住在中队部附近。这样形成犄角之势，一旦一处被包围，其它两处可来救援，防止被一窝端。他们成天说“保护”老百姓有功，向老百姓要好吃的。杀猪宰羊、偷鸡摸狗，全屯的鸡鸭和蛋几乎被他们吃光了。平时强迫妇女给他们洗衣服、补袜子。男人们下地回来还得给他们挑水、蹓马、扫院子，稍不如意张嘴就骂，举手就打。谁若反抗，就给扣上反满抗日的帽子，送到天字二十号警察分驻所关押、刑讯。人们去地里种地、铲地都要受到严格的监视。几个人见面唠唠家常，他们也派人暗中偷听。哪家来了串亲戚的客人，不但要报告，还要盘问个六门到底，最后得保人出据保条，才能限期住三两天。搞得全屯子人人受惊、鸡犬不宁。敌人的严密封锁，使群众的抗日救国活动受到阻碍，给抗日联军筹的粮食、衣物也送不进山。讷河地下县委几次派人进山向冯参谋长报告三合屯伪警察讨伐队的罪恶行径和兵力部署情况，要求尽快除掉这伙穷凶极恶的讨伐队。冯参谋长和王主任根据讷河地下县委的意见和群众的强烈要求，决定歼灭这伙伪军讨伐队，打掉敌

人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但为了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影响，命令指战员以政治攻势为主，配合军事压力，只要敌人放下武器，就不伤害他们的性命。

6月7日晚，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凉风裹着不大不小的雨下个不停，冯参谋长和王主任率30余名抗联战士，借着雨幕的掩护悄悄下了山，人不知鬼不觉的将三合屯包围起来，先摸掉了屯子东西两头的岗哨，向他们简短交待抗联的俘虏政策后，命令他们带路，向伪军警喊话：交枪不杀，立功赎罪。

伪讨伐队当晚值班的是伪警尉补吴春元。这个狡猾的家伙总怕老窝被端，督饬5名值班警察轮流警戒。天空乌云低暗，几步以外什么东西也看不清，吴春元命令他的部下用耳听。但外面风声、雨声、犬吠声混杂在一起，辨别不出有什么特殊动静。午夜零时，吴春元凭他长时期当汉奸的警觉，从犬吠声中辨别出了情况异常。正要派人通知外面两个据点，可是已经晚了。住着警察和自卫团的房子已被抗联分别包围，就听屯子四处喊着："抗日联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替鬼子卖命没有好下场"！连两个岗哨也向他们喊："咱们被包围了，抗日联军对俘虏不打不骂，要回家发给路费！"这此伏彼起的喊声吓的警察们不知所措，有的警察听到同伴的喊话半信半疑，很想弄个明白。吴春元从机枪射手那夺过轻机枪就往喊话的地方扫射。抗日联军见敌人开了枪，火力还很猛，也往敌人机枪响处还击。几个火力点几乎是同时里外展开了对射。中队部的敌人依靠室内墙垛子掩护，发挥轻机枪的火力，拼命

向外射击。抗联因地形不利，又不想多伤敌人未采用爆破手段，一时难分上下。激战双方枪声爆豆般的响成一片。

冯参谋长同王主任经过分析认为，抗日联军同时对付几个火力点，兵力分散，一时很难打败敌人。决定立即调整部署，把兵力相对集中，先拔掉敌人外围火力点，最后集中力量拿下中队部。于是，只留少部分人佯攻中队部，封住门窗，大部分人撤出来围攻敌人外围据点。

屯子西头的自卫团小队住在一个三间房的东屋，听到抗日联军喊话，自卫团丁吓的连衣裳都没顾得穿，赤条条的趴在炕沿下不敢起来。姓包的小队长硬着头皮，领着几个胆子大的的自卫团丁躲在墙角，向外胡乱打枪。抗日联军一阵枪把自卫团住屋的墙壁打的哗哗往下掉土，硝烟和泥土把自卫团丁呛得睁不开眼睛，也顾不上打枪了。抗联战士听到屋里枪声稀疏下来，就停止了射击，再次向屋里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决不伤害你们，再要顽抗，就叫你们和这房子同归于尽！"团丁们听到这喊话声，吓的浑身哆嗦成一个蛋。有几个人小声试探说："包队长，你快拿个主意吧，晚了咱们可都完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谁管呢"？这位包队长见外面攻势越来越紧，弄不清抗联来多少人，自己的部下听到枪声就吓麻爪了，趴到炕下不敢动弹，还老让自己拿主意。抵抗也顶不多大一会儿，还得伤人。抗联那边说优待俘虏，只好投降了。遂有气无力地朝门外边喊："抗联先生，请别打枪，我们缴枪！"这帮自卫团丁按照抗联的命令，把枪和子弹先从窗户扔出来，人由包小队长领头，从屋里一个跟一个走出来。与此同时，另一个外围

火力点也被抗联拿了下来。

抗联除留少数人看管俘虏和对天字二十号方向实施警戒外，其余全部投入了围攻中队部的战斗。机枪步枪死死封住了敌中队部的门窗，盖住了敌人的火力。敌人轻机枪也突然打不响了。抗日联军乘势冲到敌中队部窗下，正要砸门往里冲，敌人的轻机枪又象爆豆似的响起来，双方隔着窗户展开了激战。抗联组织交叉火力封住窗口，使敌人的轻机枪叫不出声来。警察们趴到地下不敢抬头，子弹也剩不多了，火力越来越弱，眼看中队部就要被攻下来了，中队长赵海山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日本鬼子的忠实走卒警尉补吴春元，操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学着其日本主子的样子，呀呀喊着，从屋里窜出去。他以为他的同伙也会跟着冲出去，杀开一条血路，同那两个据点的兵力会合，借着地形熟的优势同抗联周旋，伺机反扑。抗联战士哪能叫他逃出去，呼啦一下子就把他围在当中，但不想伤他，只同他招招架架，让他放下武器。可他心起手辣，见抗联战士只遮挡不还手，猛然做出几个连续冲刺动作，使两名抗联战士受了轻伤。这下可把战士们激怒了，立时几支仇但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前后胸，几乎是同时扣动了扳机。这小子伤了两名抗联战士自以为得了手，往起一跃想冲出包围圈，就在这时复仇的枪声齐鸣，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他登时倒在地上完蛋了。抗联战士乘势开门冲进屋里，把中队长赵海山及其部下20来人全部缴了械，集中到中队部的大房子里。

王主任向他们宣传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景，最后说："日本鬼子的洋情睫不长了，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能给日本

鬼子卖命，这样对不起祖宗，会受到人民的审判。爱国不分先后，抗战不分早晚，你们现在觉醒也不迟，只要不再替日本鬼子卖命我们就宽大。愿意回家的发路费，愿意参加抗日联军的就跟我们走，日本鬼子的东西一律没收，你们自己的东西是谁的归谁，我们一点也不要。”

王主任讲完了话，伪警察和自卫团脱下了外衣，领了路费，各自走了。有六、七名自卫团丁申请参加了抗日联军。抗日联军带着缴获的40余支长短枪、大批子弹和伪警服装，背足了粮食，情绪高昂地撤回山里。

山林队抗日活动三则

白宗林

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后，全国各阶层人民面临两种命运的抉择。讷河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誓死不当亡国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连一些过去打家劫舍的草莽英雄也树起了抗日大旗，组成了抗日山林队，与全县人民共赴国难，打击日本侵略者，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

当时伪讷河县长崔福坤，面对全县抗日的烽火四起的严峻形势，以保境安民的名义，从原自卫团中抽调120名战斗力强的团丁编成游击大队。又在各地招募80名游击队员，把游击大队扩充到200人。又把散驻各处的警察选拔出160名编成公安大队。用这些武装配合军警分赴全县各地，以“剿匪”为名围剿抗日山林队。为确保县城的安全，他绞尽脑汁，从城内的警察、自卫团中选拔200名编成城防队，把各工商户雇用的更夫更丁240名编成护仓队、日夜巡逻，配合军警把

守县城。

讷河人民看到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对日本侵略者更加仇恨，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使日本鬼子到处挨打，日夜不得安宁。

“天下红”、“卢明谦”会攻讷河城

1932年8月6日，讷河县城沦陷刚满一个月，抗日义勇军徐子鹤部围攻县城，击毙伪旅长徐宝珍，把崔福坤吓的魂飞魄散。他一面加紧训练城防队和扎枪队，一面从城内外抓来几千民夫，把城壕深挖5尺，又用挖出来的土把城墙加高五尺，在四个城角增修了炮台，与四个城门的炮台遥相呼应，大大增强了防守能力。入冬后，城壕里的水全部结冰，县城失去了一道天然防线。城内防守的兵力只有警察、商团400余人。驻防的伪陆军第四旅长徐宝珍被义勇军击毙后，由省派收城大员贾金铭参议官主事。部队除少部分下乡“往壕”外，其余的全被调往他处，只剩下旅部一个空架子。

崔福坤深怕丢掉县城无法向日本主子交待，便偷偷地把在乡下的公安大队和一部分游击队调进城里。山林队攻城的前一天晚上，下乡“往剿”的伪陆军第四旅骑兵第五团高团长带领骑兵500余人返回了县城，给崔福坤壮了胆。11月26日夜间，抗日山林队“天下红”、“卢明谦”、“天龙”等部千余人，号称五千人，从西、南、东围攻县城。

崔福坤强装镇静，亲自到各处督战。命扎枪队死守城墙，城防队把守四个城门和要害部位，调进城的公安大队和游击队占据炮台、房顶用轻、重机枪封锁四门和防守薄弱环节。省派接收大员贾金铭令前一天返城的伪骑兵第五团高团长配

合公安、城防商团各队拼命抵抗。山林队神枪手很多，夜间顺着子流子（弹道）就可以击中对方。接火不久，就击毙伪警士富延金、李耀全二人，击伤霍庆林、荆福全等多人，伪骑兵第五团士兵也有多人受伤。但由于山林队缺乏统一指挥，攻击形不成拳头，致使贻误了战机。激战五小时，天已渐亮，伪骑兵第五团从北面包抄过来，山林队只得向东南方向撤出战斗。

“天命”、“北侯”伏击警察队

抗日山林队“天合”、“北侯”等部经常活动在拉哈、通南一带，袭击伪警察署、警察分所和小股日伪军讨伐队。1934年（伪康德元年）8月18日，伪讷河县警务局局长孙云升得到山林队“天合”、“北侯”两部到徐家围子（今和盛乡驻地）一带活动的情报后，立即调集讷河、拉哈两地的警察和自卫团140人赶赴徐家围子讨伐。待他们大队人马到来时，山林队早已走的无影无踪了。这些伪警和自卫团丁平时养尊处优，这次日行百余里虽是坐在抓来的大车上，却也弄的人困马乏。到后强迫老百姓杀猪宰羊慰劳他们，大吃大喝折腾一宿。第二天早晨返回县城，刚走到半路，忽然遇到农民来报告，说“天合”、“北侯”的人马有二三十人在刘炳三屯（徐家围子）附近住着呢。伪警务局长经过再三盘问，确信情报可靠，立即命令拉哈警察署署长崔振宣率所部警察、自卫团60余名前去“讨伐”，并叫那个报信的农民做向导。崔振宣唯恐失掉战机，督促人马急急赶路。走到一片高粱地时，突然从地里传来激烈的枪声，几个警察和自卫团丁应声倒地。那个报信的农民趁乱，猫腰钻到高粱地不见了。

伪警察署长崔振宣情知中计，急忙大喊："弟兄们卧倒，给我顶住！"并用枪逼着他的部下拼命往高粱地里打枪。山林队在暗处，占据着小土岗，地形有利，枪一响敌人不死即伤。伪警察和自卫团丁在明处，地形又失利，虽疯狂地反扑，也打不到山林队。平日吹胡子瞪眼的伪警察署长崔振宣现在成了抗日山林队的活靶子，这家伙听到子弹在他身前身后突噜突噜乱飞，吓的忙趴到车辙沟里隐蔽。几分钟后，他就被山林队打死。伪警士王德胜总想升官发财，见他的上司断了气，想冒险露一手好升个一官半职的，就从车辙沟里跃起来大呼："兄弟们，咱们往里冲啊！"可是他的话没人听。王德胜刚往高粱地里蹿搭两步，就中弹身亡。其他人见署长已死，王德胜丧命，谁还肯白送死，便各自四散逃命去了。山林队击毙了伪警察署长和几名伪警察、自卫团丁，缴获长短枪十来支，子弹近千发。之后，从高粱地里转移，追击伪警务局长孙云升去了。

伪警务局长孙云升刚回县城不久，崔振宣的残兵败将就赶回来向他报告惨遭山林队伏击的情况。孙云升听后如五雷轰顶，他想死了几个喽罗倒不算什么，怕的是日本主子怪罪他带兵不力。于是连夜调整部署，于8月19日率伪警察、自卫团向刘炳三屯奔袭。他吸取前一天遭伏击的教训，出发时命令他的喽罗们分散开搜索前进。队伍行到拉哈镇东南的孙家子屯高粱地边，正要进行搜索，突然从地里射出密集的子弹，自卫团丁金永林等当即中弹倒地。幸而队伍分散，虽遭伏击伤亡不大，但把孙云升吓出一身冷汗。他仰仗人多势众，命令伪警察、自卫团匍匐前进，包围高粱地。指挥轻机枪在正面

顺高粱地垅沟猛烈扫射，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山林队打死打伤几名伪警和自卫团丁后主动撤走。

"平康德"严惩日伪军

1934年溥仪登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立年号为康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有位草莽出身，后投靠马占山参加过江桥抗战的英雄邓文山，听到这个消息更是义愤填膺，遂组织一支百余人的队伍，报号"平康德"，公开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他双手打枪，百发百中，率山林队战斗在北起满洲里，南至富裕，东达海伦、西抵内蒙古的广大地区。在讷河、嫩江、克山、德都等地多次同日伪军交战，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1934年（伪康德元年）4月20日，"平康德"率60余人到克山县的海城窝堡屯活动。伪讷河县警察队得到消息后，由分队长史明华率领160余名警察前去"往剿"。上午11时许双方接火，山林队伍靠各家各户院墙阻击敌人，激战四个多小时，伪警察被打伤好几个，伍连山林队的阵地边都没摸到。史明华十分急躁，挥舞着盒子枪督促部下往上冲。刚接近山林队的阵地，山林队飞来一弹穿透他的腹部，当即一命呜呼了。其他警察见分队长被打死，立刻回头逃窜而去。

同年7月28日，伪讷河县警察队探知"平康德"在讷南镇徐家园子屯为穷苦老百姓筹粮，立即派分队长郑广和率100余名警察前去"讨伐"。接火后激战三个多小时，胜负未果。郑广和求功心切，站起身来向山林队阵地猛烈打枪，他身边的警察也从地下爬起来向山林队射击。"打鸟先打头，擒贼先擒王"，山林队神枪手瞄准郑广和就是一枪，将其

打死。警察们见带队的死了，谁还肯卖命？也就不约而同地撤出了战斗。

1935年（伪康德2年）1月16日，“平康德”率70余名山林队员到鲁家窝堡屯向大户筹粮。该屯的汉奸甲长密报到县里，伪讷河县警务局日本指导官福原元晴和警察队中队长霍元贞率三个分队100余人，于第二天上午9时出发追剿。中午12时双方接火，伪警一分队从屯子西往里攻，三分队从北、南两个方向进攻，对山林队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山林队首领邓文山冷静、沉着应战。指挥山林队占据大院，依托高墙固守，敌人不靠近不开枪。只要枪响敌人不死即伤。激战两个多小时，警察队始终靠不上屯子边。这时一分队警察王金玉向分队长姜凤翔献计在西面佯攻，从北面骑马攻入，并自告奋勇充当突袭队员。得到批准后，这小子打马就往屯子里冲，把后边的马队给甩下一大截。待他突进屯里时，山林队高墙上的神枪手一顿盖头枪把他后边的马队给盖住了。王金玉一人东突一下，西撞一下，突不进去，也退不出来。正在此时，山林队阵地飞来一枪，把他打掉马下。日本指导官福原元晴见此情势很着急，几次挥舞战刀逼着警察队往屯子里冲。可是冲了几次都没有效果。战至晚间10时许，山林队借着夜幕的掩护从东北方向撤出了屯子。

伪龙河警察分所的警察依仗山高皇帝远，经常下乡打骂老百姓、索取钱财。邓文山知道后非常气愤，就选定一天夜里率20余名山林队员，惩治这帮走狗。当夜翻墙突入龙河警察分所院内，摸进屋里大喝一声“平康德来了！”这些平时对老百姓非打即骂的警察官们，听到“平康德”三个字吓

的浑身哆嗦成一个团儿。邓文山警告他们：一不要再给日本鬼子卖命，二不要欺压老百姓。如不改邪归正，下次来就要你们的脑袋！伪警察们连说："再也不敢了。"

涂寿升被日寇毒死前后

甘葆荣

涂寿升，字鹤龄，绰号小郎，鄂温克族，家住讷河县占仁村占仁屯（今兴旺乡鄂温克村）。1899年出生于一个世袭牛录章京之家（汉译“佐领”，掌管所属的户口、田宅、兵籍、诉讼等），是个财主。幼年读书，毕业于黑龙江省陆军军官学校。民国时期曾在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部下当连长、营长，是吴俊升的干儿子。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后，他没有投降日寇，带领所辖部分队伍返回家乡，想保卫家乡的财产不受损失。当年马占山将军率部与日本军队在泰来县江桥开战，他参加了这一著名战斗。1932年他率领部队在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和阿里河一带活动，主要想招兵买马成立内蒙古自治军，与日本军队作战。1933年冬被日本军队收编，当上了伪兴安东省（驻扎兰屯）警备军二团上校团长。1934年农历十月初六日卒。

马占山将军三次邀其参加江桥抗战

1931年，马占山将军为了抗日救国，三次来到讷河县占仁村占仁屯，请涂鹤龄率部赴泰来县江桥参加阻击日本侵略者。第一次邀请被他父亲西乌亭给拒绝了。西乌亭是个思想很旧，家庭礼教很严，没有民族气节的人。他千方百计不让涂鹤龄参与打日本人。第二次马占山来讷河邀请他，虽口头同意了但表示军队少，给养不足，要做好准备再去。第三次马占山来到他家，他摆脱了父亲的阻挠，带领100多名骑兵出山，编入马占山骑兵二旅任团长，参加了江桥抗战。

在江桥阻击战中，他指挥战斗果断有力，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充分显示了鄂温克族人英勇善战的顽强精神。他指挥骑兵团打退日军的三次进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夜袭日本关东军石泉大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由南满大举向西满和北满入侵。日本关东军石泉大队侵入讷河县拉哈镇。一天晚上10点来钟，涂叫副官李长盛传令依扎布（苏连长）到团部，向二人说明了敌情，命令李、苏带领35人的骑兵队夜袭拉哈镇的日本关东军石泉大队。李副官和苏连长带领骑兵立刻出发。部队到达预定地点后，下了马桩，按照预先侦察的敌情作了军事部署。深夜十一点多钟战斗打响了，苏连长带领部队摸进日本军营，进行殊死的拼杀。日军石泉大队长吼叫着指挥部下反扑，几次被苏连长和李副官率部给打了回去。后半夜一点钟左右，涂寿升率50多名骑兵增援。官兵们见涂团长亲自率骑兵来支援，战斗意志更旺，越打越勇，日军伤亡大增。战到次日凌晨四点，日本侵略军支持不住，

急忙向宁年（富裕）方向败退。涂团长带兵追击，并将通往宁年的铁路扒掉三公里。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本关东军石泉大队50多人，缴获不少枪支、弹药等。他率部回到占仁村时，鲜红的太阳已从东方升起。

警备军司令设宴毒死涂寿升

1934年（大同二年）农历五月初，涂寿升的骑兵部队在没有军饷、给养不足的情况下，被日伪军收编。他率部由讷河去扎兰屯（伪兴安东省省会），被编入兴安东省警备军二团，驻防博克图。日本关东军对涂寿升不放心，给他派去个伊藤指导官掌实权，部队一切行动都得听从他的指挥。涂寿升名为团长，实际是个傀儡。他对此极为不满，加之早就对日本侵华十分仇恨，又在部队无法生存的情况下被就抚，所以他从内心深处憎恨日本侵略者。伊藤指导官约他研究部队的事情，他总是借故有病不去参加；伊藤几次到他家拜访，他都拒之门外。他经常向藤官李长盛说："别忘了咱们是中国人，要有民族气节"。伊藤指导官看出他和日本人离心离德，还有"反满抗日"思想，不听指挥，留下是个后患，不如早日除掉。但公开杀他对稳定其所属部队不利，就向上司报告，设法暗中杀害。1934年9月的一天，伪兴安东省警备军司令（日本人）摆下毒宴，邀请涂寿升和驻防齐齐哈尔警备军三团张效周团长（此人也有反满抗日思想）赴席。宴会设两张桌，日本司令、伊藤指导官和涂寿升、张效周一张桌，藤行副官、马弁等人一张桌。日本人事先在首桌的酒中放了慢性毒药。酒足饭饱之后，送他们回到部队。

宴会后的第五天，涂寿升和张效周相继发病。发作时

头痛的厉害，眼睛看不见东西，嘴不能说话。涂寿升的母亲去找刘军医，让他救救儿子。刘军医说："这可能是中毒，我没有办法救他"。后将涂寿升送往扎兰屯日本医院治疗，不久死在那里。涂寿升死后第二天，张效周也发病死去了。

涂寿升被暗害以后，日本人为了笼络人心，稳定伪军官兵情绪，对其厚礼殡葬，将涂寿升灵柩从博克图用火车运回拉哈站，派一个连兵力护送，并用32杠抬回古仁村。那天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搭了灵棚，扎了纸人纸马、金桥、银桥和金童玉女；从齐市请来八位道士诵经，雇四伙吹鼓手，杀猪宰羊请三套碗的酒席大办了七天，在坟地立了墓碑，修了墓门，四周筑了围墙。讷河各界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葬礼，送葬的有1000多人。

事后，日本人还将毕业于南京大学的涂团长弟弟涂仲三委任为少校营长（群众称三营长），负责齐齐哈尔至扎兰屯之间的护路任务。其实实权操在日本人手里。

涂寿升、张效周之死，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心狠手毒，杀害中国人不择手段。

（根据涂寿升副官李长盛口碑材料和涂寿升妹妹涂景文口述整理）

回忆伪满时当劳工的遭遇

夏学柱

伪满时期要劳工是日伪对中国人民的残害，有许多中国人出劳工丧了命。我家住在讷河县亲仁村王老哑屯（现永丰乡城北村三屯），全家七口人，有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妹妹，自养马一匹、牛一头，靠租种地维持生活，日子过的很紧巴。一九四五年（康德十二年）农历三月中旬的一天，屯长尹殿俊来我家通知说："你们哥俩个得去一个劳工，这是上指下派，时间五个月。"并告诉那天到村上报到。让我们家去一个劳工的事，如同凉水浇头、怀里抱冰，全家人心凉了半截。屯长的通知就是命令，谁也违抗不了。父母只好同全家人商量谁去。哥哥夏学栋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和嫂子结婚时间不长，他要走了全家人的生活无法维持。没有办法，只好叫我去，当时我二十三岁。到了按规定报到的日期，我带上一床被被、一个破褥子、一张狍皮和

两件旧单衣服，与我们屯的王普财、吴永清一块到村上报到。我临走的时候，全家人难舍难离，含着泪水送我，心情实在难过。到村上点名后，统一到县动员科报到，然后编队，我被编入一中队二小队，中队长是沈殿臣。当天下午6点多钟从讷河步行出发，直奔拉哈。由于道路不好，加上越走越黑，整整走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日头冒红才到拉哈镇。大家走的又困又累。中午在一个学校吃了一顿高粮米饭，休息到下午五点多钟，全中队一百六十多名劳工继续步行去黄蒿沟。因道路不熟，又走了一宿，经过平阳镇、查哈阳到天亮才到黄蒿沟。当天重新整顿队伍，把我们改为二中队二小队，任务是修顺水壕。我们住的是草苫的地窨子，也叫劳工棚子，每个小队四十人住在一个地窨子里。没有炕，不见阳光，一进棚子又闷又潮，夏季炎热，晚上蚊子咬，睡觉前得用潮湿的柴草点火用烟熏蚊子。外边下雨，屋里滴水。干活就是挖土、挑土筐，中队每天按小队人数给任务，平均每人一天挑一立方米土，完不成不准收工。日本人不顾劳工死活，干重活，吃不饱，每天早晨一人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一小碗小米粥，白菜拌盐当咸菜。中午高粱米或是玉米查子干饭，每人一二大碗，一小碗土豆带皮煮的汤。晚饭每人一二大碗小米粥或是碗子面，白菜拌盐的咸菜，吃的全是霉害有味的粮食。根本吃不饱，天天饿着肚子干活。可是中队以上的头头都住火炕，单碗办伙，吃细粮。

日本人对劳工的死活根本不在乎，死个劳工不如死个小猫。我们到黄蒿沟一个多月，发生一起十分痛心的事件。一天夜里，离我们住处不过五百米的一个劳工棚子突然失火。因

为是夜间，全小队四十多名劳工都睡着了，火势越烧越大，浓烟满室，劳工被呛醒后都蒙了，只跑出二十多人，当时就有十二个人被活活烧死，有一个烧成重伤，没人给抢救，活了一天多也死了。全是讷河的劳工。有一个二十三岁小伙子，结婚三天去劳工在这里被烧死。天亮时我们去现场一看，烧的认不出面目，大家都掉了泪，心里特别难受。可是中队报告大队后，来两个日本人看后哇啦几句就走啦。中队指派劳工把死者尸首归到一块，倒上汽油烧了，再把骨头按姓名分成十三份，装入小木箱里送回讷河就算了事。现在回忆起这件事心里还在难受。

劳工中队长为日本人效劳，心狠手辣。在黄蒿沟有一名劳工想家，偷偷的跑回讷河。被发现后立即通知讷河县公署，很快被抓住送回劳工队。他把讷河的劳工集中到一起，指派劳工用扁担打他的屁股。大家都是受苦难的人，下不了手，只是轻轻的打。在场的中队长郝恩波来了气，抢下扁担亲手打，两下就把扁担打断了，把这个劳工打的屁股上青一块、紫一块。打完后还得忍着疼痛去干活，吓得其他劳工想跑也不敢跑了。

五月节快到了，劳工们都盼望过节能改善生活。经中队批准，给每人四两黑面，一两猪肉，还买了十几斤白菜。正准备过节，没想到农历五月初三来了通知，叫讷河的一百四十多名劳工在五月初四转移去五岔沟。没办法，各小队只好提前过节。初四的早晨烙的黑面饼，煮了一锅白菜汤，加点肉星，按人分着吃。这就算过节啦。早饭后，劳工们把自己的行装收拾好，步行走到拉哈坐上货车，直奔五岔沟。五月初

六的早晨到了西口车站。到五岔沟后我们改为一中队二小队，任务是为日本人修陆军医院。那里是边防地区，距离苏联仅有一百华里，全是山沟，我们仍住地窨子，早、晚蚊子多，中午瞎蠓多，生活更苦。伙食还是吃那些霉坏了的玉米面、高粱米、玉米査子、小米，数量有减不增，天天饿着肚子干活。在这干到一个月时，我连想家带上火，加上水土不服，得了伤寒病。严重时不能起炕，想喝口水也得等到劳工干完活收工回来给点水；吃的是劳工的饭，一连好几天没吃东西。没有地方买药就硬挺着。劳工住地有个日本小医院，劳工有病去医院打一针就死了。多亏劳工们照顾我，挺了一个多月才好啦，没送了命。

五岔沟的日本人心更狠、手更毒。我们修陆军医院的任务快要结尾时，一天晚上来了一个生人，一问是哈尔滨劳工。他们距离我们这五里多远，是挖山洞子的，已经挖完了。日本人为了保密，把挖山洞子的八百多名哈尔滨劳工赶进山洞里，然后把门堵死，把劳工们活活憋死。就他一个人偷跑出来啦，这个人一边说一边哭，我们听了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真是太残忍啦！

到了七月中旬，工程快要完了，我们看到日本人一个个象霜打的茄子——蔫蔫了。这几天苏联的飞机三天两头就来轰炸一气就飞走了。劳工们小声议论、猜测：可能日本人要完蛋了。没过几天，来了几个日本人比比划划的说：讷河的劳工统统回去。大家一听心里象开了两扇门，可当时是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快回家见亲人了，犯愁的是往家走没人管，人生地不熟，离讷河这么远，可怎么走呢。我们大家

一商量，还是一块奔西口车站坐火车走。事情这样定了，大伙背着行装步行前进，当时我病的不能走路，遇上辽宁省的劳工有个马车，和人家商量坐马车到西口车站。走道饿了就拣点日本人扔的霉玉米面用凉水送下去。到西口车站火车不让坐，车里坐的全是日本人。这站不行就顺着铁道奔下站。饿了没啥吃的，遇到人家用行李换点土豆烧一烧对付吃，一直走到德百寺火车站，这时人已经走散了。我和马凤山两个人到了车站，正赶上有火车，开始列车员不让坐，好话说了九千六才让我们俩坐在车厢外边，走了一天多到了白城子，才知道解放了。

到了白城子有火车也不让坐。正巧又遇上六个讷河的劳工，有个姓王的，在白城子有熟人，他在郊区找了个姓张的地主家，我们在他家白吃饭白干活，住了十二天。这时火车让坐了，我们八个人，从白城子上火车回到讷河，整整走了二十二天。当我走进家门时，全家人喜泪盈眶，母亲拉着手连叫几声：儿子，妈可把你盼回来了。把日本子赶出中国，再也不受日本子气了！

为了喜庆我能活着回来，家中尽管生活困难也杀了一口小猪，请全屯老亲少友吃了一顿庆贺饭，一是喜庆祖国光复，中国人民再不受日本人的欺负；二是喜庆我死里逃生，从苦海中返回家乡重见亲人。

（万魁廷整理）

忆伪满拉哈国民优级学校

张殿英

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十四年，在政治上进行血腥统治和镇压，在军事上围剿我抗日联军，在经济上掠夺我丰富的资源，在文化教育上实行极其恶毒的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我的少年时代正是在这个时期度过的。

那时伪满洲国也设官办学校，小学叫国民小学校，高小叫国民优级学校，中学叫国民高等学校。我家住在拉哈镇，1940年我进入拉哈国民小学校，学校在拉哈的西大庙，只有12个班级，教室非常简陋，是十几间的破草房。最好的房子是教导处，五间一面青的砖平房。不少教室夏天漏雨，外面大下室内小下，春秋不避风，冬季更难熬。发点煤不多，加上那时候同学家都挺穷，穿戴又不佳，很多学生冬天手脚都冻坏了，天天晚上放学回家用茄秸水烫脚洗手，医治冻伤。

学校的课程设置，除了语文、算术、历史、体育、音乐以外，还有日语。教材是伪满洲国教育部统一编印的，内容全部是奴化的。地理和历史，也是东北三省的，同学们从书本里看不出一个中国的字样，根本不知道还有个中国。老师和父母也不敢说。那时候思想统治是极其严酷的，知识分子不说什么，都常常遭到无端的迫害，以思想犯被抓进监狱，甚至迫害致死。我的那些老师，也都提心吊胆地讲课。那时候的饭店、浴池、戏院、商号室内的墙上都张贴着："守口如瓶，莫谈国事"的标语，白色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小镇。我清楚地记得，一天父亲的老朋友来，在家里唠嗑，我听他们谈到"反满抗日"一词，我问啥叫"反满抗日？"父亲立刻严厉的说："大人说话，小孩别问。你不懂，出去玩去吧！"说我不懂，我也朦朦胧胧地懂了一点，知道他们说的是大事，不能随便说。

小学校每天有一节日语，等到了国民优级学校，每天增加到两节，要求用简单的日语对话。其实那些是不合实际的要求，连教师也会不多少，学生学那玩艺没兴趣，谁会？会不会非逼你说几句不可，早晨见到老师必须用日语问好："深塞义，呕哈悠狗栽依马斯！"放学与老师告别也要说："深塞义，杀悠那拉！"我们小孩不懂什么叫亡国奴，老师有知识，什么都知道，自己当了亡国奴教师，能认真教学生日语吗？那心情是沉重的。在学校里每天早晨都要上早会，全校同学集合在一起，升伪满洲国的国旗，背诏书。到了优级学校以后，还用日语背"国民训"，面对日本国方向遥拜神社。这些消耗了学生极其宝贵的时光。

我是一九四四年升入国民优级学校的，这时日寇更加紧对我国青少年的奴化教育和愚昧政策。一进校门，有个黑色的大影壁上面写着“忠孝仁爱”四个大白字，叫你看了阴森森的，有一种不快的感觉。本来学生家里都挺贫寒，吃饭穿衣都很艰难，还必须购买统一的绿色校服，头上也戴战斗帽，穿戴起来和小小日伪兵一样。有少数同学因为家里依靠卖柴禾和种菜为生，买不起校服，含泪辍学了。发了校服不久，还要掏钱买布手巾，那上面印着兰色的大字：“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大东亚共荣圈万岁！”、“满洲国万岁！”等等，与其说是手巾，还不如说是政治宣传单。不管日寇怎样统治、宣传，它注定要灭亡的命运，一天天地显出来。开始组织学生挖防空壕了，好好的校园、操场，到处挖曲形一米深的防空壕、玻璃窗贴上米字形的白纸条。火车站东封锁一年以后，突然出现了十几座水泥飞机包（飞机防空洞）。

我从进入国民优级学校以后，每天的学习时间更少了，除了增加日语课以外，每天都有体育课，做军事操练，由学校统一购置木枪，要学生扛在肩上走步、跑步、集合、就地卧倒等等。看那架式，说不定哪一天把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也要拉上前线似的。正上课，只要一听到“嗡子”响，就立刻跑向防空壕，跑慢了一点的就得就地卧倒。弄得人心慌慌。为了加强对学校的统治，还派了一个日本校长来，他的任务主要是默默地监督校长、教师的行为和思想动向。他虽然不天天到校上班，也够人毛骨悚然的，因为他随时都可以把知识分子抓进监狱，加上“反满抗日”的罪名，置之死

地。

为了消磨青少年的金子般的时光，不叫学到真正的知识，也为了它的战争需要，经常给学生下达名目繁多的“任务”：春暖花开季节，每人必须交五只活“大眼贼”。同学们停课到拉哈东山岗捉大眼贼，开始没有经验，看到洞就挖，四五个同学一天挖七八个洞，一无所获。后来记不得是谁想出用水灌的办法。因为大眼贼洞斜深一米左右，只要用水猛一灌，它就湿漉漉的从洞里往外逃，这时用两根木棍一夹就夹住了。有同学家有手推车，一人带一只水桶，一个推车可装九只水桶，装大半下水，上边再放些秫秸棒，虽然走在野甸子上水也漾不出多少。这样，一人五只大眼贼的任务，就完成了。交到学校以后，学校每天都用事先做好的笼子送到拉哈警察署。再送哪去，干什么用，就不知道了。解放后才披露，日寇为了制造细菌，秘密在哈尔滨平坊七三一部队试验用大眼贼繁殖细菌，再拿中国人做试验，杀害了大批中国爱国志士和平民百姓。那时候我们年岁小，无知，加上日寇以极其秘密的方式进行，谁也无法知晓。若知道日寇制造细菌武器，又拿中国人当他们的试验品，我们是绝不给他们抓大眼贼的。

到了夏天，叫我们挖药，说是国家需要。这实际上也不叫我们学习和掠夺我国中药资源兼而有之的。一个学生必须挖黄芹、桔梗、防风、柴胡各五斤，晒干交上去。得挖多少湿的才能晒二十斤干药材呀！我们挖累了就在草甸子上玩，混到日子完成多少算多少。

刚下小雪，又要家雀每人交十只。家雀外号叫老家贼，尖

的很。尽管你在麻雀常落的地方用谷码做"油子",用雪培的一点差样没有，它也不上当，怎么也打不住一个。盼到一个雪天，又用而板下压拍子，撒上小米、谷粒，它还是不上。有的同学采取晚上掏雀窝的办法，偶而能掏着。大多数同学都完不成"任务"。老师传上边旨意，说是皇军要吃麻雀。谁知道他们究竟要麻雀干什么？反正完不成任务，老师没办法，上边也拿我们没办法。

一年到头刚刚消停，新"任务"又下来了：要野兔。说是皇军做帽子用兔皮，把它上升到战争需要，并且刻不容缓。学校就组织全校师生到西河套去打兔子。解放前，这里雪大，哪年都没膝深。那时人们穷，同学中谁也没好脚手，大多数是母亲做的棉布鞋，没有"腰"，往里灌雪。邻居刘大叔看我没像样的棉鞋，借给我一双"水袜子"，就是后开门的单胶鞋,脚小鞋大,我就买把乌拉草砸巴砸巴揎到鞋里。全校三百多名同学由老师带领，采取排单行,围大圈,拉大网的办法，象冲锋似的从四外往中间跑，边跑边喊，倒是哄起来几只野兔。可老师再三嘱咐，千万小心，别打不着兔把同学打伤。大家边喊边缩小包围圈，把兔吓的东奔西逃，最后还是从人缝中跑掉了，大家哈哈一笑。笑声过后才感到精疲力尽，饥肠辘辘。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无所获。老师大概明白，其实不是猎获野兔，而是日伪推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才是真正目的。

讷河县地方维持会演变

甘葆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当时讷河县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时伪讷河县长郑向荣出面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组织工、商、农、学各界绅士，成立了“讷河县解放委员会”。每人佩带印有“讷河县解放委员会”字样的红袖章，改头换面又登上政治舞台。

8月19日苏联红军进驻讷河县城，郑向荣、程光烈、王汉章、阎宝强等人出面接待。苏联红军进城后建立了卫戍司令部，设在县城十字大街西南角伪警察署旧址（现在的县供销社），军队驻防火车站，维持治安秩序。11月撤离县城移驻拉哈镇。

9月初，“讷河县解放委员会”改称“讷河县地方治安维持会”，由21人组成。会长郑向荣，副会长程光烈，王汉章，内设组织、宣传、总务、经济、治安、武装六个部，每

个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一至三人。地方维持会在伪县公署旧址办公，悬挂国民党旗，门前挂“讷河县地方维持会”的牌子。主要任务：一是维持地方治安秩序；二是为苏联红军提供后勤服务；三是为国民党光复军筹集款项和购买枪支、弹药；四是迎接国民党接收讷河。并以维持地方治安秩序为名成立了民团，团总为地方绅士白青山、副团总包长美，使用苏军缴获的枪支，穿警察的黑制服，扎白色腿绑，戴镶有白帽箍和青天白日帽徽的大盖帽。成为敌伪残余利用的工具。

除讷河县城外，拉哈、老莱也相继成立了地方维持会。老莱地方维持会会长是岳兴州，副会长李克仁、刘盛武，下设宣传、总务、武装、治安四个系，每个系设一至二名负责人。同时建立一个民团，韩炳岐为民团团长。枪支、弹药由老莱地方维持会向本街的粮栈和商号筹款购买。

10月中旬，党中央从延安派金忠、张振勋等同志来讷河建立新政权。根据嫩江省委、省军区的指示，把自卫军司令部改为二军分区，金钟任司令员，任德福任副司令员，增设了政治部和后勤部。随后在民主大同盟的配合下，开展剿匪斗争，成立了讷河县民主政府。张振勋任首任县长，吴子坤任副县长兼秘书科长，民政科长宿野夫，教育科长宿野夫兼，公安局长甄玉山，讷河火车站站长马树长，邮政局长黄河源，县妇女会主任吴一光。随之解散了“讷河县地方治安维持会”、“国民党讷河县党部”和反动组织“启蒙运动委员会”，并收缴了伪官吏、伪国兵、土匪及地主的武器弹药，安定了社会秩序。

11月22日，县民主政府逮捕了伪讷河县县长、讷河县地方维持会会长郑向荣和副会长程光烈，并审讯了伪警务科长等一批伪官吏。

11月25日，光复军头子尚其悦、邢宪章等攻占讷河县城。民主政府副县长吴子坤、火车站站长马树长被俘，在南二道街英勇就义。

同年12月末，民主大同盟余部随军分区转移到嫩江县，少数人逃往外地。至此讷河大同盟停止活动。县城重新成立民团，由伪讷河街长汪复礼为团长，朱子林为副团长，共50多人分三个小队，群众称他们是自卫团。这些人都是县城商号摊钱雇用的，每月400元苏联红票。民团不着装，不带枪，佩带印有“讷河民团”字样的红袖章。其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这支民团一直坚持到嫩江省第二军分区进驻讷河城，其中大多数参加了人民自卫军。

活捉土匪"花蝴蝶"记事

万魁廷　舒景和

在讷河县境内，一些年长的人都知道"花蝴蝶"是个女土匪头子。她原是讷河妓女院的娼妓，名叫"蝶花"，以卖淫挣钱，过着青楼的生活。有个胡匪名叫"白蝶"，报字"单创"，1921年同大帮胡匪闯入讷河城，他进妓院看中了年仅17岁的"蝶花"，十分喜爱将她抢去作了老婆。"蝶花"从此跟"单创"当了胡匪，开始学打枪，练手腕，后来练成双手使匣枪，协助"单创"拉起200多人的大帮胡子，远近闻名，犯下了不少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她投靠了日本鬼子，当上了特务，干尽了坏事。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她又勾结社会上的残渣余孽、汉奸流氓拉起大帮土匪。"白蝶"报字"白蝴蝶"、"蝶花"报字"花蝴蝶"，先后在克山、克东、拜泉、北安等地进行烧、杀、抢、夺和强奸妇女等残害人民的罪恶

活动。还伙同国民党光复军尚其悦、邢宪章等在泰安镇（今依安县城）等地干尽了坏事，打死打伤我剿匪的八路军战士。我军攻打光复军尚其悦时，在泰安镇把“白蝴蝶”打死，土匪死的死、逃的逃。“花蝴蝶”一看不妙，混在妇女中逃了命，跑回长春岭（今克山农场）躲藏起来。不久，“花蝴蝶”又重整旗鼓，网罗一些地主、汉奸、警察等共100多人拉起了土匪队伍，她是当家的（土匪头子），仍报号“花蝴蝶”，继续在克山、拜泉、北安等地活动。后来又窜到富裕、讷河、甘南的平阳镇、查哈阳、阿荣旗的七道泉子、莫旗的万发屯、亚同镇、太平川、五宝山、卧拉吐（今西瓦尔图）、达子沟（今小二沟），大门庄等地干了不少坏事。她手下的匪徒强抢民财、强奸民女、烧毁房屋，无恶不作，罪行累累。

1946年11月下旬，我军为了消灭这股顽匪，驻讷河剿匪司令员任德福派出能征善战的孙景富率部围剿“花蝴蝶”。他带领100多名战士，从拉哈镇北獾子洞过江赶到查哈阳从东、南、西三个门包围了查哈阳镇，在北门外二里地处设卡子，然后四面夹攻，打得土匪落花流水，打死、打伤和活捉几十人，余下六、七十人逃往莫旗达子沟（今小二沟）一带。我剿匪部队跟踪追击，一气追了300多公里，打得“花蝴蝶”走投无路。此时孙景富巧生一计，命令部队撤退，一部分由朱老八（不知叫什么名字）带领撤到达子沟南山。一部分由孙景富带领隐蔽在山林深处，给土匪头子“花蝴蝶”造成一个八路军撤退了，该歇歇脚了的假象。之后孙景富派出侦察兵侦察匪情，很快摸消了土匪窝的情况，立即派人找当地熟悉地形的老百姓当向导，迅速把达子沟包围起

来。孙景富带领一名战士，摸到屯西头土匪瞭水的岗哨身后，用绳子把土匪背了“死狗”，到屯外树林里扒下他的衣服，摘下他的帽子后，给他一刺刀叫他见阎王去了。这位八路军战士穿上他的衣服，充当瞭水的，把部队的战士全部放进屯子，有的扮成土匪喂马的，有的扮成给土匪做饭和烧火的混进去。孙景富会几句达斡尔人的话，他换上达斡尔人的帽子，穿上狍皮大衣，领着战士大模大样的混进“花蝴蝶”和他的“四梁八柱”住宿和吃饭的屋子，到了桌子跟前亮出手枪，大吼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花蝴蝶”和小土匪头子们猛然一惊。有个小头目伸手摸枪，被孙景富抬手一枪撂倒在地，“花蝴蝶”和其他土匪头子束手被擒。

屋子外边听到枪声，战士们一齐动手，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把所有的胡匪全部擒获。随后把“花蝴蝶”和二当家的“黑蝴蝶”、炮头“山蝴蝶”三个匪首押到屯西头，召开群众大会，历数其罪行，放地枪决。这是“花蝴蝶”等匪首应得的下场。对被俘虏的50名匪徒，按照党的政策，根据本人自愿，大部分放其回家种地。

擒获并枪毙匪首“花蝴蝶”，为人民除了一大害，受到讷河及附近地区群众的一致赞扬。

活埋胡匪“二里半”经过

舒景和　万魁廷

胡匪李勇，报字“二里半”（因打枪在二里半之内弹不虚发得名），1909年生于学田乡永勤村地主家庭。日寇入侵东北后，他父亲投靠日本当汉奸，李勇给日本人当特务，为日本人搜集“反满抗日”爱国群众的情报，曾帮助日军打死打伤马占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数十人。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李勇认为当官发财的时机已到，便四处串连，网罗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伪满残余等拉起200多人的大股胡匪，他当头了，报字“二里半”，活动在讷河县的老莱、学田乡多福、幸福、工农村，清和乡的都拉本浅（今光明村四、五屯）、前博库浅（今富源村），嫩江县的后博库浅、海拉图、铁乎拉、桦木台、伊拉哈，莫旗的果尼、安阳浅、花里哨、前后火犁、大小卧拉吐、大门庄、托木口米、小黑山、前后达拉宾等地。并随光复军头子尚其悦、邢宪章攻打讷河县城、泰安镇（今依安县城）。所到之处，烧、杀、抢、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后来，尚其悦

在泰安镇被我军打垮，李勇看形势不妙，逃到讷河的胡家岗屯（今全胜乡河南村），在胡掌包家隐藏（胡也是土匪头子，报字北五路，不知姓名）。藏了半个多月，没听到抓他的消息，他又四处活动，搜罗100多个社会渣子拉起一股匪绺，他报号“扫北”。这股土匪更加猖狂，坏事干绝，罪恶累累。

1946年，这股土匪先后窜到前博库浅、东四里五屯（今清和乡保昌村）抓农会干部李景春、魏喜。因事先得到消息，胡匪扑了个空，接着又去二里五屯（今清和乡清和村）抓住民兵刘景会之后活活打死。随后又窜到长发乡刘大虎屯（今张志村）。将农会干部张志打死（张志村由纪念张志得名）。几次得手后，这伙胡匪更加变本加厉，又在讷河通往拉哈公路上的胡家岗屯（今全胜乡河南村）设伏阻击苏联红军。一天苏联红军从讷河向拉哈镇进发，胡匪“二里半”带着匪徒埋伏在路两旁，等苏联红军一进入埋伏圈，土匪开枪打死苏联红军战士一人，打伤多人。之后“二里半”率领匪徒奔学田乡多福村过江蹿到小黑山方向去了。我军驻讷河剿匪司令部接到嫩江军区的情报，得知李勇这伙胡匪住在江北小黑山。当即派孙景富、朱老八率领100多名战士前去追剿。但由于我军地形不熟，打了六、七个小时，虽消灭土匪大半，我军也遭到了伤亡，决定撤回讷河进行整休后再战。

剿匪司令部为了彻底消灭这股土匪，抓住胡匪头子李勇，及时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了下步战斗计划。会上史俊同志提出，“消灭这伙土匪，光靠硬拼不行，这样我军损失太大。要考虑智取，辅以军事压力。据说李勇和胡家岗的胡掌包关系密切，要抓住李勇必须先把胡掌包抓来，叫他去劝李

勇投降”。史俊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任司令又补充一条：抓胡掌包必须把他侄子胡二胖一块抓来做抵押。最后司令部决定，派一个班去胡家岗屯把胡掌包和胡二胖带来。任司令首先对他们进行目前形势和政策的教育，胡掌包同意去江北劝降李勇。第二天胡掌包骑马直奔江北而去，到了小黑山一打听，得知李勇这伙胡匪离开小黑山去达拉宾了。胡掌包连夜又赶到达拉宾，终于见到了李勇，先说明来意，随后劝其投降。这时李勇已知形势对己不利，匪伙走投无路，决定先表投降暂栖身。之后把土匪集中起来，宣布投降八路军的意见，不愿意的可以自讨方便。当时有30多人不愿意回家种地，跟胡掌包和李勇一起来讷河投降八路军。

投降的胡匪来到讷河时，剿匪司令部派孙景富带领一个班到北门外铁路北接收，首先命令土匪把武器放在路东，把马每五匹连一串，人举起手，站到路西，让战士把武器和马匹送回司令部。当时土匪头子看到被缴械，心里有些不满，有反抗逃跑的迹象。然后让胡掌包在头前引路，孙景富率战士们在后边押送土匪进城。这时城里任司令事先安排好了酒席，让朱老八作陪，胡掌包、李勇、总催、炮头和胡二胖坐在一张桌吃喝。酒足饭饱以后，先放胡二胖回家，其余一般成员经过教育编入了八路军队伍，最后将胡掌包、李勇、总催、炮头四人用绳子捆上，堵上嘴，分成两对装进两条麻袋，胡掌包和李勇装一条，总催和炮头装一条，把他们扔进早已挖好的两个土坑内活埋了。当时围观的群众拍手称快，都说：胡掌包和这几个土匪头子一样，干尽了坏事，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只有杀了才解民愤！

施巧计击毙胡匪“占北方”

万魁廷　舒景和

胡匪头子李桐武，报字“占北方”，家住讷河县太平庄（今清和乡金星村），出身于地主家庭，民国时期就靠与胡匪勾连强抢民财而发家。1931年“九.一八”日本鬼子侵入东北后，他又投靠日本人当上讨伐大队长，死心塌地的为日本侵略者效劳。

1945年“八.一五”祖国解放，当时兵荒马乱，李桐武就在老家太平庄网罗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等拉起200多人的绺子，他当胡匪头子，报字“占北方”。主要活动在北学田（今学田乡）、曹家地段（今老莱农场）和嫩江县的伊拉哈、橡皮山等地，干尽了烧、杀、抢、夺等罪恶勾当。他投靠光复军头于尚其悦、邢宪章，随其攻下讷河县城，逮捕了我军司令员任德福。后来苏联红军增援我军，共同击退了光复军，救出了任德福。李桐武又跟随尚其悦、邢宪章攻打泰安镇（今依安县城），又被我军打败。他逃回老家太平庄隐蔽一时，又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但没得逞。于是他就在清

和乡一带称王称霸，到处明抢暗夺，敲诈勒索，鱼肉百姓，闹得地方不得安宁，群众恨之入骨。

1945年大年三十晚上，他不在家过年，硬在离家不远的邻屯纪学书家过年，一直闹到正月初三，搅得纪家没过好年。每天酒足饭饱之后，抽足大烟，接着玩牌。在纪家呆够了，便叫纪家当家人给二里五屯（今清和乡所在地）送信，让各家各户给他安排好住处，准备大烟和好吃好喝。二里五屯得知“占北方”要去，人们胆颤心惊，敢怒不敢言。把一切准备好以后，由农户孙治忠、徐万有、陆长荣、川万良等人到纪学书家将其接来到孙治忠家住。他每天抽完了大烟，就吃喝玩乐，孙治忠等人还得挨门挨户为他齐钱，有没钱给的，就要受到他的毒打。

正在“占北方”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之时，屯里的群众刘景会、温海山对其所作所为非常气愤，俩人出主意，要干掉他。经与大家合计，晚间收拾这个害人虫。群众陆长荣说：“我也是这样想的：这小子就一个人，不用怕。可是这小子有枪，又打得准，还不叫别人到他跟前，不好办…。”刘景会接着说：“这有办法。我就一个人，假装去挂柱（当土匪），他准能信。我借一支手枪，找机会我先下手。但我没使过枪，要是打不准，跑出来可麻烦了，非伤人不可！”温海山说：“咱们先给受害人送个信，就说要干掉‘占北方’，有枪拿枪，没有枪的拿扎枪，一块消灭‘占北方’。

大家采纳了温海山的意见，立即给各屯受害者送了信。之后徐万有、刘景会到屯西头“占北方”的住地，告诉“占

北方”明天各家都能把钱送到，大烟还有先抽着。徐万有说：“刘景会就光棍一个，跳井不挂下巴，听说你要组织人马，他要来挂往，我们都算一份，安排安排家和你一起干。”刘景会接着说“掌柜的你看我行不行？”占北方说：“你是块料，就收下你，先给我通信、带马，人多了再干别的，不会委屈你。”正说着饭菜已做好了，端上了菜，摆上了酒，由徐万有、陆长荣、孙治忠、刘景会陪着吃喝。“占北方”在炕梢靠着墙垛，左手拿筷子，右手拿着枪，连吃带喝，吹五作六。饭后，徐万有、陆长荣说：“今天你就在这休息吧，明天我们接你到屯东头住几天。我们先走了。”刘景会也借机说：我去看看马蹓好了没有。他们分头来到张万友家，见各屯来的人都到齐了，温海山向大家介绍了布置的情况，并做了分工：将来的人埋伏在房前屋后，使用大枪的两个人对准后边小窗户，其他人拿扎枪躲到墙角和门旁。“占北方”从屋内出来，前前后后连打带扎他跑不了。

为消灭“占北方”刘景会从李××家借来一支手枪藏在腰里，然后假装给“占北方”喂马、蹓马，先把马牵走了，回头再看看“占北方”正头朝里，脸朝外对着门躺在南炕梢。右手拿着枪，枪纲套在手脖子上。刘景会见此情景灵机一动，向屋里说：“掌柜的你睡吧，我把马喂好，咱们俩今晚在一起睡”。说完到外边给大家报个马上下手的信，叫大家做好准备。他返回来以门框为掩护，用手枪对准“占北方”叭、叭、叭三枪，打在“占北方”的肚子上。当时没打死，这时枪卡壳了，心里很害怕，紧忙退出来。就在此时“占北方”连续往外打了几枪，但没伤着人。过了一会“占北方”听听外

边没动静想要逃跑，刚一打开窗户，就被温海山一枪打中了左腿，滚倒在地下。这时隐蔽在外边的人拿石头、土块往屋里扔，猛打了一阵。之后听"占北方"在屋里没动静，就看紧门窗，围困起来。快到天亮了，"占北方"知道自己不能好了，就把抢来的钱烧掉，从炕沿上漏出半拉脑袋望风，被温海山看见一枪把他的脑袋揭了盖。大伙到屋里一看，"占北方"脑浆直流，倒地死去。温海山找一根绳子拴住"占北方"的两条腿，然后挂在马鞍子上，骑上马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害人虫拖到西北山包喂狼去了。

击毙"占北方"的消息一传开，广大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都说为人民除了一害。1947年土地改革时，群众纷纷起来，要求镇压"占北方"的弟弟李桐生、儿子李芳（都是罪恶累累的胡匪），人民政府满足了翻身群众的要求。从此清和一带社会安定，人民过着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

宽沟子剿匪记

张丙西

宽沟子，是个老地名，今称老莱镇东风村。

1946年秋的一天，五区（今龙河镇）区委书记梁绪和同志接到一位农民报告说："宽沟子又去胡子(土匪)了"。梁书记问有多少人？来人说："大约有100来号人。"梁书记听罢，放下手里的文件，叫通讯员立即把区保安队队长崔福臣找来共同研究消灭这股土匪的计划。崔队长让梁书记在家坐阵指挥，自己带领队伍去剿匪。梁书记说："咱们两人一同去，遇到情况好商量。"说完两人带领区保安队出发了。

当时正值秋收季节，农民们正忙着起土豆、掰苞米，到处一片繁忙。当梁书记和崔队长带着保安队来到宽沟子时，太阳就要落山了。群众告诉保安队，这伙土匪是"草上飞"绺子，路过屯子抢东西又逮人，还抓鸡宰羊，搞得人心慌慌，鸡飞狗跳墙，之后骂骂咧咧朝鲍家沟方向去了。保安队员们急行军走的又饥又渴，天也黑了，梁书记和崔队长一商量

决定在屯子里住一宿，第二天再继续追剿。

吃完晚饭，派两名队员站岗，其余的都安排在老百姓家休息去了。这时屯子里有个叫宋德才的坏蛋，偷偷摸摸从屯子里溜了出去，跑到二十里外的鲍家沟给土匪通风报信说："保安队就几十人，没有好武器，打不过你们"。

土匪接到报信，几个头目一商量，决定乘保安队不防备来个夜间偷袭，就在月暗天黑的时候急急向宽沟子进发。村头站岗的保安队员一时麻痹大意，当发现有情况时，土匪已摸进村子里。这时他俩鸣了两枪，后拔腿刚跑两步，就被土匪击伤了。随后土匪直奔屯东头贺永富的五间大草房，他们误认为梁书记带着人马住在这院里。匪徒用枪托击门大喊："快开门！"贺永富手提着裤子战战兢兢地出来开大门，土匪急问："梁书记住在你家没有？""没…………没住在我家…………"，"住在谁家？""不…………不清楚…………也许住在………"，"走！给我们带路！"土匪用枪逼着贺永富给他们带路去找梁书记。得知梁书记率领战士们住在屯中有围墙、有炮台的地主王永江家的四合大院里。因为他事先预料到，土匪一旦得知消息，可能夜间来偷袭，所以早有准备。土匪们包围了王家大院，双方立刻接了火。土匪从墙外往院内打枪，梁书记和崔队长率领战士从炮台和墙垛子处往院外射击，因保安队占据着有利地形、地物，土匪们的几次进攻都被击退。后来土匪想了个鬼主意，逼着一个叫张守坤的坏小子去点火烧梁书记所在的草房。因头一天刚下过雨，草没点着，张守坤也被战士发现一枪打死在后房檐下。战斗打得很激烈。土匪们打一阵枪，冲一阵子，败下去后，

再打一阵子枪，冲一阵子，又败下去，一直折腾到天亮。这时战士们的子弹不多了，土匪嚎叫着发起最后一次进攻。恰在此时，县保安大队闻讯派来援兵，里外夹攻，把这股百余人的顽匪几乎全部歼灭，“草上飞”变成了“草上爬”。

在战斗之前，战士马春海因家住在该屯，向梁书记请了假，当晚住在家里。当土匪偷袭路过家门口时，他从门缝看准后甩出一颗手榴弹，炸死炸伤土匪十来个人，其中有个外号叫“一杆枪”的土匪头目被当场炸死。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高高兴兴地打扫战场，收缴枪支弹药和马匹。我保安队仅伤亡三人。梁书记在屯里找了两个木匠，为牺牲的一名战士赶做一口大棺材，安葬在村外向阳之处，并立了一块石碑。从此以后，宽沟子一带很少有土匪来骚扰。村子里也很快建立了民兵组织，在区政府的领导下，打土匪，斗恶霸，抓坏蛋，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

吉祥村红枪会

徐 翔

"红枪会"的前身是"白莲教"，后改称"大刀会"、"黄枪会"，是历史较长的会道门组织之一。"白莲教"原是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组织，曾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腐败统治的斗争中起过作用。1911年后被清廷和军阀利用其封建迷信的教仪,进行欺骗群众等活动,并将"白莲教"改为"大刀会"。从1917年至1927年的十年中，是"大刀会"的兴盛时期，并在庐山创立了"真隐道院"，"大刀会"在全国各地兴起。蒋介石为了建立蒋家王朝，维护其反动统治，利用"大刀会"进行反动活动。委任会首汪洪为"国师"，统辖全国21个省的"大刀会"组织。从此"大刀会"便成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在各地犯下了不少罪行。

"红枪会"有一套组织机构，设"总堂"、"分总堂"、"分堂"三级。"总堂"设有"总堂主"、"总队长"、

“总代表”、“总指挥”、“总老师”、“总传法师”（也叫开示师），这些人都是“红枪会”的“四梁八柱”和重要骨干，他们决定会务中的一切活动。

“红枪会”不仅向道徒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灌输什么“念咒语”、“带护身符”就能刀枪不入，而且还组织道徒操练兵器（练扎枪），实行武装，因此危害性极大。

通南镇吉祥村“红枪会”，是1945年9月由黑龙江省桦南县孟宪荣传来的。开始在鲍俊祥家设立“佛堂”，由孟宪荣自任会长，委任崔万里等三人为副会长、王守宪等四人为“法师”，并设有“掌坛”和“二法师”。“红枪会”成立以来，共吸收道徒90余人。规定在该屯居住的16岁至50岁的男性都得参加，谁要不入会就搬出这个屯；外地群众迁来此屯先得入会，不入会不得迁入居住。

吉祥村“红枪会”的主要成员多系伪军警和地痞流氓，大多数道徒都是良民百姓。“红枪会”采取各种手段迫使群众入会学道。有些群众不愿参加，会首就派人将其家的门、窗、锅台等扒掉，所以群众被逼无奈只好入会。

“红枪会”建立后，规定道徒每天夜晚必须到“佛堂”去“求体”。家里不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准请假不去。否则轻者遭训斥，重者受体罚。到佛堂去“求体”，先由会长和法师组织道徒烧香、磕头、画符、念咒语，然后操练兵器。道徒每人一杆扎枪，并带红缨，身上带个红兜兜。除每天晚间训练外，农闲时白天也进行操练。每次训练四、五个小时、手拿红缨扎枪，念着咒语往前冲，口喊刀枪不入，杀、杀、杀……。美其名曰：训练是为了防备坏人袭击，

"红枪会"信奉的教门五花八门，可以说是个大杂烩。他们的佛堂中供奉着"东海龙王"、"周公主"、"圣天玉主"、"桃花女"、"天地君"、"混天老祖"、"胡黄二仙"等各种灵牌位，但在"求体"时,默诵的是"观世音菩萨"，口说弟子给"混天老祖"磕头了。说明"红枪会"虽然供奉的很多，但主要信奉的是"观世音菩萨"和"混天老祖"。

"红枪会"在打仗时，"法师"先给道徒"上法"，打仗之前吃掉几道符，并念咒语。会首哄骗道徒说："上法后就能刀枪不入，你们打仗时要勇敢冲锋，不怕死，只能打胜不能打败。"以使道徒为其卖命。还欺骗说，就是战死也能归天，死后能到"极乐世界"成仙得道，不下十八层地狱。

吉祥村"红枪会"一时横行乡里，私立公堂，刑讯逼供，欺压贫民百姓。对从该屯路过的行人也不放过，都进行严格的搜身盘查。1945年冬的一天（日本投降），有四名伪满时被抓去当劳工的群众回家乡，从该屯路过，被"红枪会"道徒抓住进行搜身，在其中两个人身上搜出两支手枪（枪是日军败退时扔的被他们拣来），便硬说他们不是好人,勾结胡匪打"红枪会"。这四人不承认通匪，"红枪会"头目就采用灌凉水、上大挂、棒子打、皮鞭抽等各种刑法，严刑逼供。打得四人鲜血淋漓、死去活来。但四个人无一人供认通匪。最后二法师鲍俊祥等人将四人活活打死,并将尸体用谷草烧掉,真是惨无人道。当时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有人悄悄地说：伪满当劳工没被日本人折磨死，回来让中国人整死了，真是作恶多端。害死这四名无辜群众的凶手，建国后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处决。1945年12月26日，一伙土匪（胡子）

从该屯路过，“红枪会”会长带领道徒手持扎枪不让过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道徒被土匪开枪打死、打伤，死伤惨重。这场扎枪对步枪的战斗使有些道徒开始觉醒，认识到“红枪会”是迷信骗人，不是刀枪不入，而是刀枪全入，白送死。从此“红枪会”彻底解体。

吕鸿兆与讷河道德分会

萧士恕

吕鸿兆，字渐逵，山东省莱阳县人。生于1867年（同治6年）。清末曾有功名，又因家颇富有，所以人们称他为“吕二老爷”。民国年间，曾任讷河县实业局长，省参议员。在讷河创办大有余制粉厂，与人合办电影院、剧院。在齐齐哈尔设有火柴厂。家有汽车、拖拉机，为开发北大荒做出过贡献。

吕鸿兆时为讷河著名士绅，家住讷河镇北二道街（今讷河县政府机关幼儿园）的深宅大院，果树满园。有二子九孙、三代同堂。庭门悬有“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的匾额。中堂挂有“龙沙婿寓方为客，源从姜水溯分流”的条幅。吕家在讷河堪称望族，被誉为“积善之家”。

吕鸿兆颇有民族气节。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其不但自己隐居不仕，而且不准子女为日本人效劳。宁做商民，不做敌人走卒。为人宽宏忠厚，关心社会慈善事业，曾三次令其长子吕洁轩会同宋子桥，为山东灾民募捐放赈，乡民称

颂不已。

1929年（民国18年），吕鸿兆在其宅院西侧300平方米宅基地上建起两栋草房，一栋砖平房，共40间，创办了讷河县第一所女子义务学校和讷河县道德分会。临街10间砖平房，做为道德会讲习所。后院30间草房10间为食堂及男职员宿舍，10间为安老所，五间为女校教室，五间为女生宿舍。院内有秋千、木马、单双杠、篮球场。所有创建花费，一部分是吕家支付，一部分是社会各界捐助。女校办至1938年后因师资及经费问题停办，而道德会却因社会捐助和后继有人，一直创办到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为止。

现将讷河县道德分会的创办，发展、组织、宣讲内容、社会作用及其消极因素略书如下：

讷河县道德分会，隶属黑龙江省道德会。其设置为：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以下理事长二人，理事几十人，讲演主任几十人。首任会长为吕鸿兆，副会长孙作霖、辛云清。后来吕鸿兆因身体多病，由孙作霖（商务会长）接任会长，辛云清、孟宪日任副会长，于柏青任理事长。经常参与会务管理，每天到会说教的理事有：丛德昌、陈焕章、宋义臣、岳立夫、李恒清、杨逊天、郝克俭。

道德会的经费，全由社会捐助。柴米多数是由地主缙绅施舍，个人也可以随时赠送。捐助者一律造册并公布于众，称为×××善士乐助××元。所有在会内任职人员，全是无职业收入的义务职。道德会供给食宿，按年度换衣，每月给二元零花钱。凡属鳏寡孤独无家可归者，经人介绍均可入会，并分别予以照顾、帮助安家。外地会员来投者，一律不收食

宿费，走时派车送站，赠送路费。他们的牌子是“万国道德会”主张天下一家，世界大同。

道德会系统。自东北沦陷后，东北的道德会被日伪所利用。。袁杰珊、冯涵清等伪大臣出任总会长，总会设在长春（新京）。各省称总分会，县称分会，乡镇称支会。讷河县分会下设拉哈支会，通南支会、龙河支会、老莱支会、讷南支会。道德会没有宗教色彩、不念佛、不诵经、不烧香、不上供、不皈依、不受戒。“提倡道德，消弭战杀，救正人心，挽回世界，俾全球太平,终归大同”。但是，由于经费来自社会捐助，非常强调节俭，常年吃素，不动酒肉。即或年节、婚丧也只食粗粮蔬菜。不论什么客人，即使是总会要人来也只是两菜一饭、一汤（两菜是土豆丝、酸菜粉）而已。这里的人衣朴食素，女的不涂脂粉，男的不抹发油。男女会员结婚由会方负责操办，会长主婚，唱会歌、奏雅乐、读祝辞，个人不花一文，大家素餐一顿。虽无酒肉，却是其乐融融。当时的男人，都愿意娶入道德会的姑娘为妻，因为既不要聘礼，又是受过三从四德教育的，必是贤妻良母。

道德会分期分级地开办讲习班，分初级、中级、高级。县以下叫初级班，初级结业后选送省分会受训两月是为中级班。中级结业后再选拔送总会讲习是为高级班。中级讲习班结业后就有资格担任初级讲习班的班主任。而且各县交叉派任，讲完一个班的课程仍回原会。高级讲习班主要培养专职人员。在高级讲习班里，除了道德会的基础课外，还要学习孔孟之道。中级职员都能熟知孔孟学说中有关礼教及做人的规范知识。中级讲习班有时培训财会技工人员和幼儿

教师。各县道德会都设有幼儿园，大部分幼师都由省分会培训，她们不索分文干得非常认真。入学幼儿，会里不收费用，但各家长争先恐后地向会里施舍。

讷河县道德分会每年开办四期初级讲习班，并派讲演主任到各支会办两期班。讲习班的课程分为两个体系：

一是，农民出身的王凤仪的思想体系。

王凤仪是辽宁省朝阳县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他研究一整套的劝人方，用以解脱愚昧落后群众的精神痛苦，号称王善人。他的宣讲内容是：

第一，三界

三界分为性、心、身。

一、性，分天性、习性、秉性。

1、天性。指先天具有的本性。本性是善的。宣扬“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主张人要保持天性，以天性待人处世。道德会人每天“叫性”，有什么过错或对谁有隔阂，都向王善人忏悔，“还我天性”。

2、习性。指后天改变的性格，即所谓“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宣扬“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观点，以孟母教子三迁其居为例，说明客观环境对主体改变的作用，劝人处污泥而不染，不为习性改变天性。

3、秉性，指被后天恶习污染所形成的恶劣性格：卑鄙、贪婪、吝啬、残忍、自私等，这种性格害人误己，劝人戒除，改造自己受污染而变质的秉性，恢复天性。

二、心，分良心、贪心、争心。

1、良心。指人性中具有的善良之心。主张做人要讲求天理良心，反对瞒心昧己。不仅办事要公平，问心无愧，还要富有同情心，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要悲天悯人，心怀天下。

2、贪心。是贪得无厌，贪图份外之财，追求物质享受。贪图富贵容易变节，贪求利欲容易忘义，贪是罪恶之源。主张俭以养廉，清心寡欲，知足常乐。天地之间，物各有主，非义不取。

3、争心。是指贪之不足而夺之，有争心之人不择手段地占有别人的财物。窃取、抢劫、杀人越货，图财害命，皆由争心引起。劝戒世人争心必除，贪心必戒，人类才能友好相处。

三、身，分真身、假身、罪身。

1、真身。指的是纯真洁白之身，意思是人来到世上本来是一尘不染、自来洁白，所以应该一生正道直行、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做人处世，全凭良心，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养胸中的浩然正气，学古今完人。

2、假身。是说那种追求浮名俗利、贪图荣华富贵、讲求享受、吃喝玩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徒。他们看来活得很得意，实际这些都是花间露珠、草上寒霜、过眼云烟，他们不过是行尸走肉，所以是假身。

3、罪身。是说那些吃喝嫖赌、不务正业、为非作歹、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渣滓。他们的躯体肮脏而带着罪恶。宣讲戒除贪心、争心，保我真身，改造假身，防微杜渐，根除罪身。

第二，四级

即做人的四个级别：志、意、心、身。

一、志，即志界人。有理想、有抱负，心存社稷，志怀报国，胸怀大志。不为个人得失而气馁，总是志在为国为民。志界人是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

二、意，即意界人。这种人意境澹泊，与世无争，认为世上一切都是空的，人在世上都不过是匆匆的过客，万户侯也不过是粪土，人生如梦，何必过于认真，凡事看得开，自我解脱。这种人意达佛国，可以免除人世的烦恼。

三、心，即心界人。心界人工于心计、争贪搅扰，营营苟苟，钻进私欲的垃圾堆。为巴结权贵，奴颜婢膝。为患得失、敛眉蹙额、汲汲焉、遑遑焉，烦恼不可终日。这种人没有真正的快乐而被名缰利索所困惑。

四、身，即界身人，亦即三界里边的罪身人。这种人只是图享乐，既无高远大志，又无淡雅意境，他们是酒囊饭袋、压马敦台。

第三，五行

道德会按木、火、土、金、水把人的性格分为五种。每种性格又分为阴性、阳性。

一、木性人

1、阳木性：耿直、倔强、刚毅、强硬。办事斩钉截铁。

2、阴木性：古板、拘泥、傲慢、自以为是、不善于团结人。

二、火性人

1、阳火性：处事果断、雷厉风行、迅速敏捷。

2、阴火性：暴躁、没涵养、不冷静、处事草率、急

于求成。

三、土性人

1、阳土性人：忠厚老诚、朴实无华、默默无闻、勤恳做事。

2、阴土性人：愚笨、迂腐、不开朗。

四、金性人

1、阳金性人：聪明、智慧、积极进取。

2、阴金性人：喜虚荣、爱表现、华而不实。

五、水性人：

1、阳水性人：活泼、温和、善良、开朗。

2、阴水性人：立场不稳、随波逐流。

三界、四级、五行这三种讲习内容，是道德会员早晚必上的课程。尽管俗不可耐、陈腐莫及，但都是道德会讲习班必学课。早晨讲三界、四级，晚上讲五行，还有生克制化、旺相休囚两道课题。主旨讲完，参加讲习的学员每人要对三界、四级、五行的要义、歌诀背诵如流。每人都要对号入座，联系自己，检查自己属于哪一界、哪一级、哪一行的人。每人都要在课堂上自我反省，有的甚至痛哭流涕。除了早晨讲性、清性，晚间论命的固定课程外，白天还讲伦常道。王凤仪的伦常道有：

一、父子道

主张父慈子孝，做父母要慈爱，父母不慈，子女难尽孝心。同时强调父母必须做子女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提出做子女的以孝为本、百善孝为先，孝的核心是顺、敬，大讲二十四孝故事，讲羊羔跪乳、乌鸦返

哺，劝说人们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二、夫妇道

提出夫妇是人伦之始，造化之端，夫妇要如宾如友，大讲举案齐眉、为妻画眉的故事，但又提出男为天女为地、为夫妻纲，妻对夫要顺从。

三、兄弟道

主张兄宽弟忍，互相友爱，手足之情，骨肉同胞，和睦相处。大讲伯夷叔齐相让王位的故事，反对兄弟争执，同室操戈。

四、朋友道

一是朋友道。

主张朋友之间以信为第一，患难与共，互相劝谕。大讲“桃园三结义”、“管仲鲍叔牙的故事”。

此外还有妯娌道、婆媳道、姑娘道、媳妇道，给各种身分的人都定名分，叫素位而行。王凤仪的一套不经之谈，颇为当时一些人所听信，城市居民、农村妇女及一部分职员纷纷拥进门来。

二是知识分子的孔孟之道。

由于道德会内有一批受过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参加，他们结合王凤仪那套不经之谈，把与王凤仪言论相吻合的封建主义教义也加了进去。在伦常道中大讲忠孝仁义、三纲五常、礼义廉耻。对女人大讲三从四德、贤妻良母的封建礼规。使土俗的道德会又蒙上一层封建教育的儒家色彩。

讷河道德分会的存在，使一部分下层社会的人得到安身之处，并能使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解脱。其重要作用是使愚昧落后的人们安于现状，听天由命，不争不贪；对黑暗的旧

社会不仇不恨，更加麻木，客观上起着维护旧社会、服从旧制度的作用。他们稍有不满情绪就立即向王老善人悔过："老善人，看我柔和……"而不辨是非，不思反抗。正因为如此，在旧社会，特别是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道德会遍地存在，不断发展，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利用以维护其社会秩序的工具，所以统治阶级当然不会限制它的存在和发展。又因为道德会不搞政治活动，所以解放后人民政府只解散了这个组织，而未把其定为反动会道门，也不追究参加的任何人。至于讷河县道德分会的当时人员，也多风流云散老病而死了。

忆旧社会坑人骗钱的会局

万魁廷

会局的历史很久。早在清朝时期，会局就是公开的骗钱赌场。到了中华民国期间，政府对会局先进行限制，后给予取缔。一九四五年冬初讷河刚解放，当时正处于无政府状态，城乡一些地方坑人骗钱的会局又复活了。农历十月初，新安村小三牌屯（现太和乡新安村三屯）有三个人（名字记不清了）合伙开设了会局。这件事传播得很快，仅三五天时间周围十里八村的一些人都知道了。有些妄想借机赢大钱、发邪财的人干上了押会的事。会局开设不久，押会的人越来越多，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不仅使一些押会的人上当受骗，更严重的是影响了解放不久的社会秩序。

会局就是骗钱的赌场

那年我家住在马鸿喜屯（现太和乡新安村一屯），距离开会局的小三牌屯四华里。会局成立的第二天，我们屯就有很多人知道了。全屯仅有20几户人家，人们都不了解会局是

怎么回事，所以屯里的人一帮、一伙的在一起议论押会的事儿。屯里有个叫张文玉的，平时好看小纸牌，屯里有个大事小情他都出头。有一天五六个人到他家串门，谈论起押会的事儿，都说："老张你明天去会局看看怎么押会，学学乖，咱们也照量照量……"他满口答应了。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就去了会局，到屋一看，三个局东正在收封、点钱，有二十多个跑封的。他心血来潮手发痒了，一摸兜里只有一元钱。正好遇到外屯一个跑封的熟人，他就偷偷在那人耳边小声问："你们屯里都押哪门啦。"那人说了五六门会名，他想了想说："求你给我写一门合同吧"。写完连封带钱交给局东了，过了一会儿局东喊出会啦，就喊一门合同，真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他押一元钱竟赢了三十元。老张乐颠颠的回屯去，一进屯西头，有人问他怎么样，他满面笑容地说："今天我真走字儿，兜里就有一元钱，求人写了一门合同，一下子押准了，一元钱赢了三十元。这玩艺可真干得过，押一元押不准只输一元，押准啦一元就赢三十元！"他见人就讲，成了为局东散布毒素的传声筒。经他这么一鼓吹，屯里有些人活心了，问他三十七门会都是什么名？他说："我也没记住，要想押得求个识字的人去会局把会名都抄来。"叫谁去呢？有人提出求朱晓明去，正在这时小朱也来了，大伙和小朱一说，他很痛快的答应了。第二天小朱带上一支铅笔、几张黄纸就去会局了，到会局和局东一说要抄会名，局东当即给他一本标准的会名本。带回屯里有些想要押会的人抢看看，一看很带劲，是石印的，类似现在的小人书，每页印一个会名，中间印着图案，是会名的标志。三十七门会名有：

音会、火丰、天龙、龙江、吉品、元吉、元桂、板柜、正贵、正顺、火关、九官、青元、青云、汗云、昆山、入山、光明、明珠、自德、必得、永生、永利、红春、合同、三怀、l嶐、茂林、上招、至高、太平、占奎、安士、万金、福孙、河海、根玉。

有了会本，屯里开始有七、八个人每天找小朱给写会，赢时少，输时多。过了几天全屯就有十多家也干上了押会的事儿。押会的人多了，都劝小朱给跑封（叫跑封的）。每天写完会，马上把封送到会局去。在每天出会时，屋内鸦雀无声地注意听。局东喊一门会，就察颜观色，看看跑封人的表情。有时说出三个会名（一次最多不能超过三个会名），最后确定一门，盖章后撕封；有时只喊一门就盖章，这叫独门冲。局东有时很不讲理，横挑鼻子竖挑眼，故意找毛病，甚至耍赖。本来押对了，硬说字写的不对，再就是说这个字写的不清楚，那个字写的不准。有一次出的安士，有个封押三元钱的安士，士字底下的横稍长了一点，局东硬说士字是土字，不想给钱。跑封的和局东讲理也不行，互相争吵起来，当时有十几个跑封的看着气不公，要动手打局东，这才要出赢的九十元钱。小朱看透了会局就是坑人骗钱的赌场，说啥也不干跑封的事了，并劝屯里押会的人不要再上当受骗啦。可是有些人押会输了很多钱不甘心，没人跑封就自己送封，想往回捞一捞，结果却越捞越深，上了局东的当，坑了自己。

讨会的形式千奇百怪

押会的人赢钱心切，总是千方百计想一些邪门歪道，想押得准；有些人押会输钱太多，总想把输的钱赢回来，所以

什么招都使。到处打听讨会的招术，用一些愚昧无知的迷信方法讨会。据我所见所闻，讨会的形式千奇百怪，在我住的屯里就有十种：①圆梦猜会。一些押会的人家每天早晨起来，一家人互相问都做什么梦啦，见到邻居的人先问：昨晚上你做啥梦啦，按照做梦的形象猜押什么会；②骑坟要会。骑的坟必须是姑娘坟，正好屯西北二里多远有个已死多年的姑娘坟。说白天鬼不出来，必须晚间去骑坟要会才准。一天夜晚十点多钟，武老大押会输了不少钱，白天借了个骑马鞍子，领着他的弟弟冒着零下三十多度严寒去骑坟要会，把骑马鞍子卡在坟中间，武老大骑在马鞍子上，手拿皮鞭打七下停一停，问一句押那门会？接连打一个多小时也没要到会，反把弟弟的脚冻坏了。③爬房看会。农村都是草房，夜间一个人上房尖嘴里叼根蜡，在房上来回爬，地下的人往房上看爬的人象啥就押啥；④灶坑扒会。用硬纸壳剪成三十七个小方块，每块上写一个会名，夜间扔入无火的灶坑内，然后用掏灰耙在灶坑内往外扒，扒出那门押那门；⑤井里捞会。那时农村是大口井，用薄木板做成三十七个小方块，每块写上一个会名，早晨把写有会名的木板块扔入井内，接着用柳罐往外捞，捞上那门押那门；⑥烧蛋崩会。用一个鸡蛋把三十七个会名用毛笔写在蛋皮上，埋入火盆里（那时农村多数人家冬季用火盆取暖），烧十几分钟后往外扒拉，鸡蛋必崩，崩掉那门押那门；⑦大道铲会。夜间在屯外的东西大道上，距离五六十米远两头放上一个饭桌子，桌上放瓶酒，一个人拿着锄头铲大道，铲到东头喝一口酒，铲到西头喝一口酒，直到喝醉为止，问喝醉的人明天押那门会，喝醉的人说押啥就押啥；⑧供仙

求会。一些押会的人家都用黄纸写上胡、黄二仙供在墙上，放个香炉，用纸壳剪三十七个小方块，每块上写一个会名，夜间睡觉前烧上三根香，叩三个头，说几句求仙给会的话，把写有会名的纸块压在香炉底下，第二天早晨起来用手抽出一个，纸块上写的啥名就押啥；⑨见景解会。每天见到什么稀奇事就事解会。有一天屯子来一个吹笛算命的盲人，一些押会的人都押了“入山”，结果出“火关”⑩裤兜掏会。用三十七个小方型软纸块，每块上写一个会名，由男子把三十七个写有会名的软纸块投入妇女的裤兜子里，然后再用手从妇女裤兜子里掏出一个，纸上写的什么名就押什么。还说妇女骂得越狠，越能押准。真是丑招用绝。

尽管押会的人费尽了脑汁，用了很多迷信的鬼招，但还不灵。结果是输的很多，赢的很少。知道了上当受骗，已悔之晚矣！

会局带来的严重危害

会局不仅坑害了一些押会的人，而且也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第一，传播迷信，毒害人民。讨会就是散布迷信。有些押会的人成天搞一些乌七八糟的迷信活动，既腐蚀了自家的青少年，又腐蚀了左邻右舍的一些人。本来有些人家平时不供胡、黄二仙，为押会讨封也供上胡、黄二仙。有些刚刚懂事的孩子也三三两两到一起玩讨会，从小就受到坏的影响。

第二、出卖家产，偿还赌债。有些人押会输了很多钱，自己没钱就借钱押，结果欠下大笔外债。有个外号叫郑二滑的，借钱押会输了二百多元，没钱还债只好把自己家唯一的一头牛卖了还赌债。媳妇一气之下要和他打把刀（离婚）。他

租种地主两晌地，没有畜力只好用人工换马力，种的不应时，秋后减了产。五十多岁的老赵太太，把积攒几年的压针线笸箩的五十多元钱二十天就全输光了，为此上火得了一场大病，险些丧了命。张文玉开头赢的三十元钱不到十天全输光了，之外又输了一百多元，他再也不说干这玩艺有便宜的话了。

第三，扰乱社会，影响生产。全屯有十几家干押会上当受骗。有的输钱多了成天无精打彩，没有心思搞生产。有七八户人家只顾押会，没柴烧也不去打，今天和张家借几捆明天和李家借几捆，有的夜间偷邻居家柴禾烧。有的春耕种地时没种籽、缺口粮，只好求助亲友。偷鸡摸鸭子的事常有发生，使有些人家夜间睡觉不放心、怕被盗。

第四，邻里关系受到破坏。有的人押会输了钱，什么丑事坏事都干。有个叫曲本彪的，押会输了一百多元钱，一天晚上和他弟弟商量掏邻居家媳妇的裤兜子讨会，第二天早晨看到那家媳妇往外倒灰，哥俩趁机跑上前，一个拦腰抱住，一个往裤兜子里扔封。妇女一边骂一边喊救人，被家人听见了，一家五口人全出来把曲本彪打得鼻口出血。不但会没掏成，反把媳妇吓病了。老曲家看事不好，托亲友说情，曲本彪哥俩和父母向人家赔礼道歉，才算了事。因押会在邻居之间闹纠纷的事也经常发生，影响了邻里团结。

这个会局后因局东分钱发生矛盾，于一九四六年农历二月押中旬散局，丑剧就此演完。各屯押会的人虽然不押了，但会的人上了当，受了骗，输了钱，一时收不回心来，没有心思干活，耽误了生产。这些人悔恨地说：押会输了钱，粮食减了

产，真是一枪两眼！今后决不再干这上当受骗的事啦。

一九四六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讷河城乡很快建立起人民政权。新政权公布了禁赌的命令，所有的会局立即解散。从此这种坑人骗钱的丑剧就到此告终了。

解放前讷河鸦片烟馆谈闻录

李振文

鸦片是从罂粟果实乳液中提炼的一种吸食毒品，俗称大烟。最早产于印度和东南亚地区。英国政府于1773年确立鸦片侵华政策，向中国倾销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毒品，严重地摧残了中国人民的健康，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

鸦片泛滥，遍及城乡

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后，一方面鼓励种植和贩卖鸦片，另一方面又在热河西部扩种鸦片，建立销售网点，使之流毒全中国。那时讷河县城有四处大烟馆、拉哈镇有两处，乡镇村屯到处都有卖大烟的。大烟馆有一、二、三等之分。三等大烟馆只有一两间门市房，吸食者随买随卖。二等的房间较大些，设有床铺，备有烟具，不仅随买随卖，还可铺地吸食。一等烟馆设许多房间，都是雅座，有的还有女招待，打扮的

花枝招展，专门为烟客“看火”（待候抽大烟的）。有的女招待在“看火”时向烟客卖弄风骚，能够多得一些小费。还有的为了多卖鸦片多挣钱，让自己的老婆或姑娘以色情去勾引烟客。那时曾流行一首小曲：“话说宋老三，他家卖大烟，一辈子无儿生个女婵娟，这姑娘年长二九一十八呀”……所以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都愿到这种人家吸食鸦片。抽大烟的人越来越多，贩卖鸦片的也就不断增加。

对吸鸦片，当时无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当官的还是老百姓，穷人还是富人，男人还是女人，就连有的教书先生也都喜欢吸食。可以说是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五行八梟都有抽大烟的。人们开始对鸦片对人的神经的麻醉作用不了解，但一经吸食就感到极大的兴奋，有一种极强的欣快感、轻飘感，吸食了第一次，就想第二次、第三次。抽大烟的人都得意地说：“抽口烟，喷口云，好象八仙出洞门”。一些人开始把抽大烟当成一种消遣，两三个朋友凑一起到大烟馆抽口烟，一边抽烟一边谈天，称之为“打说”。入在理教的人不能直接吸烟，就由别人给喷烟。有女招待的地方由女招待给喷。那时有些人家来客人也用抽大烟招待。天长日久都成嗜好，难以戒掉了。

吸食鸦片，下场可悲

刚吸食鸦片的人，确实感到兴奋提神，浑身舒服，很快就成瘾了。鸦片含有大量使人麻醉的毒素，特别对中枢神经有特别的抑制作用。但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精神萎靡，丧失理智，骨瘦如柴，慢慢死去。吸鸦片的人卖了所有家产，最后竟卖儿卖女卖妻，造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有些常抽大烟的丧失了劳动能力，卖光了家产，没钱买大烟抽，烟瘾上来又难以忍受，只好喝大烟灰。烟灰弄不到就扎大烟，就是把大烟化成液体抽到注射器里往静脉注射。这样人的身体衰退的更快、死的也更快。那时每到寒冬季节，经常发现死在路上或门旁的大烟鬼。县城有个当警察的郭某，抽大烟身体不行丢了差使，后来卖了老婆买大烟抽，几天又抽光了，最后上吊自杀。为了抽大烟落到卖房、卖地、卖老婆，最后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可悲下场，在旧社会是屡见不鲜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及时地打击了贩毒分子，取缔了大烟馆和贩毒活动，保证了人民体质健康。

官方垄断，摧残人民

日本侵略者看到鸦片的经济效益很可观，同时又是摧残中国人民身心健康的麻醉剂，于是在倡导之外，下令鸦片完全由官方经营，取缔民间贩卖。同时为了标榜日满亲善，又进行所谓戒烟宣传活动，掩盖其倡烟销烟的丑行。鸦片由官方统一经营后，首先在讷河和拉哈两地成立了管烟所，隶属县公署保健股。讷河管烟所先设在南市场，后搬到东门里路南。每天前去领大烟的人很多，秩序混乱，派有两名警察长期在那里值勤。管烟所开始营业后，社会上由过去公开贩卖变成私下秘密交易，活动更加猖獗。他们多半到热河西边外一带偷运，到家再批发出去，一层转一层，贩卖活动遍及城乡，危害面极广。在取缔私人贩卖鸦片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又公开发放鸦片通帐。吸食鸦片的人领到鸦片通帐就可以凭此到管烟所买大烟，这时大烟被堂而皇之的改叫“福寿膏”，抽大烟就算合法了，也受警方保护了。有些原来不抽大烟的人也想法弄到

鸦片通帐到管烟所买鸦片，之后高价出卖。结果卖大烟和抽大烟的比“取缔”前更多了。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用鸦片摧残中国人民，企图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永久戴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铁证。

讷河县土地开发史话

梁玉林

二百年以前，达斡尔、鄂温克族人民迁居讷河，聚居于依山傍水地方，以渔猎为生，不事耕耘。当时这块肥沃的土地还是荆棘遍地、荒草丛生、野兽出没的荒原，百里不见人烟，一派荒凉景象。清康熙、雍正时起，随着站丁的发配、八旗兵的驻防、流人流民的移入，才揭开了境内早期土地开发的序幕。清末民初，随着放荒、清丈的进行，大片荒原被开垦为良田。讷河县的土地开发是各族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洒满了辛酸和汗水，历尽了艰辛和磨难。先辈们前赴后继开发讷河的历史功绩，真是功盖天地，令人永志。

达斡尔、鄂温克族人民的辛勤耕作

清顺治十年(1653年)后，世居黑龙江上游和精奇里江两岸的达斡尔、鄂温克族人民，因不堪沙俄的侵扰，携家带口陆续迁往嫩江之滨。其中一部分迁至嫩江东岸、讷谟尔河

北岸逐水草，按姓氏立屯定居。因为这两个民族世以打猎为生，再加上迁居地依山傍水，是渔猎放牧的好地方，因此他们对土地不那么依恋，只在居住地附近种一些粮食来调剂主副食或补充越冬的食品不足。他们开垦的土地较少，主要种植大麦、荞麦、稷子、苏子等作物。一般人家不种蔬菜，只采摘山野菜、欧李、山丁、榛子等野果。其耕作方式十分落后，多采取原始的弃荒耕作法。《黑龙江志稿》记载：达斡尔人种地宛然上古时代之旧法。彼等操作于草原肥沃之地，连年耕种，至数年后，地力耗尽，再择求新地，仍如前法耕作，地力再尽再换，或岁易其地，待雨乃播，不雨则终不数土，雨后相水坎处，携妇子牛羊以往毡庐孤立，布种辄去，不复顾，逮秋后来，诸草莠杂获，计一亩所得不及汉田之半"。他们获得的收成较低，但不以为然。达斡尔族人相聚，都问收没收一年的庄稼，就是说所收获的粮食够一年吃的就是好年景。

达斡尔、鄂温克族人十分擅长种烟，被称为"一岁之生计"，就是说种烟是一年生活的来源和计谋。春天，各户都在附近开隙地种烟草，"自播秧至晒叶，胼胝（音片支）之劳，妇女任之。""以绳贯烟叶，压而扁之，绳长约五尺，故其烟以庹（音妥）计。"（《黑龙江外记》卷六）。他们以烟叶与跑行商（猎称跑腿子）的汉人换取酒、盐、布匹等生活日用品。行商把烟改一庹为数束贩到外地零售，谓之"把儿烟"。可见，当时讷河县的土地开发只是初级的、原始的。但是随着汉人的流入，经过相互学习，达斡尔、鄂温克族人民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为后期的土地开发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驿站站丁的勤劳开发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以后，讷河县境内开始设置由吉林的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县）通往黑龙江城（今黑河市瑷珲乡）的驿站，我县境内设三个驿站，即喀迷哈站（今老莱镇老莱村）、博尔多站（今讷河镇丰华、长青村）、拉哈岗站（今拉哈镇）。其站丁来源是平息“三藩”之乱后，免死发遣的吴三桂叛军部下及家属。初期每站三十丁，发给官牛二十头、车二十乘和一定数量的马匹。这是讷河县最早记载的移入的汉族人集团。当时清政府规定，站丁系罪人发遣，只能集居驿站附近，越百里为逃。主要任务是负责邮驿，用马传递公文。为了使他们能长期定居下来，每名站丁令其开荒五垧，自种自食。由于他们来站时已过耕种季节，当年只能开荒未能种地，口粮只得从官仓〔设在墨尔根(今嫩江县城)〕借济，平均每站为二百石左右，以后从产粮中扣回。翌年，站丁及家属辛勤开垦了一部分荒地，每站大约二百一十垧左右，但秋后所收获的粮食除还上年欠口粮外，每口人只留二石，其余收入官仓贮存，以备荒年。这样，站丁口粮只能用半年，缺粮再从官仓借取，年复一年，使他们生活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如遇灾年，颗粒无收，站丁口粮只能依靠官仓解决。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他们只能扩大开荒面积。如当时的博尔多站，北、东、西部均为草原，只准做牧场，不准开荒，只有南面是站丁地，再往南便是讷谟尔河。再增加开荒面积，他们只能去讷谟尔河南的东河南、西河南开荒种地，因路途较远，中间要过河，当天回不来，开荒者就在两地搭窝棚

住下来种地，秋后撤回。后来站丁人口渐多，一部分浮闲人员就久居于这两个地方，形成今天的东河南屯、西河南屯。

站丁地为生计地，只要交足公仓的粮食，再未有其他规定，所以一些人口多的站丁户可以多开荒。至雍正年间，布特哈开荒面积达到三万一千七百七十垧，其中绝大多数是站丁地。

驿站的建立，对讷河县的土地开发起到了较大作用，使内地汉族人民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得以传播，面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也提高了。据《黑龙江外记》记载：当时的耕作方法为“一犁率驾三、二牛，沙性坚实，一牛不胜也。犁亦较内地长大。犁多者，殷实之家”。《黑龙江志稿》记载：“汉人之耕作有分休闲轮作二法。若砂碱地则用休闲法，每年耕作一分，休闲一分，至轮作法最为普通，即高粱、谷子、黄豆之类，每三年轮作一次，又名翻茬，为与杯茬互相轮种也”。《黑龙江述略》记载：“壮健单夫，治二、三垧地，供八口家食，绰有余裕”。可见当时的耕作技术是比较先进的。但从整个讷河土地开发看，还只是局部的，农民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经济。由于地广人稀，土质肥沃，每户只要十几垧熟地产粮，就属殷实之家，于是世守其业，自给有余，不再多开荒多种地了。少数民族皆樵渔自给，以闲温饱，亦不想多开垦土地，故北大荒有膏腴万顷荒面不治之说。

流人、流民对土地开发的贡献

清初，黑龙江地区为流人发配地。流人是指被朝廷判罪而被发配的人。到发配地后分管束、安插、当差、为奴诸

多，每岁数逾而至，绝大部分发配到西北部的齐齐哈尔一带，到嘉庆年间已发配三千余人，在齐齐哈尔地区已有一千余人，其中绝大多数给旗人为奴，为旗人种地，即土地所有权归旗人所有，流人耕其地所产粮食除自食外全部交给主人。由于关内连年征战，旗人披甲征调频繁，且常年不归，所以旗人耕作之事都归流人所为，他们为了多得实惠，往往多开垦土地，年深日久，旗人的土地逐渐被流人所占有。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他们还自制了许多比较先进的农具，如锄、镰、耙、镐、石磙、碾磨、风车等，种植作物的品种亦较多，"小麦，春种秋收，磨面胜内地，充贡者"，"有谷穗长尺许，色如血，名老羌谷"（《黑龙江外记》卷八）。"流人辟圃种菜，所产惟芹、芥、菘、韭、菠菜、生菜、芫荽、茄、萝卜、王瓜、倭瓜、葱、蒜、秦椒。茄长而不圆、王瓜长者几二尺，皆四月后上需之"（同上）。

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清政府以东北地区为"龙兴之地"，为保持祖先的遗产，制定了严厉的封禁政策，不准关里汉族人进入东北地区。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地设关卡，置柳条边，防止汉人出关，并对以前流入的汉族人称为流民严加控制，能遣返的遣返，不能遣返的集中在一起，不许旗民杂居，永禁民人开垦荒地，禁止满汉通婚。后来又把犯人发配地改为新疆、云贵、两广等烟瘴地区。

封禁政策的实施，对土地开发起到阻碍作用，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东北地区盛产人参、鹿茸、珍珠、沙金，每年都有一些人偷渡关卡"闯关东"，来此挖参、采珠、淘金。特别是关内一遇战乱、灾荒都有一大批生活无计的农民

冒险闯关，进入黑龙江地区。讷河县的流民多以山东、河北、河南为最多。他们流入时受雇于旗，俗称耪青，佃户进而租种旗人的土地，生活宽裕者还收买旗人典卖的土地，有的甚至买去旗人圈占的荒地，在旗人名下开垦土地。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布特哈仅流民就达一万八千九百余户，四万余人。流民渐多，开垦土地日盛，当地官员屡禁不绝，多次上奏，朝廷也明令禁止，甚至拿钱赎回旗人的土地。由于旗人多习弓练武，勤于射猎，不谙农务，赎回的土地逐渐荒芜，不得不再次典卖出去。久而久之，土地又转到流民之手，使大量的旗地转为民地。因此，朝廷不得不承认民地的存在。为了限制民地的发展，他们还另划出一部分荒地为民地（俗称江洲地），将流民集中于此，每垦一亩荒地征银三分，五年后按地纳粮征税，这是布特哈地区最早的贡赋之一。

开禁时期的放荒与垦殖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关内连年战乱，灾害频降，土地荒芜，大批贫苦农民为生计所迫，冲破清政府的封禁政策，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闯关东"洪流，势不可挡。《白山黑水录》中记载移民状况时称："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只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逆旅所共寝食者皆山东移民"。这些移民从奉天到吉林后，再分两路进入黑龙江，其一由吉林的伯都纳沿嫩江两岸进入内蒙及我省的西北部地区，此股流民为最，多聚居于齐齐哈尔。从我县住户原籍看山东省籍较多，

绝大多数为这一时期流入。他们多以亲属几户落居一处，搭窝堡、盖马架、开垦荒地，谋生度日。从我县地名演变看很多地方的屯名叫三家子，七家子，后五家子，四马架，丁家窝棚等等，都是由这些荒户而建的。另一路则由双城堡进入呼海地区（即呼兰、海伦一带）。这些累年激增的大量农业人口，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当时布特哈地方官员有感"私垦之民，难以驱逐"，同时又害怕人户众多，恐别生枝节，因此不断请奏就地安置。

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面对财政困窘、边防空虚、流民日盛的局面，被迫取消封禁政策，"全部开放黑龙江的土地"，实行旗民兼放，即不论旗民、汉民，每垧荒地交押租六吊三百文皆可领招荒地。并于省城齐齐哈尔设立垦务总局，管理全省荒务，统计荒段处所，将全省荒段划做各区段，每区设行局。讷谟尔河划为第五区段，设垦务行局，由布特哈总管金纯德兼理。垦荒的勘丈方法是勘丈之先逐段绳以分界，勘丈之后画井开方以安屯。即采用古井田制，六华里为一井，每井划为九区，每区分作四方，每方各纵横260弓，合毛荒45垧，亦即每开划36方计1,620垧，在每井中央的四方〔180垧作为基及公田（学田、义仓地）〕，其余32方分配给报领垦户。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起至年末，共放讷谟尔河南段毛荒地53.59万垧，次年正月至十一月又放出讷谟尔河北段毛荒6.93万垧，续放讷谟尔河南段毛荒6.89万垧，其中各段划留学田地、屯基地4.36万垧。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因领荒户欠价荒地较多（就是领荒后未付款或欠款）经垦务局议准，撤佃讷谟尔河欠价荒地20

余万垧，并拟定办法，出示另放，即放撤佃毛荒每垧收价银七钱，自垦成次年起，分三年交完，第三年升科。至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放完，计20.5万垧，讷谟尔河北段撤佃毛荒4,600垧，出放附廓毛荒840垧，并留出移民用地、站丁宅基地。

由于当时荒户极端贫困，绝大多数无钱领荒，出放的毛荒十之有三未领、未垦。虽经撤佃重放，效果仍然不佳，许多毛荒无人认领。垦务局又重新拟定办法：一是发布布告称：只要有垦荒能力者，认领后荒价可以分别从缓，鼓励富有人家多领荒。二是荒户只要有犁具犋马或有购置犁犋牛马之钱款者，一经验明，即分头指段派兵护垦荒。犁犋牛马不足者，由官家垫付牛犋一副和全部籽种。三是用官放统一从内地移民垦殖。如宣统二年（1910年）用官款从湖北移民290户，800余口人，其中壮丁320人，安置在境内湖北二屯（今讷南镇五福村）、三屯（今讷南镇讷南村六、七屯）、四屯（今讷南镇向荣一、三屯）、五屯（今九井乡育民村）。每户拨给荒地11.25垧，房一搧，每8户给牛犋一付，令其耕种。民国二年（1913年）用官款从山东移民100户，按壮丁分成150份，安置在山东头屯（今讷南镇鲁民村）。每份给房二间，荒地11.2垧，垫付大洋五百到八百。鉴于湖北移民有领荒和领官费后逃跑之情况，垦务局在屯中设立稽垦处，由龙江道尹派员督饬垦荒。通过上述办法，全县垦出的荒地渐多。1915年全县已新垦熟地3.8万垧（包括克山、克东、德都三县部分地区），到1930已增到135,655垧（不包括以上三县）。

讷河县地名演变概说

王咏曦

讷河县的地名，反映了讷河先民的社会活动。随着岁月的流逝，先民时代的一些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已有了不同的变化。砍伐树木、垦殖荒野、河流改道、山丘被蚀……地理面貌的改变，给今人研究历史造成了一些困难。但是，地名这个活的历史档案弥补了这一不足，它记录了历史的真实。研究掌握地名的渊源，有助于了解我县的历史与文化，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讷河县名，由讷谟尔河而来，是讷谟尔河的简称与缩写。"讷谟尔"，蒙古语意为"秋"（《黑龙江志稿》卷三47页），满语意为"嫩"。由于音译不同，历史文献中还有讷默尔、纳默尔、讷穆尔、讷木尔、讷墨里、讷莫日等不同记载。讷河县初属布特哈打牲部，宣统二年（1910年）改设理事通判厅（为直隶厅）。民国二年（1913年）设县改今

名。

讷河镇，初设时称博尔多，原在今长青、建华村址。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东布特哈总管陈福龄组织人员在今址勘设街基，不久总管衙门由博尔多迁此。“博尔多”系满语“令喂肥牲畜也”（《盛京通志》卷二十三35页），由讷谟尔河北至博尔多一带土质肥沃，水草丰腴，适于放牧和饲养牲畜而得名。清代黑龙江北岸有聚落名外博尔多（又称外薄尔得，其意亦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初辟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北）至瑷珲的驿道时，博尔多为驿站之一，故俗称老站。

拉哈镇，“拉哈”在赫哲和满语中均为“淮头鱼”之意。淮头是一种形似鲶鱼但又比鲶鱼大的鱼，因嫩江盛产此鱼而得名。拉哈，清代曾为驿道的上十站最后一站，俗称拉哈站。民国初年改镇。

老莱镇，原名“喀木尼喀俄佛罗”，简称“喀木尼喀”、“喀迷哈”，是清代驿道的上十站之第八站。满语“喀木尼喀”为“隘口”，“俄佛罗”意为“鼻子”，用于地名为“山咀”之意（孟宪振译著《康熙年间吉林至瑷珲间的驿站》），由附近的山岭青山咀子而得名。清末，由于驿站之西有条嗜哩河（又称罗拉喀河，见方式济《龙沙纪略》）流过，久而久之，“嗜哩”演译成为老莱，后以老莱河名取代了“喀木尼喀”地名。

讷南镇，驻地原名“官货店”。宣统二年（1910年），经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向清廷奏准，用官款从湖北省迁来290户800口移民，在讷谟尔河南岸设立湖北鄂民七个屯（其中包

从清丈到"跑马占荒"

讷河县的土地从放荒开始，就出现了浮荒和"跑马占荒"的现象。有的荒户虽认领荒地但未交足地价款或根本未开垦，有的官僚富商富户或手指地界或骑马圈地，所谓跑马占荒，使大量土地落入个人之手而未开垦。就是在已垦荒地，也出现虚报冒领，买卖转让，册契无从稽核，界限混乱，升科不一致等现象。一些人以领荒为手段从中渔利，诈取钱财。为此，从民国三年（1914年）起，省政府决定进行土地清丈，省设立清丈兼招垦总局，第一分局设在讷河县城，辖讷河、嫩江县及西布特哈（即今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由李梦庚任分局长。三月十三日到任署理清丈招垦事宜，发布《特别规定案》，主要是重新清丈土地，调整荒价。规定清丈范围为"凡关于清丈已放毛荒与垦熟未升科地亩，及城基、镇基、屯基均依本规定行之"。清丈办法是："分段清丈，各分局应按方广面积划分若干区，再分起按勘丈"、"勘丈各户地亩，查明原放垧数，如有浮多应行划出"，"丈出浮多生熟地或街基，可准业主备价承领。如业主熟少荒多无力承垦者，应先准邻户报领，否则取结另款。丈地以绳弓，按弓作尺、五尺二寸为一弓、以二千八百八十弓为一垧。清丈生熟荒地收价办法是：熟地分上、中、下三等，每垧收银元一等九元，二等六元、三等三元；生荒地分四等，为上、中、下、最下，上等四元、中等三元，下等一元，最下等五角。生熟地一律从出放后第六年升科。经过清丈，讷河清出站丁地8.5万垧，八旗生计地3,000垧，官牧地1,60(垧。站丁浮地收价加一倍，即每垧地收二元，其

余浮地按三等荒地每垧收一元。清丈后又续放嫩江东岸江套毛荒12.9万垧。到此，全县放荒，清丈遂告结束。

清丈土地表面上是对土地进行复查，实质上是土地的重新分配和占有。一些富户乘机收买贫困户的土地，实行土地兼并，使这些人重新失去土地沦为佃户；还有一些官僚富商在清丈中依权占地，跑马占荒，大量圈占土地。如当时的黑龙江省省长毕桂芳、于驷兴、龙江道尹常荫庭等人，在讷河县的老莱、讷南、通南等地圈占了大量土地。他们把土地分成若干份，按片建窝堡，雇用荒户耕种，收取租金和粮食，残酷地剥削农民。通过清丈，土地大量集中，当时占农民总数18%的地主却占有57%的土地。

讷河县清代和民国初年的土地开发是一部劳动人民的血泪史，使土地占有关系发生深刻地变化，农民开始失去土地，遭受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严重的阶级对立。但，从另一方面看，通过土地开发给沿边地区带来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一些近代化产业不断产生，分工越来越细密，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为以讷河镇为中心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括山东移民一屯）。为使移民长远扎根，安心生产，在此官办一个货店，向他们提供生产、生活物资，故名官货店。因地处讷谟尔河南岸，1935年后改称讷南。

鲁民村，民国二年（1913年），黑龙江省督军宋小濂用官款从山东移民100人来此建屯开荒种地。为便于管理，将此屯列入鄂民七屯之中，又因此屯为七屯之首，故名山东头屯。1942年按照山东省简称"鲁"款称鲁民。

通南镇，驻地原名奉天沟。民国五年（1916年），由奉天（今沈阳市）人赵子扬来此建屯开荒而得名。因当时这里只有一口井，附近人全要来此汲水，故又称头面井。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里成为讷河县通往克山、拜泉、依安、富裕等县的交通要道，改称通南。

龙河镇，驻地原名他奔，又称他本浅、他文浅、塔贲浅等。达斡尔语"他奔"是数字5的意思，"沁"是数字词尾"们"的意思，由于地名意为"村庄"、"部落"。"他奔沁"合意为"五家子"、"五户屯"。清顺治六至九年（1646—1652年），由达斡尔族郭博勒哈拉（氏族）的五户人家最早在这里建屯落居而得名。

南音屯，原名阿彦，又称那彦，蒙古和达斡尔语均为"狩猎"之意，今属龙河镇辖。由于达斡尔族没有文字，在一些汉文记载中音转字误为那音、南音、南阳、那音浅等。

莽霍屯，又名满那、满乃、莽粪等，为达斡尔语"振兴"、"兴旺"的音讹。蒙古语意为"脑门"、"前额"。今属龙河镇保安村。以前落居这里的达斡尔族郭博勒氏，原住黑龙江以北今苏联苗通河一带，芒瑰河又称莽鼐河。清

初，沙皇俄国派军侵占了我国当时在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迫使世居那里的我国达斡尔族人民不得不渡江南迁，其中郭博勒氏这一支选在讷谟尔河流域定居。他们沿用了莽鼐河的河名为新住地名称。莽鼐，是中国末代皇后婉容的祖居地，至今这里仍保留有郭氏祖先坟墓的残碑断瓦，成为研究达斡尔族历史的珍贵资料。

保安屯，原名阔奇，亦称霍赤、霍奇、火旗。“阔奇”为达斡尔语“湾子”、“围抱”之意，这里靠近讷谟尔河，地处河湾而得名。

莫力屯，今龙河镇辖。又称莫勒、莫古力，达斡尔语意为做勒勒车轮的“弯木”或“马”之意。它反映了达斡尔人从事狩猎经常活动在草原上，因此离不开马和勒勒车（俗称草上飞，也叫大轱辘车）作为交通工具的生活习俗。

九井乡，驻地初名五福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尹乃廷、单玉奇等五户在此联合购置了九井(一井36方)官地，建屯开荒。为祈求五户人家从此兴旺发达，王家岗曾取五福堂为名。后因发现五福与无福谐音，于1902年改称九井。

学田乡，驻地国兴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建，初名老局子。民国三年（1914年），县劝学所按省公署指令，在这里划出毛荒地三千垧为官有学田地，将其出租收入用于县内办学经费。因处于县城北部，取名北学田。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开拓团在此设立“红部”（总部），伪县警务科在这设立大和警察署，地名遂改称大和署。解放后，初称新局子，后改称学田。

清和乡，驻建二里五屯，1921年建，因屯址在老清和屯

（今光明村）至县城公路的二里半处，故名。初属学田，1961年析出为乡。

开阔沁屯，又称开阔浅、开花浅，今属清河乡富源村，达斡尔语意为"盛产小鲫鱼的村庄"，由屯西紧靠嫩江，每遇涨水时在屯子边上即可捕到鲫鱼而得名。原为达斡尔族鄂嫩氏住地，这里与李库沁、李苏沁以及嫩江西岸的阿彦沁的达斡尔人为同一个家族的叔伯兄弟。

都尔奔沁屯。又称都尔本沁、都拉本浅、杜鲁门浅，今属清和乡光明村，达斡尔语意为"四家子"。该屯西临嫩江，东靠山丘，是张弓射猎、撒网捕鱼的好地方，也是鄂嫩氏的主要部落之一。在该屯东北一公里处，今仍遗有清嘉庆年间该氏族祖先显远将军的墓葬及碑文。

太和乡，驻地新安屯，伪康德七年（1940年），由在六合车站南设立新安村公所而得名。解放后，曾名第七区、解放管理区、红太阳人民公社等，1959年称太和人民公社，1984年改乡制。辖区的解放村，多居朝鲜族人，盛产水稻。

大古堆，今太和乡黎明村驻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平定三藩叛乱后，由云南发配吴三桂原属官兵及家属到拉哈站，后来又将其中刘姓一支派至此地建屯种地，因屯子中间有一大土堆，故名。随着人口的增多，后来又以大土堆为界分成东、西两个大古堆屯。

二克浅乡。驻地二克浅屯，原名"阿拉哈沁"。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由达斡尔族孟尔丁氏建屯。"二克浅"由雅克萨城的别名"阿尔巴津"音转而来。"阿尔巴津"，达斡尔语意为"当差的"（关成合《阿尔巴津城考》）。清

初，由于沙俄入侵，原住雅克萨（阿尔巴津）的我国达斡尔族人民被迫南迁嫩江流域。为了教育后代记住他们的祖先原是雅克萨（阿尔巴津）迁移来的，所以在给新聚落取名时，沿用了原来住地名称。后来由于这里大量涌入汉族人口，受音转影响，阿拉哈沁就变成了阿拉克沁、阿克浅、二克浅了。同样原因，迁至齐齐哈尔郊区的雅克萨变成了雅克赛，迁至内蒙古喜桂图旗的雅克萨变成了牙克石。

大克浅，隶属二克浅乡，原名“达哈沁”，又称达哈浅、达嘎浅，达斡尔语“跟谁来的”之意，用于地名意为“后建立的村庄”。因为居住在这里的鄂嫩氏达斡尔人，是跟随二克浅的孟尔丁氏之后来此建屯定居的。

登科屯，今二克浅乡登科村驻地，全称“都沁德恩嫩克”，又称“都西根”、“登特科”，“登科”是其简称，达斡尔意为“兴旺发达”。历史上属莫尔登扎兰敖拉哈拉。

西庄，隶属二克浅乡，今西庄村驻地，建于康熙年间，因位于博尔多驿站之西故名。

全胜乡，驻地朝鲜屯，来于1956年，由朝鲜族人来此建屯种植水稻而得名，是县内朝鲜族人主要聚居地之一。全胜乡原属鲁民、油库管辖，1966年建立全胜公社，1984年设乡。乡内地下非金属矿藏石英砂、高岭土、钾长石等蕴藏丰富。1989年利用高岭土生产瓷器成功并批量投放市场。

西阿南屯，隶属全胜乡，清嘉庆年间由博尔多驿站的放牧窝棚扩展而成。因当时讷谟尔河南岸仅有两处聚落，这里位于西端，故名。1900年清子教乱，群建入侵。其中沙俄乘清廷无暇北顾之机，过大江，占黑河，越大岭，直清博尔

多，激起了全省人民的强烈义愤和反抗。齐齐哈尔义和团团民在张拳师的率领下，和讷河人民在讷谟尔河北岸，配合清朝官兵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由于义和团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统治者视其为眼中钉，经过密谋策划，将张拳师逮捕，押赴西河南屯之西处死（见《庚子交涉隅录》）。从此义和团被迫解体，使侵略者得以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长驱直入，进逼齐齐哈尔城下。

孔国乡，驻地中合屯，原名"洪果布尔克"，音转称"孔郭伯尔克"。达斡尔语"洪果"为"聋子"，"布尔克"为"住地"之意，合意为"住有聋子的村庄"。后来人们为了语言方便，将其简称为洪霍、红花、孔国，为达斡尔人郭博勒氏聚落。

哈力屯，今孔国乡兆麟村驻地，又称哈里，达斡尔语"小溪"之意。由于原聚落以后分解为二，故又分大小哈力或东西哈力二屯。传说解放前抗联李兆麟将军曾到大哈力屯开辟抗日救国工作，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抗日将领，在设置村的建置时，将村名定为兆麟。

前于家屯，隶属孔国乡四清村。在民国末年于占怀、于占龙兄弟二人最初建屯得名。后在一年秋冬季节，于家去草甸拉草遇荒火将草车全部烧掉（另说是赶车人在草车上吸烟引起大火），从此，前于家屯被称"火烧于屯"。1939年冬，抗日联军六军十二团在政治部主任王钧的率领下，曾在此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打死打伤敌人百余名，取得辉煌战果，地方史称这次战斗为"火烧子战斗"。

激化乡，驻地永和屯，距县城12公里，原属孔国乡辖。

1966年10月析出成立进化人民公社，1984年改乡制。

大伯尔科，俗称大玻璃科，今属进化乡信义村辖，原为达斡尔人郭博勒氏聚落，为达斡尔语“大屯”的意思。在此屯东还有一个同一郭氏家族建立的屯子，因为人口和规模比大伯尔科小，人们习惯称其为小伯尔科。

老莱河屯，在讷河镇东6公里的老莱河东岸，隶属进化乡，为今进化村驻地。清顺治年间由达斡尔族郭博勒氏来此建屯，初名乌尔西格（达语，其意待考）。后因该屯靠近老莱河，改称今名。

团结乡，驻地忠义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伊跃恒在此建屯开设烧锅，初名伊家烧锅屯，1925年改称双龙镇。1931年后曾名三区、九区、十五区、八区、忠义乡等称。由于原辖区内除居住着汉族人民外，还有鄂温克、达斡尔等少数民族，是个多民族共同居住，友好相处的地方，在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各族人民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取名团结，沿用至今。

兴旺鄂温克族乡，驻地范家屯，1987年3月建立民族乡时，为祝愿居住在这里的鄂温克和其他族人民生产、生活永远发达昌盛取名兴旺。

嘎布喀屯，又称嘎布卡、嘎布哈，今属兴旺鄂温克族乡。清顺治十年（1653年），由精奇里江（今苏联境内的结雅河）流域迁来的涂克敦鄂温克人建立。鄂温克语“嘎卡”意为“山沟”，由以前屯子后面沿江一带多是高低不平柳条沟而得名。因屯中住有世袭章京（即佐领，四品衔），人们按章京谐音转称这里为“占仁”或“占音”。

和盛乡，驻地徐家围子屯，在讷河县西南56公里处。民国九年（1920年）因徐庆祥一家在此开荒建屯而得名。民国时为三区管辖，日伪称仁和村，解放后初名九区，1958年成立和盛人民公社，后改乡制。

巨和乡，驻地老吴家油坊，民国六年（1917年）因吴怀久一家在此设屯开办油坊而得名。1935年设巨和村。解放后属讷南区，1955年析出为乡。1958年并入讷南人民公社，1966年由讷南划出成立巨和公社，1984年改巨和乡。

同心乡，驻地初名谭家窑，原有谭凤祥兄弟二人在此开荒种地，民国十一年（1922年）又有望奎一些农民来此落户定居。为防土匪抢劫，共同在聚落周围筑上土围墙，取名谭家窑。日伪时期谭家窑隶属通南，1942年改称同心屯。解放后，1961年从前进人民公社（今通南镇）划出成立同心人民公社，1984年改乡。

长发乡，驻地老长发屯，1920年建，日伪时原属讷南警察署，1942年改善邻村，解放后初属七区，后受辖于解放区、民和乡，红太阳人民公社（太和），1961年划出成立长发公社，1984年改乡。

友好乡，驻地新安屯，1940年建。因距县城较远，地处本县边界，最初取名三不管，1947年改今称。初隶龙河，1958年建人民公社，1984年改友好乡。解放前，抗日联军利用这里山高林密，河道纵横的有利条件，在与嫩江县接壤的朝阳山区建立密营，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著名的三马架、三合屯战斗和消灭高四阎王的战斗均发生在这里。

永丰乡，驻地前四合屯，位于县城北7.5公里处，清同治七年（1868年）建。初名前四撮房，1948年改今称。1961年由老莱划出成立永丰人民公社，1984年改乡制。

同义乡，驻地福民村，初名郭家屯，1917年因吉林省德惠县郭万春来此开荒建屯而得名。1938年改称福民村。解放后，1947年称十一区，1955年称凌云区，1958年建立同义人民公社，1984年改乡。1946年10月，省委土改工作团在这里开展工作时，遭土匪300多人袭击。工作团周密布置，沉着应战，后在增援部队的支援下发起猛攻，将大部分顽匪歼灭。

陈柏川在苏联的战斗生涯

孙洪阁　董贵臣

1957年11月5日，中国赴苏联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观礼团随员中，有一位年逾七旬的陈柏川，他家原住我县喀迷哈站（现老莱镇），早年曾参加过苏联十月革命，并在捍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斗争中与苏联英雄儿女并肩战斗了几十年。

一支中苏混合游命队

满清政府崩溃前一年的1910年，27岁的青年农民陈柏川，给本地姓岳的财主扛活，过着衣不遮体，食不糊口的生活。一天和岳财主干了一仗，被撵了出去，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他告别家人，离开了家乡老莱(旧称喀迷尼哈)到俄国去谋生。他跑到黑龙江北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安下了身，先在码头当装卸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仅得五、六十个戈比，还是顾不上自己的一张嘴。到此他才明白：满清是个虎口，沙俄也是狼窝，天下乌鸦一般黑。他实在忍受不了码头的

严酷生活，便同那些俄国穷朋友分了手，到附近的丘吉耶夫村给有钱人古西佐夫家打活。

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二年1918年，国际帝国主义和苏联国内阶级敌人结成武装联盟，企图扼杀苏联的十月革命。在远东，日本军队在海参崴登陆，与白匪高尔察克联合起来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疯狂进攻。苏联军队和人民奋起反击。1918年5月的一天，丘吉耶夫村突然来了不少游击队，古西佐夫家里也住了一些。其中有个叫穆哈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是游击队的指挥员。晚间，他把陈柏川叫到他的房子里，热情的和他谈话。穆哈说："地主、富农、资本家榨取我们穷苦人的血汗，把他们打倒了，穷人就好了。要想过好日子，我们就得起来革命，赶走外国军队，消灭白匪军。"这些话他是头一回听说。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他想："我给富人干了那么多活，如今还是个穷光蛋，象我这样的人全世界一定不少，要不革命啥时才有头呢？"他决定参加革命。

陈伯川把穆哈的话讲给其他人听，并到附近村庄去串连，当晚就有五十多中国兄弟报名参加了游击队。穆哈把他们单独编成一个排，每人发一支枪或一把马刀。穆哈委任陈柏川当排长。从此这支游击队成了一支中苏混合游击队。

将仇恨化作力量

穆哈领导的游击队有一万多人，武器有大炮、轻重机枪和步枪，少数人没枪使用马刀。陈柏川有一支短枪和一把马刀。他们整天在山林里和日本人、白匪军兜圈子。有时白天隐蔽，夜晚出击；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活动。这年冬天，在苏拉斯西北的利金诺火车站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敌人

不少武器弹药。后因缺粮食、冬衣和弹药，穆哈下令部队暂时化整为零，保存实力。有的分成小股继续活动，有的暂时回家，留下27名连以上干部到山里去，准备来年春组织马队。在这27名干部中有一名中国人——陈柏川。大家团结得象亲兄弟一样，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东边二百多里的深山里，整个冬天全靠打猎维持生活。

1919年春天，正当他们重整队伍，迎接新的战斗时，发生了两件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一是指挥员穆哈同志，被敌人逮捕枪杀了；二是在别尔木村，一批红军战士被白匪军包围杀害了，其中还有几个中国兄弟。这些战友被脱光了衣服绑在木桩上，让西伯利亚的严寒将他们活活冻死。有个红军战士一对眼睛被匪徒挖掉，尸体惨不忍睹。陈柏川看到这种惨无人道的情景，胸中怒火燃烧，他激动地说："同志们都看清了吧，反动派对革命战士是多么仇恨！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彻底消灭这群野兽，为穆哈同志报仇，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这27名红军干部分头下去，组织动员农村青年参军参战。同时将去年遣散的战士召集回来，新的部队组织起来了。指挥这支队伍的司令官叫依斯捷维奇，政委叫斯洛夫，共成立六个大队一万多人，其中有五个是马队。陈柏川是马队副队长。他们作战时和穆哈一样：敌人强，他们就走；敌人弱，他们就打，与白匪和外国军队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

陈柏川当时以能打硬仗而闻名。在进攻布列雅河附近的一个白匪军火库时，有一个大队冲了几次都未攻下，司令部立即调陈柏川马队上去。他们一举攻下了军火库，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立下了战功。还有一次在布列雅河战斗中，陈柏

川一马当先冲在前面，右手挥刀，左手握枪，带领战士象旋风般冲向白匪骑兵，杀得敌人纷纷落马，威震敌军。

达尔百代村脱险

1919年5月，陈柏川与队长安多姆带领二百多个战士去赤塔以东的达尔百代村。这个村子很大，村东是起伏不平的山岗，村北是一片密林。陈柏川先带六名战士进了村，只见家家关门闭户，不见一个人影，他们警惕地搜索前进。村子中心横着一条两丈多宽的小河，河上架着一座木桥。从桥上迎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陈柏川迎上去问道："这村子里有白匪军吗？"回答"没有。"又问："去乌尔斯由哪走？"回答："过桥一直往东。"老头说完匆匆而去。

原来这老头是个坏蛋。陈柏川带领骑兵跨过小桥，刚到十字路口，就见成群的白匪军从各家门洞里窜出来朝他们开火。陈柏川急忙向战士们喊："跟我来！"骑兵随其后向前奔驰。在一家门口碰上一个白匪军，被战士打死了。刚到村头，有个战士被白匪军击中掉下马来。陈柏川一见冲向敌人，带领战士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

基尼莱大捷

1919年的冬天，陈柏川这个大队又吸收一些中国人入伍。战士们几乎都是日本的装备，在谢苗乌卡斯的一次战斗中，战士们英勇战斗，歼灭了二百多日军，缴获了一门小钢炮、一挺重机枪和大量枪支弹药，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

冬末的一天，他们的大队进攻日军的另一个据点基尼莱村。这里驻扎日军一个大队，约有二、三百人。村子的南边有一条小河，河上架着桥。经侦察，日军的机枪火力点就设

在桥头，桥后边就是日军的大队部。夜里陈柏川与安多姆商量，决定用轮番射击的战术，先打掉敌人的桥头机枪阵地，然后率部冲过桥去攻占敌人的大队部，顺势全歼敌人。深夜十二点整，临河埋伏的游击队员先向敌人的机枪 阵 地 开了火，担负正面进攻的战士们，遵照指挥官的命令，每十分钟放一排枪，然后，再换上一排人轮番打枪。这样打了将近三个小时，敌人的手脚冻僵了，已无心回击，枪声也稀疏了。三点整，大队长发出了冲锋的信号，战士们高喊着“乌拉”，冲过小河，突入敌人阵地。日军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从房子里，从地堡中爬出来举手投降。这场战斗缴获的战利品拉了几大车，枪炮、子弹、罐头什么都有。

高举红旗喊“乌拉”

1920年春天，胜利的形势带来了新的战斗任务。安多姆带领大队的苏联战士向赤塔进军；陈柏川带领中国战士随红军部队进入布拉戈维申斯克。分手时，中苏战士都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当中国游击队战士进入布拉戈维申斯克时，那里的人民用鲜花、彩旗夹道欢迎。当地的红军司令官叫谢尔什夫、政委是斯洛夫，中国战士被正式纳入红军编制，换上红军服装，佩上苏式轮盘枪。他们被编入有两千多人的红军特别一团，陈柏川担任副团长。这个团的装备很先进，不但有机枪、大炮，还有两辆坦克。不久接到了上级命令：把残余的日军从博尔基亚一带赶出国境去！战士们乘胜奋勇前进，向残余日军发起猛烈进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打败了日军和谢敏诺夫的白匪军，解放了博尔基亚东部广大地区。当年冬底，就把全部敌人赶出了苏联国境。

1929年底，陈柏川在苏联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1930年1月，组织上调陈柏川从赤塔到莫斯科“布什林”军事学校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分配到伯力军区工作。

人思故乡鸟思林

1938年，陈柏川被调到莫斯科“李大钊俱乐部”任主任。此时他的思恋祖国之心油然而生。1939年5月，他有幸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任弼时同志，说明了他想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愿望。任弼时与延安方面取得联系，批准他于5月底回到了延安。

随他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玛丽娃·马谢维娜-阿洛娃和养女陈桂芝。陈柏川于1922年在赤塔结婚，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留在了苏联。儿子别佳，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成为出色的航空员。在柏林上空的一次战斗中，他的飞机被击中起火，他跳伞后机智的胜利返回基地。他的女儿在伯力边区当会计。义女陈桂芝原是一名华工女儿，家住赤塔，七岁时成了孤儿被陈柏川收养。陈将她送入学校读书，受到良好的教育。孩子很有天份，陈柏川很喜欢她。回国时她已19岁，在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对陈柏川的晚年悉心尽孝。她于1982年在北京邮电学院图书馆任馆长，现离休，享受厅局级待遇。

陈柏川回到延安，王震旅长亲切的接见了他。他要求到抗日最前线去，组织上考虑他年龄已高，劝他回东北老家看看。他表示：没有国，焉有家？待抗战胜利那一天再回去也不迟。后来留在枣园任中央机关保卫处副处长。

1945年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兵分三路开进东北夹击日寇。陈柏川要求去东北与苏军共同作战，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当他到齐齐哈尔时，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陈柏川于当年9月下旬带着警卫员王大昌、张友离开齐齐哈尔回到家乡老莱。家人团聚，悲喜交加。周围十里八村的人也都赶来看望他。

当时家乡虽已解放，但局势还不明朗。本地有个草头王韩炳岐，正在拼凑光复军准备迎接国民党。陈柏川曾只身去找韩阐明大义，劝他迷途知返，勿要自误！韩勃然道：你有信仰，我有观点，咱们还是各保其主。相互在一阵笑声中分道扬镳了。陈柏川返回齐齐哈尔时，接到了上级命令：任命他为嫩江省剿匪副总指挥兼北安卫戍司令，配合王明贵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就地剿匪。

韩炳岐后来与光复军头子尚其悦、邢宪章等匪徒据守泰安镇，被陈柏川带领人民自卫军打得狼狈逃窜。1945年12月31日，陈柏川和王钧、张光迪、许英年等领导人骑马进入泰安镇时，受到父老乡亲们的夹道欢迎。陈柏川在马上频频向欢迎人群招手致意。

解放后，陈柏川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1966年10月逝世，终年84岁，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他的夫人玛丽娃·马谢维娜·阿洛娃在他逝世后不久回国定居。

（根据档案资料和陈柏川日记整理）

邵式平同志在讷河

梁玉林

一九四七年六月，正当辽沈战役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特别是保卫四平街的战斗正处于围歼敌人的阶段，为了补充兵员，支援前线，夺取辽沈战役的最后胜利，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邵式平同志来到讷河检查指导征兵工作。在讷河的短短六、七天时间，他深入群众了解土改工作和农民分到土地后的耕种情况，他关心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慰问解放军伤病员，对讷河的征兵工作给予了指导并做了充分的肯定。在讷河期间，他写下了较长篇幅的日记（编入《邵式平日记》中），对解放了的讷河人民新生活进行热情地讴歌，对贫苦人民翻身做主人，不忘共产党的恩情，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情景做了详尽的记述，对讷河的大好河山、风土人情进行了优美的描绘。他的一言一行给讷河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也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了缅怀他，重温

先烈们的光辉事迹，我根据《邵式平日记》把这段重要的史实整理于下。

邵式平同志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七时从齐齐哈尔乘火车到达宁年站(今富裕车站)。因宁年至讷河的铁路不通，只好坐商运汽车途经拉哈镇来讷河县城。在行至距讷河县城四十五华里的秦宝屯（今同义乡庆宝村）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汽车陷入泥坑中不能开动，当时天色已晚，他只好在村中一个农户家住下。村里来了一些干部，这对当时的农村是一件新鲜事。晚饭后，村民们高兴地来到邵式平同志住的农户家，和他闲拉。他对贫苦的农民非常热情，大人每人送上一支纸烟，小孩每人送给一块饼干，于是这些庄稼人很快就同他混熟了。当时，讷河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已进行半年多了，贫雇农分得了土地，成立了变工组。他详细地询问了每户都分到多少土地，庄稼长得怎么样，还问了变工组的互助方法。变工组组长告诉他，全村贫雇农每人分得一垧半地（二十三亩五分），麦子种得较多，庄稼长得差不离；还说变工组种地快，谁出工都给记上，若是我多你少，你得给补钱，每天一千二百元（东北币，以粮食折算），他听了之后很满意。接着他又问了村里的治安情况，群众告诉他，我们（指贫雇农）都是一家人了，现在地主恶霸的土地分了，胡子（土匪）根也挖了，夜里有打更的，放心没事。晚饭他和群众一起吃，小米饭、大酱、大葱、生菜叶。他说晚餐很有味，香得很。

六月二十八日，因汽车陷入泥坑中拉不出来，只好雇大车去讷河。上午十时出发，下午三时才到讷河县城。讷河中

心县委书记冯纪新同志热情接待了他，并汇报了征兵工作。当时讷河县的征兵工作已经掀起了热潮。正在听汇报中，讷河二区四个乡送来新兵五十四名，超出原定计划二十四名，区长动员谁也不回去，只好都来了。特别使他受感动的是一位母亲把她两个儿子都送去了，她说："我一个老人在家，政府是会照顾的，你们放心去吧。"兄弟俩也争执不休，最后因弟弟才十五、六岁，年纪太小，大家劝他长大以后再来参军，他才哭着跟母亲回去。晚饭后，邵式平同志不顾两天来的旅途疲劳，连夜去军区第五医院（今讷河县人民医院前身）看望解放军伤病员。他仔细地看了战士们的伤势，安慰他们安心疗养，早日治好病重返前线。同时对医院的工作进行检查，指出医院的工作很有成绩，但也有缺点，房子有的地方漏雨应安排人修理；新来的伤病员尚未领到服装应马上解决。

六月二十九日，各区应征的新兵陆续到来，并由军区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全县共计送新兵七百七十四名，体检后只录取了五百多名。余下的人都不愿回去，一直跟着新兵队伍要求把他们留下。各级领导说服动员未通，邵式平同志决定全部留下，作第二次身体检查。因四平战斗正处紧张激烈阶段，且敌增援部队已到昌图、公主岭一带，军区来电，决定讷河县的第一批新兵于六月三十日启程奔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为此，县委决定翌日欢送新兵。

六月三十日，天刚放亮，讷河县城已锣鼓震天，歌声悠扬。各区应征的新兵及家属、亲人齐聚县城，热烈欢送自己的亲人上战场。县城的街道两旁、县政府广场四周到处都

挤满人群，父母送儿子参军，妻子送郎上战场，兄弟相争上前线的动人场面比比皆是，到处呈现着为解放全中国踊跃参战的热烈气氛。上午八时后，欢送仪式开始了，热闹气氛更加浓烈了。县政府广场人山人海，到处是红旗、鲜花、口号。领导们讲话，新兵表决心，亲人们语重心长的嘱托，情景交织，汇成了一个巨大的热烈欢腾的海洋。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邵式平同志激动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到县政府哨楼上向四野瞭望，旷无边际的麦田中，一排排大红旗，化了装的秧歌队，迈着整齐步伐的新战士，扛着红缨枪的自卫队，以及广大的人群，远远近近，前前后后，都顺着大路，唱着革命歌，跳着秧歌舞，从四面八方向县城涌来，讷河顿时显现出独立、民主、自由的战斗新气象…………"。新兵队伍出发了，讷河人民倾城而动，从县府到南门外马路两侧，站满了欢送的人群，无数双手在空中飞舞，震天的口号淹没了一切。群众都说，自有讷河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热闹场面。载运新兵的汽车在狭窄的路面上缓缓而行，应征入伍的战士举着帽子向家乡父老宣誓："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决不回来"。一些检查未合格的青年趁汽车慢行之机，从缝隙中扒上车去，藏到新兵队伍之中。

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县政府召开了纪念"七一"党的生日大会。邵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热情的讲话，他说："党自成立到今天已经二十六年了，在这二十六年中，我们党领导过轰轰烈烈四次革命，这一次一定要成功了。"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会上他高度评价了讷河的征兵工作，说："扩兵任务完成最快的还算讷河。"七月一日

至二日，第二批应征入伍的战士开始体检，这里不仅有乡下送来的新兵，而且还有县城街公所、县城区工会送来的新兵。检查身体后又录取了四百多名。二日又一次召开了欢送大会，其热烈情景不亚于上次欢送会。

七月三日，邓式平同志要离开讷河去嫩江县。他在几天繁忙征兵工作中，还抽出时间检查了西满军区驻讷河供给部的工作，看了种池、养猪、制酒、制油等机械设备，高兴地说：把生产搞上去了，不仅后方做到了自给，同时也支援了前线。他还参加了讷河街公所召开的斗争大会，斗争了伪满汉奸和特务，对罪大恶极的给予了坚决镇压，大鼓了革命人民的斗志。

出发时，天空阴雨绵绵，仿佛要留住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送了一程又一程。路上，他望着讷河广阔的原野和碧绿的草原上芬芳扑鼻的金针菜、马莲花，无限深情地说，有机会还会再来讷河。

记农业集体化的领头人——马庆福

董贵臣　孙洪阁　徐翔

马庆福，汉族，1917年12月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肖家窝堡的一个贫农家庭。1934年来到讷河县老四甲向阳堡屯（今老莱镇胜利村）卖零工。1939年后给地主扛活，在老莱街挑水，直到1945年祖国光复。1947年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斗地主，打恶霸，分得了土地和房屋，从此翻身做了主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组织互助组，担任组长和行政屯长。1951年带头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成为全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1955年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1958年人民公社化，担任老莱人民公社胜利管理区主任、党总支书记，并当选为县委委员、老莱人民公社副社长。1959年赴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观礼。1960年当选为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1年改任胜利大队党总支书记。1964年出席全国第二次群英会。1969年二次晋京参加建国20周年大庆观

礼。1970年当选为县和嫩江地区贫协副主任。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1976年任老莱公社党委副书记。二十八年来，多次受到中央和省、市、县的表彰和奖励。他领导的胜利大队被誉为省、市、县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农业战线标兵单位，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

一生受赞誉的四件大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庆福这位普通农民出身的农村基层干部，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常说："我为人民做的事情不多，但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多了。"他一生难忘的有四件大事：1959年和1969年参加建国十周年和二十周年国庆观礼；1964年出席全国第二次群英会，被授予"五一"劳动模范金质奖章；1975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1959年9月30日，马庆福随黑龙江省国庆观礼代表团到达北京，下榻北京饭店509房间。下午3时左右，国庆筹委会一位女同志走进来，很有礼貌的将两份红色请柬呈给他：一是9月30日下午7时，请马庆福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二是10月1日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庆祝游行观礼。他手持两份请柬，激动万分，凝思了许久。他说："我做梦也没想到被请参加国宴和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下午六时半，一辆大轿车停在饭店门前，马庆福和全省著名劳动模范马恒昌、苏广铭、孙茂松、吕和登车来到人民大会堂，个个满面春风的步入了宴会厅。7点整，宴会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开始，周恩来总理首先致祝酒词。大家的目光一

齐注视着他，特别是那些外国人都以一睹总理的风采为快，他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邻坐的苏广铭悄悄告诉马庆福："今天参加招待会的有外国使节，各界知名人士，将军元帅，在京的中央委员，劳动模范只是一少部分人，共计2000多人，中央领导除了朱总司令和国防部长林彪都来了"。马庆福问："怎么没见到毛主席呢？"苏说："毛主席明天上天安门城楼，咱们在观礼台上会见到的。"总理讲完话宴会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到各桌祝酒，气氛十分浓烈。此时一位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和一名翻译来到马庆福桌前，说了一些他听不懂的话，翻译向他说："您是马先生吗？我是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农业参赞，我与你的农庄有过友谊的联系，我在贵国报上见到你的事迹。马先生真了不起，您为贵国开垦不少荒原，还培育出不少新种子。你们那里是世界上十分少有的黑土地，你们那里的风光和草原一定是很美丽的，你的庄园一定很大很大，我很想去旅游观光。你有汽车吗？你有别墅吗？这次来京为何不带夫人呢？"马庆福第一次与外国人说话，开头有些语塞。随后清了下嗓子与这位参赞对话，又经翻译调整，意思是：我十分感谢这位参赞先生对我的夸奖，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对国家贡献不大。我本人无汽车和别墅，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建设时期，以后肯定会有的。波兰朋友寄给我们的刊物都收到了，我表示感谢！我十分欢迎先生能去我们那里指导与作客。祝参赞先生身体健康！"说完端起了酒杯。参赞听了被译过来的那番话，十分高兴，他轻轻地与马庆福碰了一下杯，饮了一大口酒。走时又回头说："对了，明年春天，我会赠给马先生几颗马铃薯，不

多，只能是两三颗。请试培一下。”这位波兰外交官翌年春果真送了四颗土豆种，经农民育种家任国友精心培育，秋后长的很大，果呈长圆形，比普通品种增产50%，曾在老莱一带推广很受欢迎。十月一日马庆福与其他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见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二日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胸前戴上了“全国劳动模范”金质奖章。十月四日从北京启程回省。

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时，他再次应邀晋京，又一次幸福的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75年马庆福同志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同各族各界代表讨论了国家大事。他开会回来感慨万分的说：“我过去两次见到毛主席，三次见到周总理，一次见到朱总司令。每次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我的心就象有股暖流，受感动，受激励，受鼓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催我奋发向上，勤奋工作。”

带头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向阳村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斗倒了地主恶霸，穷人分得了土地，当家作了主人。马庆福分得三垧八亩地和一匹马，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从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那年他32岁，精农活，有力气，农业知识也比一般群众多，所以他种的地到秋比别人家多收两成。屯里人都夸马庆福是把庄稼好手。那年冬天，他被选上村劳动模范，又被选为裕民屯屯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庆福是党组织公开后第一批入党的党员。他思想进步，听党的话，努力工作，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

"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伟大号召，他说："组织起来的道路好，互助合作，你帮我，我帮你，三人同心，黄土变金"。当时裕民屯翻身后的农民都过上了"三垧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大都安于现状。马庆福认为应该走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找本屯有点子的李景洲老人说："李叔，咱们不能老守着这点地过日子，我们联合几户，把那块东北荒开起来，一定能多打粮食。"李景洲认为马庆福的话很有道理，但把众多的户聚在一起很不容易。以后马庆福又动员李叔说："你在屯子里德高望重，又有10垧地、四匹牲口、一台车，还有三个儿子；我也有马有地，年轻多干点。这事由咱爷俩挑头，我想准成。"李景洲终于被马庆福说服了，俩人便在屯中串联，但多数人想观望；少数人知道李景洲能算，马庆福能干，还是党员，有他们带头，错不了。不久本屯另一个党员任国祥和庄稼把式贾文普、贾文祥要求参加，关少义、周连贵、任国友、崔长林等人陆陆续续报了名，算起来已有十六户，快占全屯半数了。李景洲与马庆福把报名户的土地、牲口、车辆、犁犋、劳力等初步计算一下，连马带牛已足够四副大犁；劳动中有打头的、车把式、大犁把和两名能写会算的，文武双全。但搞什么样的合作形式，周围农村没有先例，从报纸上看有临时组、季节组、常年组的形式，合作时间都不长。他们要办个人合心、马合套，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永不垮台的互助组。土地、牲畜、车辆、犁犋仍属个人财产，但都要全部投入互助组使用，秋后按投入付酬。牲畜集中饲养，各户投草投料。

互助组成立之后，李景洲领导耕种本屯土地，马庆福带

两副大犁，领导常年开荒。他们在东大荒搭起了窝棚，早三点套犁，马庆福与贾文祥各掌一副大犁，头一天马庆福就开了11亩，垅长二里半。沉睡千年的荒野在他们的犁下被开垦起来，闪着黑色的光泽。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看到了希望和富庶。虽然手脚打起了血泡，满身的泥土和汗水，也不觉得苦与累，当年秋天开荒130垧，比原计划多开了30垧。

马庆福组织互助组的消息，不胫而走，区委书记李景新感到这是个新鲜事，马上向县委书记霍方侠作了汇报。霍书记带领农工部干部亲自来到裕民屯，又到新开荒的地方，看到了那片新开起来的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这是小农户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是件新生事物。霍书记留下干部让他们帮助总结这里的经验，向上级汇报，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特别支持，决定向这里派驻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1951年3月，农艺师李肖连、陆松涛两人便来到了马庆福互助组，并带来当时的小麦新品种"甘肃96号"。东北人民政府赠给互助组一台马拉小麦播种机，麦收前再赠一台马拉摇臂收割机。新式播种机进村时，全屯男女老幼都来观看，马庆福和李景洲更是乐的合不拢嘴。当时马庆福安排互助组里的知识青年林英拜李肖连、陆松涛为师，学习这种农具的操作、保养和维修知识（后来林英成了胜利村第一个农机人才）。当年互助组的小麦三分之二面积是由新式播种机播的，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这一年是马庆福互助组最忙碌的一年。麦收前夕，有经验的农民在屈指估量这片大丰收小麦的产量，最多估到垧产2000斤。李肖连农艺师用科学测产法，粗确的计算出垧

产2900斤，比去年产量翻一番还多。

东北日报社一位姓焦的女记者，抢先作了采访和报道。8月4日，东北电影制片厂来了一个摄制组，拍摄科教片《马拉摇臂收割机在裕民屯》。省著名画家刁斗明也前来进行速写报导。随后《东北日报》、《黑龙江日报》相继报道了这个互助组小麦大面积丰收，和马庆福、李景洲办互助组，组织开荒的事迹。于是慕名而来的参观团纷纷而至。八月份又发生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华代表团一行九人，在团长农林省副相的率领下来这里参观访问，和马庆福、李景洲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这年，马庆福被评为讷河县特级劳动模范，出席了黑龙江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并受到中央农业部的嘉奖，获得金质奖章一枚。马庆福一时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人们学习的榜样。他领导的向阳村合作化发展的很快，次年全村出展各种形式的互助组70多个，参加的农户占全村的80%，是我县、我省第一个基本实现合作化的村。

1951年12月初，黑龙江省主席于黑夫率工作组来裕民屯搞调査，与马庆福、李景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夸赞二人是从小农经济的王国里脱颖而出的新式农民代表。经过二十几天的工作，马庆福互助组与另外三个互助组合并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起名为“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

全社152口人，51名男女劳力、30匹马、23头牛、9台大车、2副大犁、2副杯耙，还有苏联马拉播种机、马拉展臂收割机各一套，耕地440垧。合作社民主选举产生了理事会，马庆福为理事会主任。下设农业生产组、车马管理组、

农业技术研究组、副业组、行政管理组、妇女组、文化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制订了“社员劳动制度”、“财会管理制度”、“物品保管制度”、“牲畜饲养使役制度”。合作社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以后又制定了社章，最后一条规定：对失去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社里给予照顾。充分显示了农业生产合作制度的优越性。

一九五五年底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前，马庆福领导的金星初级社与临近的红星、五尾等十一个初级社合并成立胜利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担任主任，从而为全省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胜利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达356户，占全村总户数的92.2%，集体耕地面积35,595亩，耕畜407匹（头），男女劳力758名，下设十一个作业区。在高级社刚刚建成和起步发展之时，出现了财务收支有漏洞，劳动计酬不合理，耕畜管理的不好等一些问题，马庆福同志多次召开党支部会议，社管理委员会和社员大会，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研究解决的办法。其中首要的是对全体社员进行集体主义思想和主人翁意识的教育，并相应地建立了管理制度，加强了经营管理。同时组织扩大再生产，利用新购的一台斯大林80号和一台德特54拖拉机进行大面积合理开荒，提倡精耕细作，坚持三铲三趟，培育良种，实现了良种化。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制定了农业、牧业、林业、副业等59项全面发展生产的五年远景规划，之后领导社员热火朝天的投入建设中。仅1956年就发展132匹马，103头牛，

178头猪和790只鸡，植树270亩，建一处75亩的苗圃，成立了渔业队和粉坊、豆腐坊，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修建四条713里长的顺水壕，打井22眼，在老莱河上架起一座沟通东西交通的木桥。

1958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马庆福积极响应，在全县第一个积极报名参加了人民公社。他带领胜利生产大队广大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农、林、牧、副、渔、工各业全面发展。根据大队的实际情况，实行大队统一核算和以产计酬，费用包干，超产奖励的分配制度，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期间，胜利大队虽然遭到"五风"的袭击和"社教"、"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干扰破坏，但马庆福领导的胜利大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农业生产稳步发展，粮食产量一直上升。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马庆福同志对此认识的比较早。他带头推广使用新式马拉农具，到1955年拥有马拉播种机、元盘耙、收割机、双轮双铧犁和水田犁等60台。1957年自筹资金购买了两台捷克热特25型胶轮拖拉机，开始自办农业机械化。至1978年已拥有大中型拖拉机十八台，农用汽车两台、大型机引农具125台（件）、非田间作业机械126台（件）。农业机械化总投资达1172万元，平均亩投资22元，农机队各类技术人员74人。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艰苦朴素　清正廉洁

马庆福同志一生严格要求自己，以"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自励。他外出开会、参观的机会很多，但从不坐社里的胶轮拖拉机，更不去游山玩水。会议或活动一结束就赶回大队，

及时传达落实会议精神。他带人出去参观学习，都是住最低档的旅店，乘坐最近路线的火车。1977年他带二十多人参观山西大寨和山东夏丁家，结束时有人提议由青岛乘船经大连回去，被马庆福拒绝了。他外出既不多带公款，也不大包小包的买东西。他老伴抱怨说："你进京上省，没见你带回点什么稀罕玩艺，总是甩搭着手回来"。1964年进京参加第二次群英会，在别人的劝说下买一件浅灰色的风衣，开完会回来便脱下搁起来。他虽然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最高荣誉，在群众面前却从不摆架子、不炫耀自己，而是和社员们一样，相处十分融洽。

马庆福早在五十年代就颇有名气，中央和省、地领导及新闻记者常去他家看望和采访，可他家一直住在一幢小草房里。1959年大队给他盖了两间砖房，他说："现在大部分社员都住草房，我当大队书记怎能特殊呢"。把那二间砖房安排做了大队托儿所。70年代初大队资金已很雄厚，砖厂办的也很红火，马庆福与支委们商量定出一个鼓励社员盖砖房的优惠政策：凡本大队社员要盖砖房，在砖厂买砖半价优惠。到70年代中期胜利大队有百分之三十社员住上了砖房。可是马庆福及总支委员们仍没有一家住砖房的。1976年马庆福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及大队研究要在老莱街给他盖三间砖房，他执意不肯，只好盖了三间草房，他又将原来的草房交给了胜利大队。

上级来领导，左右来客人，进餐一律在食堂，不喝酒。吃喝风在胜利大队一直没有刮起来。从中央部长到县委书记常来胜利大队，吃的是家常饭，住的是社员家，这种风气一直延

续了二十多年。

马庆福有三子四女，他对他们要求很严格，经常告诫子女不准利用他的影响搞特殊。胜利大队几次录用民办教师、拖拉机驾驶员和卫生所、兽医站、供销社人员，但他不许子女去。由于他这样做，其它支委也都效仿。大队录用的人都是通过考试择优录用，多年来素质较高。晚年时他对子女们说："我不会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但我这一辈子一心一意跟党走，无愧于党，无愧于乡亲，你们能继承过去，我就高兴了。"马庆福逝世后，公社党委把他的长子安排到一家国营单位当工人，活计很累很脏，但他一直默默的工作着，从不提及父亲的名字，有不少人不知道他是马庆福的儿子。

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

1963年冬，马庆福在省开农业劳模大会，省长李范五在小組讨论会上对他说："老马啊，你要老马识途啊，你要反修保马啊！"马庆福在领导幽默的指示中体会到，1958年后胜利大队的机械化程度逐年增高，马匹在大幅度减少，而发展农业机械化不能忽视发展畜牧业。他回到大队就主持办起了配马站，制定了畜牧发展计划，以马为主的大牲畜又逐渐发展起来。

1959大搞水利时，县委、公社党委布置胜利大队在一年之内修完总蓄水量为100万立米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旱、防涝的"对面泉水库"。马庆福计算后认为，这个水库工程量大，投资大，技术要求高，非一个大队所能承福，而且效益有限。于是他一面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一面带领社员在高坡田里打大口井，修顺水壕、小塘坝，挖引水干渠等小蓄水利工程。而后对面泉水库工程，经全公社调集劳力和车程大

干一冬春仍未完成，直到1961年春县派数百人支援才算基本竣工，效益不大。事实证明马庆福同志当时的意见和做法是正确的。

三年大跃进时期，有的领导瞎指挥、浮夸、平调、特殊化强迫命令"五风"盛行，如布置土地深翻，最浅也得二尺以上。马庆福认为北大荒的土层分黑土、黄土、腰土、冷土，如果上下颠倒，地力要减退。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他只安排在十三队靠水源的地方用人工翻了几亩地，中间施了较多的粪肥作试验，大面积的土地仍使用拖拉机进行较深的秋翻，还调出一部分机车继续开发东大荒，又在老莱河畔开荒近千垧，使大队净增土地一倍以上。

1959年搞压绿肥，马庆福认为把路边含有草籽的野土当肥料会扩大草荒地块，不适宜。他布置各队多收集人粪尿、畜禽粪、炕洞土、草木灰，挖河塘泥、房框土掺和一起沤制，并确定专人、专马、专车常年积肥。以后成为经验被总结推广。他干工作从不争名次，那几年交售征购粮每天通过广播公布进度和名次，胜利大队每次都排在后面。他要求各队打场脱谷不应图快而要注意质量，把好粮交给国家。最后总是胜利大队交粮最多最好，是我省唯一交售万石粮的大队。

1974年学大寨修梯田，他认为当地土质松散，修梯田劳民伤财，还会加剧水土流失。他带领社员搞了另一种形式的农田基本建设：栽农田防护林主带10多条、副带7条；对水土流失的3000多亩土地进行横坡打垅，填平水沟20多条、插柳200亩。

马庆福多年一贯重视培养树立先进人物。1958年后各

地树“老黄忠”、“佘太君”、“穆桂英”、“武松”和“小罗成”等英雄形象，大都是昙花一现。胜利大队涌现出好几名省内外知名的模范人物，如全国劳动模范、省政府命名为”农民育种家”的任国友。马庆福把十三队改为繁育良种基地，任国友共试验了3200多个新品种，其中“胜利黄沙谷”、“红顶子杂交玉米”、“农选2号小麦”、“胜利早半月大豆”最为著名，均可增产20—30%，推广到吉林、内蒙等省区，还被波兰共和国引进。胜利大队荣获了“全国良种繁育先进单位”称号。1958年7月国家农业部种子现场会议在胜利大队召开。南京姑娘徐茂娥，1958年慕马庆福之名自愿来到北大荒，马庆福让她到畜牧场去养鸡，她干一行爱一行，创造了一套孵鸡的土办法，效益很高。1960年被省政府命名为“三八红旗手”。另一名“三八红旗手”孟庆云，与任国友共同繁育良种，1960年秋曾参加“黑龙江省青年代表团”赴苏联伯力边区进行友好访问。

马庆福同志于1978年1月26日病逝，终年61岁。他作为农业集体化的领头人，带领社员群众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讷河淀粉厂的发展史

李振文

日军侵占讷河后，在强化殖民统治的同时，大肆掠夺我资源，想方设法把讷河盛产的马铃薯运回本国。但由于路途遥远容易腐烂，确定将马铃薯加工成淀粉再运回国。

1938年（伪康德五年），拉哈商工会会长孙华堂筹建讷河淀粉株式会社，1940年开始出产品。当时设备落后，生产条件很差：入料、洗涤靠人工肩扛，在大木桶里搅拌，用大园木挤碾粉碎，用大缸沉淀，靠手工起浆晾粉，把湿粉摊在牛皮纸上放在铁火炉旁烘干。当时20来名工人，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日处理量不到五吨。生产的淀粉成本高、质量低，收入仅能维持开工。

1945年日本投降后，讷河县人民政府对工业企业特别是淀粉生产非常重视。首先将原淀粉株式会社改名讷河淀粉厂，归属讷河酒厂管理（当时酒厂归西满军区后勤部管理），选派尤林同志为淀粉厂厂长。由于淀粉厂当时处在战后，破烂不堪，形不成生产能力，只好用小磨生产糖稀、磨块需用

的淀粉，供应本县市场需要。

1948年，讷河淀粉厂归属工业部门管理，重新确定了办厂方向，调整充实了领导力量，加强了经营管理，产品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但还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要。

1950年，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和牲畜，进行了互助合作，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喜获丰收。但马铃薯在县内销不出去，有烂在农民手中的危险。县委、县政府据此情况决定，把农民多余的马铃薯收上来加工成淀粉再往外销售。同时确定淀粉厂划归讷河县供销联社经营，派关明德同志为厂长，杨喜奎同志为党支部书记，芦长有同志为工会主席，并把二区供销社油坊技师杨廷芳调到淀粉厂做技术骨干。经过两年多的规划、扩建，到1952年讷河淀粉厂已初具规模，主要生产工序实现了半机械化，年生产量达到百吨，产值达十万元，利税近万元。为下一步有计划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头年，县委和县政府考虑我县盛产优质马铃薯的得天独厚条件，确定淀粉厂为我县重点加工企业。从县政社拉哈办事处选调懂经济工作的王子明同志任厂长（后任党支部书记），后派转业营级干部刘庚巨同志任厂长，提拔技术骨干杨廷芳任副厂长。由于领导班子配备强，政能人员健全，调动了全厂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当年就开创了新局面，生产的普通淀粉质量一跃上升到出口标准，开始大量出口，年产淀粉近六百吨，产值六十多万元，实现利税六万元。产量、产值、利税都比上年翻了四番。从此讷河淀粉厂出了名，许多地方派人来参观学习，并为省

内一些新建淀粉厂代培了一批技术骨干。他们在成绩面前没有满足。经过反复试验，于1958年使淀粉质量达到了出口的特级标准，有些技术指标还超过了世界淀粉王牌荷兰的“风车牌”产品，大量销往苏联、日本、英国、法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到1965年，淀粉生产形势更加喜人，年产量近2000吨，比1953年翻了三番多；工业总产值二百万元，完成利税十七万元，两项指标也都翻了两番多。这些经济指标在全县工业企业中遥遥领先，在全国同行业也居榜首。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淀粉厂厄运降临。厂党支部书记王子明同志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关进了牛棚。厂长刘庚巨同志被定了个所谓大叛徒，投监入狱。其他领导成员都靠边站了，全厂陷于瘫痪状态。1966年仅生产淀粉一千吨，到1976年下降到九百多吨。1973年试制药用玉米淀粉成功，自处理玉米25吨，产淀粉10吨，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是年10月发生火灾，烧毁了厂房和设备，暂时停产。1974年用自已积累的资金和一部分贷款，重建了淀粉、甩浆、干燥三个车间，增添了设备，年生产淀粉993吨，产值103.3万元，盈利20.6万元，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县委、县政府为发挥我县马铃薯优势，决定扩大发展淀粉生产，先后在学田、讷南、九井、长发等乡镇建起淀粉厂，讷河淀粉厂在技术、设备和人员方面给予了协助和支援，使全县淀粉生产向前迈进一大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厂干部和工人积极性空前高涨，淀粉产量创建厂以来最高纪录，达到3,000多吨，实现利税63万多元，分别比文革时增长三和四倍。1983年在改

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从日本引进迭益式沉降离心机，使马铃薯日处理量达200吨，淀粉一级品率达到93%。是年生产的“雪花牌”淀粉被评为省优质产品，并出口换回外汇。

随着经济承包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等一系列改革实施的落实，讷河淀粉厂首先贯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针，在产品销售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过去产品完全靠商业部门包销，由省蔬菜公司调拨，一年的产量只能销售一半左右。改革先调整了销售职能机构，把过去仅有三人的供销股分为供应和销售两个职能科室，销售科配备了六名业务人员，到全国各大城市推销淀粉，仅1989年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推销淀粉4,600多吨，当年盈利110万元，比过去商业包销提高3.6倍。其次是企业内部推行“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分成，利润包干”的经济承包责任制。仅三年时间缴税利一百一十四万元，本厂超收留成九十四万元，用于工厂技术改造，实现了扩大再生产。同时，职工的生活福利也随着再上一层楼，本厂待业青年均得到了妥善安置，广大职工一心一意扑在发展生产上，工厂一年一个新面貌。

现在的讷河淀粉厂，年产淀粉六千吨，年创税利百万元，在本县是一座被誉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地方国营骨干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也属规模大、产量高、质量和效益好的淀粉生产厂。先后被省、市、县评为先进单位。

讷河儿童福利院的前前后后

彭文新　苗培实

日伪时期，对鳏寡孤独、乞丐残疾之人从不过问。仅讷河、拉哈设立两处养济所（花子房），还是靠绅士募捐款施以救济。名为救济，实则得其救济者极少。这些人依然过着流离失所、悲惨孤苦的生活，白天沿街乞讨，夜间住在寺庙或露天地，有的因饥饿疾病而死，有的冬天无棉衣冻亡。那时路上经常看见"死倒"，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穷苦人翻身作了主人，党和政府对这些人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1952年，讷河县人民政府为了安置社会上的无职业游民、乞讨人员、鳏寡孤独老人、残疾人和孤儿，将讷河、拉哈两镇的养济所（花子房）合并建成讷河县生产教养院，地址在讷河镇东南隅鲁家房。1958年改为讷河敬老院。1979年经省民政厅批准改建为黑龙江省讷河儿童福利院，设书记、院长和副院长，内设

人秘、教育、后勤、经销四个股和卫生所。现有职工59名，孤儿173名，总占地面积19,000平方米，其中办公室、孤儿宿舍、残幼儿宿舍、食堂、仓库等建筑面积3,229平方米，绿化面积7,600平方米。还有解放汽车一台、面包车一台。为了提高孤儿生活水平，辟有副业基地45亩，种植各种蔬菜，调剂孤儿伙食。现在的儿童福利院已成为省、市、县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1952年改建教养院时，仅有院长谭兆信、会计戴佩新和一名管理员负责全院300名院民的教养工作。由于建国初期经济比较困难，院民的生活只能保持在一般温饱水平。为了尽快改善生活条件，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扶持下，组织院民养奶牛45头、羊230只、鸡700只、猪30头，办了豆腐坊，搞了个小编织社（以编土篮为主），垦殖17亩海棠果园。产品除用于改善院民生活外，剩余部分拿到市场销售，以增加经济收入。1953年全院副业生产纯收入一万元。院民每周改善一至二次伙食，吃上了大米、白面和肉类。通过思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院民树立了自食其力的观念。院容院貌、人员思想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58年经上级批准，"讷河县生产教养院"改成"讷河县敬老院"，同时收养十三岁以下的孤儿15名。之后对收容对象进行了全面清理和整顿：对那些复员军人需要疗养的都送到肇州疗养院；属于城镇懒惰成性的乞丐、无业游民都送往建业农场。整顿后有院民150人（包括15名孤儿）。院长崔乃德同志带领7名职工，一手抓教育，一手抓建设，贯彻"以养为主"的方针，减少一些生产项目，着重提高院民的

物质和文化水平。先后成立了院民委员会、伙食管理委员会辟有康乐室、图书室、学习室，办起了卫生所。同时，对院内的孤儿进行专项管理，进行学龄前辅导，使他们在达到入学年龄时都能百分之百的走进学校。

1960至1965年五年间，坚持全心全意为老人与孤儿服务方向，在职工和院民中开展"以院为家"的教育，院的建设年年都有新变化。1965年农、牧、副三项经济收入达到三万多元，是建院初期总收入的3倍。这五年是院的兴旺时期，农副业生产收入多，院民的生活、教育等各方面井然有序，自有资金达二万多元。

1966年"文革"开始，是院由兴盛到衰落的转折点。那时领导靠边站，一些管理人员投入到派性斗争中去，院内的管理放松，人员思想混乱，经济萧条，生活水平下降。一些造反派提出了"以管教为主"的办院方针，并于1967年7月改院名为"讷河县老残教养院"。由于办院方针改变，管理方向偏离，有的院民到社会乞讨和流浪。孤儿无人管理，有些孤儿过起了"小流浪者"的生活。院内遍地是垃圾，处处杂草丛生，一片衰败景象。

1969年老院长张国惠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率领全院37名职工与260名院民，排干扰，下大力，苦奋斗，使全院又发生了巨大变化。1975年成立了电影放映队，每周为院民放映两场。农、林、牧、副齐上，经济收入飞快增长。同年，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将"讷河县老残教养院"改名为"讷河县社会福利院。"

1979年9月，为贯彻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

针，进一步加强社会福利事业管理，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省民政厅决定将“讷河县社会福利院”并入克山养老院，将当时院内的110名老人全部送到克山养老院，另成立“黑龙江省讷河儿童福利院”，除原有的80名孤儿，哈尔滨又送来20名孤儿。以后收容范围相继扩大，承担了齐齐哈尔、黑河、北安、加格达奇、大兴安岭等四个地市30个县的孤儿收养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儿童福利院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坚持对孤儿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努力培养“四有”新人。全院孤儿有13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8人考上了大、中专院校，101人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

1986年，福利院打破了“大锅饭”管理方法，建立和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实行院长负责制，制定了“七化”（职工队伍革命化；工作管理制度化；干部队伍知识化；儿童教育系统化；食堂饭菜多样化；孤儿宿舍卫生化；庭院建设花园化）、一提档（由省民政系统先进单位提档为国家级先进单位）的工作目标。党支部一班人团结一心，坚持清正廉洁，做楷模，当表率。院长孟宪志同志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全院职工有口皆碑。院“一班人”想在前，干在前，请客不到，送礼不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全院职工团结奋战。为建设一支思想好、文化高的职工队伍，他们先后输送17名同志到有关学校学习，现有59名职工中有3人取得了大专文凭，12名取得了中专文凭，其中2人担任了院领导职务，4人担任了股级领导职务，其他同志都成为关键岗位的骨干。全院教职工把为孤儿服务作为宗旨，全身心地从事为最困难的人服

务的事业，使那些失去家庭温暖的孩子们在儿童福利院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真正体验到党的温暖。1989年4月，孤儿潘丽艳出麻疹住院治疗，教育股老师、共产党员包艳琴同志放弃休息，自费买了营养品到医院探望。当孩子露出想吃韭菜馅饺子的话时，包老师急忙回家包了美味可口的饺子送到病床前，感动的孤儿热泪盈眶，激动的说："你就是我的妈妈啊"。护理员吕桂芝同志，从不辞辛劳地为孩子们洗头、洗澡、洗衣服，常常是"夙眼一睁，忙到三更"，默默奉献母亲般的爱。孩子们在自己编的歌里深情的唱道："我们这个大家庭，充满无限爱和情，叔叔阿姨培育我，终生不忘党恩情"。关怀之外更重要的是教育。他们对那些未能升学的孤儿，坚持开展职业培训，分别送到县服装裁剪学校、民政福利厂和饭店，学习裁剪、木工、油漆和烹饪技术，为他们走上社会、独立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根据他们的特点，坚持开展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如每年举办一次小型运动会，经常开展棋类、球类和书画比赛，举办专题讲座、演讲会、读书报告会、智力竞赛和文艺晚会等，丰富孤儿的业余生活，陶冶他们的情操。近几年来，福利院坚持走"以实业补事业"的道路，先后集资、投资四十多万元办起了洗涤剂厂、挂毯厂、青年工程队、被服厂、商店等共获纯利润十万余元，并投资五万多元进行院容院貌建设。建起院围墙和斜雁形大门；铺水泥板路1,000平方米；建大小假山三座、儿童小乐园（内有滑梯、单杠、双杠、双梯、压板、水泥乒乓球台等）一处、小花园两处（内有石桌6个、石凳36个）和一条75米长的仿古月亮门的围墙。还建了蓝球场、

排球场、羽毛球场和园林雕塑，种植各种树木二百余株，各类花草万余株、铺草坪500平方米。外地来院参观和办事的人都异口同声的称赞："这里花香四溢，绿柳成荫，心旷神怡，美不胜收，堪与公园比美"。

现在的讷河儿童福利院，正朝着社会主义高度文明的福利院方向发展。他们多次受到省、市、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1984年至1987年连续四年被省民政厅授予"先进单位"称号；1986年至1987年连续两年被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授予"文明单位"称号；1988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文明单位"称号；1989年被省政府授予"少年儿童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被省爱委会授予"省级卫生先进单位"称号；1990年被市政府授予"庭院绿化先进单位"称号，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先进单位"称号。领导和职工多人被国家和省、市县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一名院领导1987年被民政部授予"全国民政系统劳动模范"称号，被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授予"优秀特殊教育工作者"称号；1990年被省教委、民政厅授予"特教先进工作者"称号。原教育股股长高茹凤同志1985年被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授予"优秀特殊教育工作者"称号，被省教委、民政厅授予"特教先进工作者"称号。卫生所所长乔海滨同志1990年被省教委、民政厅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全院还有6人被县人民政府记功，1人受到晋升一级工资奖励。1989年中央电视台以"教人课堂，育人摇篮"为题对该院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但在荣誉面前，该院一班人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带领全院职工继续奋进，创造更好的成绩，争取更大的荣誉。

湖北新屯的今昔

苗培实　彭文新

湖北新屯（今巨和乡更新村三屯）始建于1910年12月21日，迄今已整整80年了。

宣统二年，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迫于外国列强的政治压力和经济掠夺，在国内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使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湖北连年的天灾人祸，大多数劳动人民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迁徙各处，以求谋生之地。

湖北省天门籍的黑龙江省督军周树模，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鉴于当时的东布特哈（今讷河县）境内地广人稀，大片肥沃的荒原得不到开发，加之他家乡天门县人多地少、十年九涝，他便籍此奏请清廷批准，利用官款从其家乡招募贫民290户（约800人，其中壮丁320人），并采用十家连坐和十户为一排、设排长一人负责的束管方法，千里迢迢来到东布特哈。在离县城东南20公里处（今讷南镇鲁民村）建立一个临时集中移民居住点。以后，从营车派人四处采点，相继将这

批移民分拨到定点的湖北二屯（今讷南镇五福村9、10屯），湖北三屯（今讷南镇讷南村5、6、7屯），湖北四屯（今讷南镇向荣村1、2、3屯），湖北五屯（今九井乡育民村），湖北新屯（现巨和乡更新村三屯）。这批移民由于从千里之外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很不习惯。周树模为了笼络住他们，每户拨给土地11.75垧，房身地2.5亩，每8户拨给牛犋一副。同时还在今讷南镇建立一个免费供应这批移民生活所需用品和生产物资的供应站，当时群众称之为"官货店"。虽然如此，但这些初到东北的湖北人不服水土，种地不会种，牲口不会使，生活只靠"官货店"发给的微薄粮食糊口，饿一顿饱一顿，仍很困难。后来一些人有的逃到黑河等地去淘金，有的私自返回原籍，仅有32户的湖北新屯迁走了11户。余下的21户在新屯艰难度日，生活方式由不习惯到习惯，农事耕作由不会到会，逐渐地适应了北大荒的风土人情，顽强地在这块沃土上繁育生活下来。据老人们回忆说，那时生活习惯了之后，日子逐渐有奔头。这时日本侵略者又占领了这片土地，他们疯狂的进行经济掠夺，要出荷粮，抓经济犯，地方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和地主老财的剥削，使鄂民们一年的劳动收成所剩无几，家家户户过着早吃菜、午吃糠、晚吃稀饭照月亮"的饥寒交迫生活，一些人又被迫奔走他乡。到土改前夕，全屯仅有10户湖北人。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斗地主，打恶霸，穷苦人有了土地和耕畜，翻身当家作了主人。翻身后的新屯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1950年成立了两个互助组，第一互助组组长邓洪喜，第二互助组组长贾兴汉。1955

年成立了初级社，主任贾兴汉；1956年建立了高级社，主任仍是贾兴汉；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属讷南人民公社更新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是王兴武。1966年划归巨和乡辖。

在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上，新屯人发扬了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据老人们回忆，刚建初级社时，粮食达到了自给有余，一年到头手里有了回头钱，全年人均收入达到150元；到了高级社时人均收入达到200元；人民公社化后人均收入高达260元左右。回顾新屯人所走过的道路，他们都深有感触地说：解放前缺吃又少穿，生活苦得似黄莲。解放后不愁吃和穿，生活真是比蜜甜。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路线"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农副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粮食亩产仅100多斤，副业生产几乎停顿，人均年收入仅几十元。十年浩劫，使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新屯人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彻底批判了极"左"路线，新屯人痛定思痛，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勇于从旧的意识束缚中解脱出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农业生产上花大力气，全屯农业机械化作业率达到80%以上，粮食亩产比文革时提高16%，人均收入比文革时增长20%，对国家贡献一年比一年大，群众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温暖的春风，复苏了广大农民的心田。新屯人破除了几十年遗留下来的"大帮轰"的生

产方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屯人的劲头更足了，他们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强帮弱，富带贫，党员群众一条心，农、林、牧、副齐发展，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人均收入成倍递增。1990年全屯产粮60万公斤，向国家交粮30万公斤，每户平均向国家交售粮食10吨，人均收入达到700多元，比承包前人均收入增加3倍，是解放初期人均收入的4.3倍。

新屯面貌变了。全屯90户已有80%以上的人家有了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多数人家有储蓄，适龄儿童入学率到100%。过去粮油加工到很远的公社去，现在本屯办起了一处米面加工厂和一处小油坊、两处豆腐坊，粮油加工十分方便。全屯实行了丧事报销制、老弱病残补贴和扶贫到户，基本达到了无困难户。他们还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下功夫，聘请技术人员讲科学种田、科学管理，培养科学种田能手，培植高产试验田，并制定了湖北新屯十年发展规划。同时，在全屯青少年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教育，培养一代有理想、有文化、懂科学的现代农民。

历史不会忘记新屯人的奉献。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输送4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英勇杀敌。衣庆福烈士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屯人乃至全县人民至今还在缅怀他。一批又一批新屯人在祖国建设中不断成长起来，有些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他们是：曾任讷河县委副书记的汪文泉；三门峡市供电局局长董洪志；齐齐哈尔市粮食局副局长敖兴国；驻天津某部师参谋长敖忠和；解放军团参谋长董振权；铁力林业局局长张金普；国家劳动人事部干部熊长祥。

80年过去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新屯人正在充满信心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如今的湖北新屯是“承包田里粮产多，战天斗地讲科学，农牧并举齐发展，家家户户有余钱”的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象。

我读私塾的回忆

万魁廷

旧社会农村没有学校，贫苦农民家的孩子想要念书没处去念；也有的想叫孩子念几天书，因家庭生活困难念不起，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孩子八、九岁就放猪，十几岁就得给地主扛活，所以农村多数农民是文盲，当一辈子“睁眼瞎”。

一九三九年（康德六年），我十二岁，家住在距讷河县快车站王耀屯（现太和乡新安村）半华里的北屯（李海山屯）。当时有个从奉天省（现辽宁省）农村来的一个念过大书的人，名叫宋连祥，四十多岁。为了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他租了地主的两间半房开了个私塾，招收了四十多名附近村屯的学生，都是贫苦农民家的男孩子，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十一岁。每半年收学费五元钱(国币)、五十捆烧柴，每人每月三十市斤成品粮（小米、玉米查子），外加菜金。先生的老伴给学生做饭，伙食标准很低。每天吃的是小米干饭、玉米查子粥，早、午食的菜都是土豆、白菜、黄豆芽汤，晚饭

只有咸菜。父母为了让我识几个庄稼字，这年旧历七月初一把我送到这里读书。学堂两间半房是筒子屋，四铺大炕，有三铺炕给学生念书用，先生家住一铺。每铺炕放四张桌子，每张桌坐两名学生，学生盘着腿，前后摇晃着读书。那时没有正规的课本，念的都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庄农杂字》、《名贤集》，还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

私塾念书没有统一的计划，按照每个学生的智力强弱，先生给每个学生规定每堂课念多少(叫号书)。先生教书的方法全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学生家不论远近，一律在先生家吃住。每天一放亮就起来，洗完脸开始读书，早饭前背一次书，早饭后又开始上课，中午饭前背一次，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再上课，晚饭前背书、晚饭后再接着上课，睡觉前再背一次。每天背四次书。冬天吃两顿饭也同样背四次。每次背书时，先生喊声背书，读书声立即停止，学生按照规定的顺序，双手恭恭敬敬把准备背的书放在先生的桌子上，先给先生行个礼，然后转过身子站着背。如果背的很熟练，先生说几句鼓励话；要是背的不熟或有差错，就要受到先生的惩罚。每次背完书后，先生当时就给学生号书，规定下堂课读多少。学生背书，不仅背新课，还要死记已经念完的书。读私塾不仅会认字，还要会写，主要是用毛笔写仿。用仿纸订成本，先生给写成仿影，把仿影穿到双层仿纸中间，用长方形的仿圈压上照描。有时也考学生。念过一个学期的学生要学珠算，先学"小九九"，必先学会念"小九九"的口诀。

私塾的管教很严。每学期一开学先生就指名两个年龄较

大的学生当大校长、二校长(类似现在学校的正副班长)。我上学这个学期的大校长叫李春山，二校长叫尹文章。学生的一切活动都归他俩管，吃饭、睡觉、起床都由他俩发令。谁要不听管，就向先生报告，必受惩罚。大校长、二校长对学生很好，哪个同学有缺点就偷偷的指点，从不向先生报告。学堂规定"食不言、寝不语"，到吃饭和睡觉时"鸦雀无声"，有话也不敢说。每天除了饭后有十几分钟时间到外边散散步之外，不准随便到外边去蹓跶。上课时去厕所只准一个人去，学堂门框上挂个木牌，一面写有"出字"，另一面写有"入字"。学生去厕所时先把木牌翻过来为"出字"，回来后再翻过来为"入字"。学生去厕所得先看木牌是"入字"才能去。私塾没有什么星期、礼拜天。我读私塾这个学期只有阴历八月十五日放一天假，八月十四晚上叫学生回家过八月节，八月十六日早晨返回上课。

私塾对学生的管教就是三个字，训、罚、打。训就是训斥。先生训学生象吃家常便饭一样，先生有时心不顺，学生就要遭殃，二十几名学生天天有挨训的；罚就是罚跪。学堂屋内东墙供着孔圣人，供板上放个香炉。哪个学生背书时差的太多，第一次训斥，第二次就罚跪，在孔子牌位的香炉上烧上一根香，被罚跪的学生跪在地上，手拿着书，面向孔圣人念书。一根香烧到根再去背，直到背会为止；打就是打手板。先生准备一个一尺半长，一寸五宽的薄木板放在桌旁，如桌学生学习不好，或者违犯学校的规矩，先是训，后罚跪，第三次就打手板。考字不认识，一个字打一板。和我同桌的宫向振比我大一岁，他的智力差，每隔三五天因背书不

熟练，不是挨训，就是罚跪，有时挨打。有一次因背《三字经》差两行背不下来了，先生来了气，打他十板，边打边训。宫向操被打的爹一声、妈一声地叫唤，其他同学看他被打也心里难过，他手心被打的红肿，三、四天才恢复原状。因被打次数多，念了四个多月说啥也不念了。有些学生怕受罚，上厕所也背书。

先生的老伴心肠很好，学生都叫她师娘。学生被惩罚，她就给讲情，免除了惩罚。因此学生有点什么事都先找她说，她向先生说些好话，就把事办成啦。

读私塾只是学字，学不到什么知识。到阴历腊月二十七不足六个月时间，这个学期就算结束了。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进度，谁的智力强就学习的多，反之就学的少。虽然不足六个月，有三分二初读私塾的学生念完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庄农杂字》和《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七、八本书，认识了一千多字，能写简单的书信。我因家庭生活困难，第二年就休学给地主扛活去了。

旧社会贫苦农民家的孩子要想念书识点字实在是难哪！我每当回忆起读私塾的情景，就痛恨旧社会，更加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